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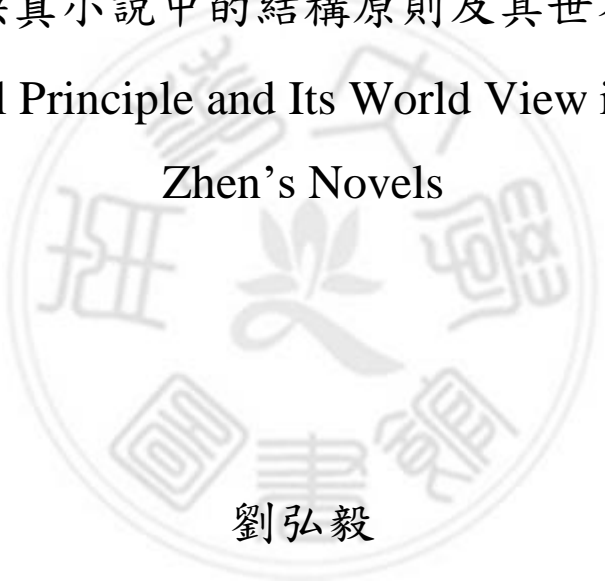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陳映真小說中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 and Its World View in Chen Ying-

Zhen's Novels



劉弘毅

Hong-Yi Liu

指導教授：高知遠 博士

Advisor: Chih-Yuan Kao,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January 2023

南華大學
文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陳映真小說中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 and Its World View in Chen Ying-
Zhen's Novels

研究生：劉弘毅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陳章錫

莊家瑋

高知遠

指導教授：高知遠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2 日

謝誌

關於感謝的真實意義，我思考了很久。每一天我都在說「謝謝」，跟超商的店員、餐廳的收銀員與服務生、系辦的小雅姐、朋友、女朋友……謝謝彷彿一種儀式，一種文明中最寂寞的一環，當我們將它說出口，就了結了某件事、某段時間，甚至是一段緣分。

這酸楚不禁教我回到那個春天，主任、高老師以及作珍老師並排而坐的那個教室，第一次來到南華的我說出自己的名字……而後每一次的開門裡面都有高老師，有我們一門的師兄弟姊妹，有歡聲笑語，彷彿一部來自春秋時代的美談。有高老師，春天一直是一場絲綢製的雨，溫柔綿延、滋養著學海。現而今我就要離開老師，去往下一段航程。我有資格感謝你了嗎？至今尚無解答。然而老師無疑改變了我、栽培了我，感激之情是無需疑問的。

現在我已不會在出門時對母親的相片說「請保佑我」了。和她說話的習慣不變，只是後來說的是「謝謝你保佑我，把我帶來這個世界。」

每天面對陳映真小說的日子至今該有兩年了，兩年過去，我依然是那個會幻想火車事故突然發生，但蜘蛛人從天而降拯救種人的男孩；只不過終於稍微能理解蜘蛛人的本質不是明星，只能算是一個背負社會主義理念的愛穿紅色緊身衣的男人。

兩年前向父親伸手拿錢，要購入「陳映真全集」，他的第一個問題是「陳映真是誰？」而那也是高老師推薦我研究陳映真時，我對他問出的第一個問題。他是誰呢？是某個期許、某個孿生兄弟的典故？對後來的我而言，最深刻的論證恐怕還是那些讀著陳映真小說的夜晚，獨自留下的淚水吧。

讀的時候哭了，然而寫的過程可謂毫無痛苦與血淚，只不過別人寫出來是一本，自己的書桌上卻堆疊著兩三本書頁量的 A4，有感自己就是殺了雨林的人，在這裡要先向社會大眾致歉。對於自己在整個行文過程中的囉嗦、不成熟與魯莽，我也感到抱歉。這份歉意，不論是對指導我這有如文盲的孩子以至終於識字的吾師知遠；在系上有如大家的爸的主任；還有不以弘毅之膚淺為介

意，如一名親愛、博學的大哥哥那樣給我以視野與指教的家瑋老師……要說對不起，也要說謝謝，還要說我愛你們。

我愛的人還有很多。

話語、文字作為符號的神奇之處就在這了——當我說「我愛你們」，我實際在說的是「謝謝你們愛我」。無論是陪我長大、供我讀書至今的爸；阿嬤、小阿姨、姑姑、小舅媽這些「我的第二個媽」們（為了避免你們爭奪名次，我索性就不給你們排名了）；所有曾經給我教導、關愛的師長；然後是在台文一起窩了一年半的小夥伴們，沒有與你們的共同進步，我沒有可能走到今天，謝謝，我也愛你們。

母親在臨終前數月遺語她深愛並感謝著所有認識的人，現在看來，她在寫謝誌的天賦上比我不知好上幾百倍，但是媽，我終於要成為碩士囉！妳會感到驕傲嗎？在二十四年前，二十四歲的妳生下了我，給我光芒、愛、期許與陪伴，還有好多好多……二十四年後，我先是在年初摔斷了腿，又在反覆的修改與下一次修改中自我放棄、懷疑甚至咒罵……可是當我意識到妳的保佑早已存在，其論證就是我的生命、我的存在，於是拿出妳預留的勇氣，努力著在這宛如命定的第二十四年榮耀妳，所以這本書是獻給妳的。

我還能說什麼呢？

父精母血，何以言謝？請讓我以「我愛你」代替「謝謝」：

爸、媽，我愛你們。

摘要

關於陳映真小說之研究，歷來吸引眾多研究者。他們著眼於陳映真個人在國家、政治以及眾多社會議題的參與。然而在閱讀小說的過程當中，是否必須不斷的與小說外的陳映真進行對話呢？這樣的考量，在陳映真小說的分析當中，是永恆且必要的嗎？什麼時候、哪篇小說是與那些講話（或文章）一起被考量的，尚且難有定見，更遑論能夠自行提出解釋的陳映真先生，隨著其生命的逝去也不可能加入討論。倘若只論小說本身，是否能夠得出意義，是本文在研究上的初始動機。

本研究以「陳映真小說中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為題，希望藉由探討陳映真小說內容的結構方式，取得其中同質性的原則。並針對結構當中層次遞進的三個議題：階級、國族以及批判為分類以進行。在發現其中的原則之後，延伸其中的對立內容，透過對文本當中敘事模式進行的發現，進而導出文本對於對立中延伸之價值有何樣的表現傾向，並透露出怎麼樣的世界觀。在研究中，發現並歸納出結構在延伸到深層意涵時，呈現的多維或二元對立結構，並能夠發現其中隱含讀者在設計文本時透露的價值意識（主體意識價值觀），在處理階級時體諒受壓迫者；在國族中反對外國族對本土的侵略；而在批判中針對平民與統治階級兩個方面共構的威權與剝奪予以否定意見。而在這些分別的文本所論證出來數個價值意識，又能相互組合、補證出一種接近社會主義價值之世界觀。

世界觀的使用需提及的高德曼（Lucien Goldmann）之發生論結構主義。其原先意旨在透過文本中可劃分的兩種對立結構（表、深層之分），討論敘述主體在文本當中肯定何種意識形態。而在本文的討論裡，表層與深層（意涵層次）在對立結構中不一定會有顯著的分離。並且，在銜接於對立結構討論之後的價值意識與世界觀討論之導出，並不會以「真實創作主體」的陳映真先生所發表的任何形式的評論、講話作為說明與例證。其目的不在切割陳映真與其小說作品之關係，而在樹立以研究動機為規範的研究方法原則。

在研究過程當中，本文將以敘事學為基礎，從數個主題上探討陳映真小說當中的價值意識及世界觀。同時期望藉由「陳映真小說中結構原則及其世界

觀」之提出，為以陳映真小說作為對象之研究提出參考，以期陳映真小說研究更加圓滿豐盛。



關鍵字：陳映真、敘述意識、結構主義、敘事學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en Ying-Zhen's novels has always attracted many researchers. They focused on Chen Ying-Zhen's personal involvement in the state, politics, and many social issue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the novel, do you have to constantly have a dialogue with Chen Ying-Zhen outside the novel? Is such a consideration eternal and necessary in the analysis of Chen Ying-Zhen's novel?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n and which novel will be considered along with those speeches (or articles), let alone Mr. Chen Ying-Zhen, who can provide his own explanations,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join the discussion as his life passes. If we only talk about the novel itself, whether it can derive meaning is the initial motiv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this article.

The title of this research is "Structural Principles and World View in Chen Ying-Zhen's Novels", hoping to obtain the principle of homogeneity by exploring the structural methods of Chen Ying-Zhen's novels. It also addresses the three issues of progressive hierarchy in the structure: class, nation, and criticism. After discovering the principles, extend the opposites in them, and 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narrative patterns in the text, then derive what kind of expressive tendency the text has for the value extended in the opposition, and reveal what kind of worldview. In the research, the multi-dimensional or binary opposition structure presented by the structure when it extends to the deep meaning is found and summarized, and the value consciousness (subject consciousness value) revealed by the reader when designing the text can be found. Be considerate of the oppressed in dealing with class; Oppose foreign aggression against the homeland among the nation; In the criticism, it rejects the authoritarianism and depriva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several value consciousnesses demonstrated in these separate texts can be combined with each other to complement a world view close to socialist values.

The use of worldview should be mentioned in Lucien Goldmann's occurrence structuralism. Its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discuss what ideology the narrative subject affirms in the text through two opposing structures (surface and deep),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ructures of opposition. I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paper, there is not necessarily a significant separation between the surface and the deep (meaning level) in the opposing structure. Moreover, the derivation of the discussion of value consciousness and world view after the discussion of opposing structures does not use any form of comments and speeches made by Mr. Chen Ying-Zhen, the "real creative subject", as explanations and examples. Its purpose is not to c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 Ying-Zhen and his novels, but 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research motiv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is research,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value consciousness and worldview of Chen Ying-Zhen's novels from several themes based on narratolog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proposal of "Structural Principles and World View in Chen Ying-Zhen's Novels", a reference will be proposed for the research of Chen Ying-Zhen's novels, so as to make the research of Chen Ying-Zhen's novels more complete and prosperous.



Keywords: Ying-Zhen Chen, narrative consciousness, structuralism, narratology

目錄

謝誌	I
摘要	III
Abstract	V
目錄	VII
表目錄	I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陳映真小說中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之論題導出	1
第二節 陳映真小說之相關研究回顧	4
一、專書	4
二、學位論文	6
三、期刊論文	11
第三節 結構原則與世界觀之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	14
第二章 陳映真小說中階級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	18
第一節 陳映真小說的階級結構原則	20
一、職場階級的對立結構	20
二、性別階級的對立結構	27
第二節 陳映真小說中階級的價值意識	32
一、職場階級的價值意識	32
二、性別階級的價值意識	40
第三章 陳映真小說中國族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	48

第一節 陳映真小說的國族結構原則	49
一、同族的對立結構	49
二、異族的對立結構	58
第二節 陳映真小說的國族價值意識	66
一、同族對抗的價值意識	67
二、異族對抗的價值意識	74
第四章 陳映真小說的批判結構及其世界觀	81
第一節 批判文本的結構原則	82
一、社會型文本的對立結構	82
二、政治型文本的對立結構	89
第二節 陳映真小說的批判意識	97
一、社會型文本的批判意識	98
二、政治型文本的批判意識	106
第五章 結論	115
參考書目	120

表目錄

表1 小說二元對立結構表	15
表2 批判文本對立結構表	16
表3 西方社會的優越意識表	19
表4 種族與性別之真實階級表	20
表5 馬克思主義中的工業社會階級對立表	26
表6 陳映真小說的職場階級對立表	26
表7 〈雲〉中的階級對立情節全貌表	65
表8 本文採用的〈雲〉之對立情節表	65
表9 〈夜行貨車〉中的國族對立組合表	65
表10 〈夜行貨車〉中的性別對立組合表	6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陳映真小說中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之論題導出

陳映真在兩岸的文學圈內屬於相當知名的小說家，然而在討論其小說之前，熟悉陳映真歷史的人必會知道這個名字並不是他的本名。1937年出生的作家陳映真，最初的名字是陳映善，後因過繼給他的伯父而改名為陳永善。本名陳永善的他，如今被人熟知的「陳映真」之名乃是來自本家的孿生兄弟。陳映真曾表示自己使用這個名字示人，是因為想紀念早夭的孿生兄弟。而在其他的自我陳述中，陳亦提及父親的教誨：「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這教誨的提出，很好的說明了陳映真的價值信仰取向，再結合他以兄弟之名進行文學、政治與出版等活動，則不難發現其以關懷為己任、在乎他人的行為追求。

1959年，他以期末的英文作業進行翻譯與改寫，命名為〈麵攤〉投稿到《筆匯》雜誌，開啟了「陳映真」在文壇的活動，此後數十年間經歷台灣民主聯盟案的入獄、1975的特赦，以及1985年創立《人間》雜誌等大小事件。二十一世紀以後，小說產量減少，赴大陸發展，2016年於北京朝陽醫院病逝。其發表小說凡三十六篇內容從歷史、社會、經濟與政治出發者眾，且很多在相當程度上具備與共時社會互動、溝通之能力乃其主要特色，這樣的特色是否能夠從文本內部的意義上被討論與歸納，是本研究在追求上的原始動機。

而討論涉及陳映真的文學時，針對其中所表現出來的美學與意義，一般會將其歸類在「寫實主義美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的範疇當中。如周芬伶就曾經提出：「我們可以說隱藏在寫實風格背後的陳映真，擁有的是現代主義的心靈。」¹這並不是一種批判，而是指認。而宣稱對現代主義文藝抱持批判意見的陳映真先生，也曾在文章當中肯認現代主義文學的存在之必要：

「文藝是一時代的反映。」是的，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和社會情況，產生一個特定性質和內容的文藝。所以，「現代」的這麼一個複雜而且未曾有過的時代和社會情況，產生「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毋寧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

因此「現代主義」文藝，在反映現代人的墮落、背德、懼怖、淫亂、倒

¹ 周芬伶：〈迷走《忠孝公園》——陳映真近期小說的女性缺位〉，《台灣文學學報第五期》，頁138。

錯、虛無、蒼白、荒謬、敗北、凶殺、孤絕、無望、憤怒和煩悶的時候，因為它忠實地反映了這個時代，是無罪的。²

這樣評價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陳映真，又於十年後評價了陳映真「早期」小說：「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是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裡頭，他顯得憂悒、感傷、蒼白而且苦悶。」³他並不避諱的將自己與小說呈現的人物狀態一起評說，而這內容正好說明了他自己的小說中，存在他對現代主義文藝觀察得出的元素。而其中所謂的「分期」產生，是因為他認為1966年以後一直到他寫作的當下（1975）「契訶夫式的憂悒消失了」，並且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先前的感傷與自憐。此處他提及的「現實主義」指的是小說中對現實處境的分析，別於這個時期的前期小說則是「浪漫主義」的。

顯然，這樣的自我評論與文學史當中對其小說的歸納從對象到說詞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位。首先陳映真這種分期的立基點，是根據小說中主要人物的情節、處境與選擇來進行的。這種人物表現，在分期的同時就與現實的時間結合在一起。其不當之處在於，如果1966年以後的任何時間，出現一篇憂悒、虛無主人公的陳映真小說，試問它應該被放在哪一「時期」？與此同時，那個「文學反映時代」之現象，卻不受任何時期限制的出現於陳映真整個小說創作史。在不加以分期的小說內容中，充斥著關於政治、民生、階級、國際事件與省籍問題等反覆出現之議題，反而證明了陳映真小說現代主義本質的寫實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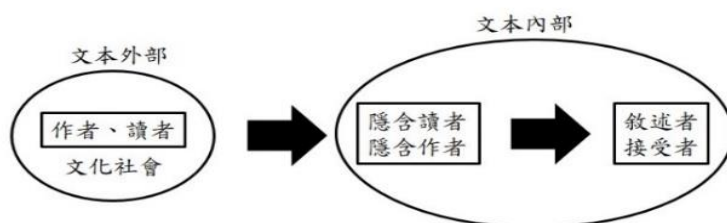
在以這樣的基礎認識進入主旨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前，本文將先行對研究當中出現的用語進行定義，並以這樣的前提討論章節設立之意義。

從前述之引文當中，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當陳映真作為一個「批評者」對陳映真所寫的小說進行評論或者分析，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著難以質疑的說服力或是堅定。這是因為陳映真與「其他讀者」有決定性的不同——正是他自己寫作了這些小說。這破壞了一般而言的「創作－閱讀」過程。正常的讀者不會是他閱讀小說的作者，所以常見的作品過程是：「作家→寫作→文本→閱讀→讀者」而從這個過程中讀者不能進入作家的意識，以將所有的設計、意義與企圖都「複印」於自己的意識當中。

² 陳映真：〈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地隨想〉，《陳映真全集》（卷一），頁412。

³ 陳映真：〈試論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二），頁315。

陳映真作為一個「作者兼職讀者」，能夠知道「文章誕生以前」的東西，例如創作的客觀對應物、生活中的典型取得、真實的創作意圖等。然而，當本文在此將「陳映真」移除，而將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變回客觀的「作者」與「讀者」，則前述的說服力就隨著「作者、讀者合一」的消滅而不復存在。無論是真實作者或是真實讀者，其意識都無法為該主體本身以外的人完全知道，是以另一個概念或能使小說研究之對象與證明更為清楚，那就是「隱含讀者」⁴之提出，以及相應的「文本（text）」概念：



關於此圖之推演可見《敘事學》中對於敘述者、真實作者及隱含作者的介紹。⁵由圖可見，真實作者、隱含作者與敘述者並不能夠被視為同一主體看待。其中，與真實讀者相應的真實作者，將會與文化、社會一起被區分於「文本外部」，而已隱含作者、隱含讀者則能夠在文本內部的討論被解釋，而真正適合「以文為本」的討論範疇，在不考慮陳映真真實主體的情況下仍能對其文本內部之價值予以勘探。

當論題進入陳映真小說當中的世界觀，則「世界觀」一詞的界定是相當重要的前導任務。一般而言，世界觀在解釋上有兩種說法：其一是在討論虛構的

⁴ 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著：《閱讀行為》（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頁44。

⁵ 胡亞敏：「真實作者是創作或是寫作敘事作品的人，敘述者則是作品中的故事講述者……暗含作者是作品創作和交流中的構成因素之一……是讀者把握和理解作品的產物……簡言之，敘述者不同於真實作者，也不等於暗含作者，他是敘事文內的故事講述者。」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2014年），頁46-47。

文學、影視作品時，發現內部的世界或宇宙的設定；其二是理論家高德曼⁶在發生論結構主義的論述中提出，意思是藉由作品內部發生的意涵價值的衝突，去發現作者對其中的哪一邊予以認同，藉此將作者之價值選擇和社會中的路線與主義比對並進行指認。所以，後者所謂的世界觀並不是「世界看起來是怎麼樣的」，而是「怎麼去看這個世界」。

因其涉及外部價值的指認，所以這樣的研究必將是一種社會學式的研究。單從其原先的概念來看，這與本文先前導出的文本理論有其相左之處。最直觀的問題在於，世界觀的指認在其理論中針對的是「作者」，文本理論之對象則是文本，這樣一來世界觀之指認似乎會涉及文本以外的問題。然而，如若將指認的對象從真實主體的探求，轉變為對隱含創作主體的發現，以期透過共性的發現，歸納文本自為發生的世界觀傾向，則能使這樣的矛盾化解。另一方面，此法亦能夠避免「知人論事」概念，在以小說為主的研究當中容易造成的過度解讀，以及對陳映真個人的認知，在操作分析時造成意識先行之現象。

第二節 陳映真小說之相關研究回顧

在陳映真「試評」了自己的小說以後，學界先賢對於陳映真其人以及其文學的研究不曾停歇。在此本文為了明確對象與討論的範疇，將先行圈限討論範圍在「陳映真小說」的相關研究，再予以討論。在針對陳映真小說進行的分析當中，目前幾乎不具備任何符號學式的研究，更遑論是將規範限制於「文本理論」的研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這些研究在目標上針對社會母體重塑或左派個體的真相考察；二則是在方法上因為其作品風格而將作品分類以「時期」，使其討論不能脫離真實的（歷時）時間與主體之影響。下列將依其發表形式分為「專書」、「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進行重點回顧與相關議題的商榷。

一、專書

涉及陳映真的討論書目很多，然許多都是在歷時性的討論中一帶而過，以陳映真為唯一討論對象的專書相對較少，而在此不得不提及趙剛的《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與《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台灣1960年代》這兩本重要書目。

⁶ 呂西安·高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

關於《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一書，最能直陳其中心思想的話語早在其自序當中已經能見：

……身上背負著樸素的對耶穌的愛的信慕、社會主義的啟蒙，以及以魯迅為核心的20-30年代的左翼文學傳統。他承擔很重，因此，他自剖，一定程度上就是剖世，反之，剖世也一定包含了自剖。繼承了魯迅，陳映真一直是在一種「把自己包括進來」的寫作中。⁷

這樣的說明，對讀者理解該書甚至是趙剛對陳映真小說的意見，提供了開門見山的挑明，「凡陳映真小說必然具備一種對該時間社會的剖析，而這種剖析也涉及陳映真對自我的分析與態度。」在該書當中，趙剛以四章鋪設「文學之路」，而且可見其中明確的順序與最終達到「整體的環形」結構。若排除時間的因素，可以視其為對「性與兩性」、「對美態度」、「知識分子的路徑」及「對歷史、思想與文學的書寫」四個方向對陳映真與其小說進行討論。

而《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台灣1960年代》則在書本主題上就限定了其探討的範圍，是陳在1960年代發表的「早期」小說。而該書以一種更為專限的方式在「60年代年男性左翼主體」、「60年代知識分子群像」與「分段體制下的外省人」三個主題當中，以單篇篇解的方式進行討論。單就分節來說，該書在探討上更精確的繼承了前書《求索》的討論路徑，在性別政治、知識分子路徑與歷史問題在個別族群上的發生上走得很堅定。兩書雖分別出版，然而在路徑、方法原則上卻存在著極大的共性，故本文將在此視為一體、一併商榷。

在此兩書當中，趙剛的分析處理了相當多的陳映真小說。《求索》中，對於「青年陳映真」的討論中，首見撕下那些相對晦澀難解小說的現代主義標籤，而在其中牽涉作品與創作主體的處境問題。如面對〈雨傘與我〉之去時代符碼、去個體深度描寫的小說時，以其中主要物品對政治意涵的投射作為突破口，以「傘」作為共產主義運動之代指，而「傳承」傘的阿公即是消失的老黨員……是以，該小說的敘述者「我」，與敘述主體和真實主體之間的界線就被抹消，人物的困境化為了現實陳映真的困境訴說，原先在創作時被刻意消彌的時間標記則一一被假設性的在文中標記，最終，「我」應證了陳映真在理想於現實中的困頓時刻自我封閉的心理與自我批判。

⁷ 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臺北：聯經，2011年9月），頁29。

而在《橙紅的早星》當中，以「篇解」方式進行分析的趙剛，再次面對陳映真另一篇「現代主義之作」——〈第一件差事〉。在該分析當中，作品內的主要人物不再是陳映真的代言者，而是「眼中人」，是「分斷體制」下一個被凝視的問題及個別族群之困境。此文與前述呈現方法上的共性，藉由對真實歷史經驗與族群的知悉，介入一個「抽離時間的謎案」進而得出更接近人物心境與處境的解答。在該文最末，出現了一個「我的私回憶」分節，其完全是趙剛自己在兒時的經歷。主旨是國小老師問了他們什麼是生命的意義，並在板書上自答「生命的目的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兩句。該段以一個親歷者的姿態，重現了時代的一個片段，使前述的分析更為生動。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趙剛在此二書當中以「左派主體的心理、狀態及他們的視野」為討論的追求。其中多次以實作與直述的方式說明「陳映真與其時代及小說的研究不可分而論之」之見地。作為一個陳映真研究之專家，其對不論是陳映真、陳映真小說或是那個「陳映真小說的時代」之理解與體驗，使其研究處在一種若非此人則不可達到之高度。然而其研究方法中含有相對明顯之遺憾，即其中含有過分程度的個人假設，這些假設來自不可逆時間所帶來的生命體驗。以這一人類所無法克服之界限為堵，後人恐難再進行同樣方法的研究以突破其進程。

二、學位論文

論文研究陳映真者所在多有，本節依前人研究題旨，本應一一商榷。然本文研究對象上，範疇實更小於諸多先賢，乃以範疇為「陳映真小說」者，或涉及內容的國族、性別、階級者，為接下來兩節之討論對象。

1990年，首次出現以文學理論針對陳映真小說進行研究之學位論文。羅夏美以《陳映真小說研究：以盧卡奇理論為主要探討途徑》⁸為陳映真小說研究首開一道文學理論解析之門。在該文中認為陳映真小說風格受盧卡奇寫實主義小說之影響，提出以盧卡奇小說理論分析之，屬於「以寫實主義理論試論寫實主義小說」。此舉與後人慣用的「早期現代主義小說」界定有所不同，並不以其小說相對晦澀之形式做主義的指認，而是以主體之年齡、學識的認知，指認其為技巧不夠成熟、情感過分澎湃的時期。該研究出現許多「首創」，除了文

⁸ 羅夏美：《陳映真小說研究：以盧卡奇理論為主要探討途徑》（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學理論之應用，就是對陳映真小說進行分期。該文提出將陳映真小說分為三個階段：早期、轉變期以及政治經濟期。在這三個時期中，從寫實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以得到人物個性強烈的寫實（指向創作主體的內情）；題材轉向寫實，並對這種寫實做批判式寫作；對社會經濟、政治議題做寫實描寫。在這樣的見解下，對於政治的意識與文本內的人物、事件能夠有相當程度的結合。將作家與作品放在起考量，也使得線性的時間與技巧的純熟度是可以被考量的，然其在分期上有可議之處。如在分期時分期之標準顯然並不相同——「早」是一個時間概念；「轉變」是對型態變化的動態描述；而「政治經濟」是具體的議題名稱。將這三個不同規範之稱謂放在一個同一個線性上做討論，恐有其不妥。再者，分期界定的時間區隔亦有疑慮，早期與轉變期之中界為〈試論陳映真〉中陳氏自行提出，作為採納並無不可。惟政治經濟期開始的1979頗為奇特，與上一時期結束的1973相隔六年，其中亦有小說〈賀大哥〉、〈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等又該在何期？分期問題從此時開始，已在陳映真小說研究的範疇中萌生。

1997年，陳映真小說在管永仲的研究《陳映真小說主題研究》⁹當中得到了更細膩的分期。值得一提的是，此二研究發表時，陳映真的小說數皆停留在三十三篇，所以在討論範圍上，兩者是相同的。該研究的方法，旨在針對小說主題與對敘述模式的分析。然其中的問題直觀的呈現在方法與時間之間的矛盾上，從分期也就是章節名稱中可以發現。例如第一期是「青澀少年」的「獨白」，顯然主題上是表現青澀少年，而敘事方法是獨白，這樣的分類既直白又清晰。但是端倪他章，又不免使人疑惑：冷靜的嘲諷、銳利的批判以及激昂的控訴，三者都沒有採用「主題+敘事法」的方式，而且嘲諷與控訴都可以作為批判的一種表現，則該研究雖然細膩的對作品呈現的樣態進行分類，卻無法合理的說明這些分類除現實時間以外的必要性，實為可惜。

2000年發表的《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¹⁰在提出上非常重要。它一方面是以小說著手的研究之延續，更重要的是採用後殖民論述的過程中，社會與小說的表現亦不會分開，而能夠以社會意義作為討論小說基點。該文雖沒有直接說明或採取舊有研究的分期方式，然而在章節分立中，這樣的傳統卻又萌生。如第二章「走過世紀的台灣」中分以殖民主義下的台灣、變遷中的戰後台

⁹ 管永仲：《陳映真小說主題研究》（新北：華梵工學院人文學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¹⁰ 曾萍萍：《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士碩士論文，2000年）

灣社會及後殖民歷程中台灣的發展及其侷限。關於這樣的論述主題，會使人直接聯想到陳映真對台灣社會的性質所提出之意見：

我們一再說，陳芳明說的日據台灣社會性質是“殖民地社會”是不通之論，因為“殖民地”不是一種人類社會演化必由的一種生產方式。一個被殖民的社會，必須和其在殖民統治下的前資本主義經濟性質，例如封建或半封建經濟合稱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才能正確表述一個被殖民社會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即“社會性質”。¹¹

從此便可以發現，這一從小說對話社會的研究在此發生錯位，即陳映真認同的社會性質，與該文所認定的社會性質，有相當程度的不同，甚至是相違背的。正如在討論羅夏美之研究時，其現實主義認同與陳映真本身並不違背；當具備知人論事性質的小說－社會研究在立場上直接反對作家的社會認知，是否會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以意逆志的情形則有待商榷。

2004年，林碧霞的《陳映真小說中意象的研究》¹²當中，列舉了陳映真小說當中的各類意象，並探討小說結構、敘事手法與主題意識與意象使用之關聯。可以說其研究方法相當廣泛，並試圖從閱讀、設計與創作主體的數個面向，對其與意象運用之關聯進行分析，意圖相當積極。然而其中數個小結與總結論時皆出現「不一定有關聯」與「不能得出其中原則與習慣性」之語，使得研究在實質獲取上是破功的，實則相當可惜。

2011年發表的《陳映真小說中知識分子與社會關係研究》¹³在動機上出現了可議之處。首先，在詮釋前人研究時，該文採用的說法是「過往的研究大都以他的『意念先行』為由進行作品分析，以其文學觀檢視其文學實踐」，而「意念先行（或意識先行）」一詞的使用其實並不妥當。該詞意在指認學術研究是否有「先畫靶，再射箭」的答案預設，而質疑該研究的不客觀。然而將這一詞彙使用於文學創作上則有悖創作本身的意義。若以動機說明真實創作主體與作品間的關聯，勢必是有一「欲藉此形式表達之物」，以此「物」可稱之為「意」或者

¹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42。

¹² 林碧霞：《陳映真小說中的意象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¹³ 謝曉青：《陳映真小說中知識分子與社會關係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內涵」，確實可視為「文學觀的是否驗證」，卻不能批判為「意識先行」。其若無心，可視為誤植，若為有心之舉，則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然而，其範圍的設立以小說中的知識分子為限，從這些知識分子回推作者身分意識之如何建構，後又將這種建構與社會、事件間的關係納入分析的方法，這一將小說視為陳映真自我與社會之互動產物的分析方式，確有異於前人之處。

2012年發表的《陳映真小說人物角色研究》¹⁴立意「人物是小說之構成要素，小說家欲表達任何主題，必須透過人物塑造加以詮釋，所以透過對人物角色的分析，更能突顯出陳映真所關注的問題」，然而該文在人物方面的分類過分廣泛，在第四章一章內以人物類型分節凡三十四類，從這樣的分節當中，難以達成系統的共性體察。雖然在第五章針對角色塑造之內涵進行討論，然因為前述過於細膩的分節，使得這種內外部的結合是有其困難的。

2014年楊欣慈發表《從〈麵攤〉到〈萬商帝君〉——陳映真小說的敘事研究》¹⁵，首次出現全部使用敘事學之陳映真小說研究。該文從視角、敘事者、敘事時間和話語四個層面對小說的敘事特性進行探討。其中最重要的提出，是將敘事學意義與陳映真小說的分期傳統結合，並且再分類成「前期」與「後期」兩期。意義上來說，以寫作的手法與設計來進行分期，在標準的統一與時間的說服力上比起同樣採分期的其他前人更為合理。然而其在分節與操作上依然存在疑問與待定的方面。該文以兩個分期為分野，分別由兩章進行敘事討論。在「前期」的第三章進行非敘事性話語、敘事手法與敘述者特徵的討論；在「後期」的第四章則進行敘事閃回、交錯、視角切換與敘事者轉換的討論，在理應「同等分類」的兩章當中，卻無法見到同樣架構之討論。這樣的安排使得敘事與時間軸的關聯難以服人。

大陸方面，陳映真研究之相關論文數量龐大，針對陳映真小說為主要對象者凡十篇，因為在許多方面有相似之處，遂在此不逐篇討論，而採共同討論。2001年與2011年，分別出現兩篇同名的學位論文《陳映真小說論》。雖以同樣的主導標題為名，架構卻有其不同。王向陽¹⁶（2001）之論文架構相對簡單，除引言與結語則只有內文兩章且皆無題名。前一章主要涉及內容意義與價值，後一

¹⁴ 蔡孟莉：《陳映真小說人物角色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年）

¹⁵ 楊欣慈：《從〈麵攤〉到〈萬商帝君〉——陳映真小說的敘事研究》（臺南：國立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年）

¹⁶ 王向陽：《陳映真小說論》（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

章則以中國文學傳統的繼承與外國文學的吸收運用為分析點。雖在格式與先行規範上有標示的瑕疵，內容卻簡扼明白。而武莎¹⁷（2011）在主題上亦不能明確表示內容旨要，然而內部架構以時代語境與文學觀、魯迅對其之影響、西方現代主義之吸取與借鑑以及文化精神內涵，有明顯的「外、內、外」之辯證軌跡意圖，其內容雖然不盡相同，卻能發現兩文皆關注陳映真小說的內部意涵與其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之方面。

2004年的《孤獨的白楊》¹⁸不以文學理論為基礎框架，依舊採用知人論事之邏輯，從時代、言說及特質三個方向對其小說進行分析。惟其提出之「孤獨」的思想特質於其他針對陳映真小之專論中較為少見。時至2013，洪豆發表了《人間的“後街”——陳映真小說研究》¹⁹以「陰暗後街的呈現」陳映真小說的定義，是難得強調共性的研究。以主題中的出走與懷鄉、女性形象與左派困境為方向，進行全面的研究。然而其方法雖指出陳映真小說中的數個共性，卻難免在操作上落入例證過少的窘境。如在第一章第三節論及資本時卻只舉例〈夜行貨車〉、女性形象只有兩種分類與分期並未完全講解都是遺憾之處。

2014徐婷婷的《陳映真小說中的懺悔意識》²⁰中頗有創見，以陳映真生命經歷中的基督徒身分作為文學創作體現中的意識形態進行分析。其中對小說的分析有懺悔意識的呈現與懺悔意識下人物的命運兩部分，可以看出是針對敘是語言與人物情節安排的分析。然而第一章與第二章的兩個標題「中西方語境下的懺悔意識」與「懺悔意識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頗有同言反覆的情況，然而對比其中創見仍瑕不掩瑜。2016年發表的《陳映真小說的鄉土敘事》²¹彷彿也屬於研究歷程上的創見之作。因為過往的研究與討論更多的將陳映真小說放在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的範疇進行討論。刻意專就鄉土敘事進行討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進行「鄉土文學」認知的研究。然而從陳映真小說的內容出發，不難發現其小說與其它定位於鄉土文學的小說有相當的不同——它們並不以「描寫鄉土」為主要表現。從該文分節之標題如「書寫底層」、「貧困的兩難」、「鄉愁」與「討論異化」都不能夠反推其小說進行了鄉土描寫。作為釐清緣由的「鄉土敘事成因」欲從鄉村小知識分子與漂泊感著手也略顯牽強，這畢竟只出現在陳

¹⁷ 武莎：《陳映真小說論》（泉州：華僑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¹⁸ 倪金華：《孤獨的白楊》（泉州：華僑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¹⁹ 洪豆：《人間的“後街”——陳映真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²⁰ 徐婷婷：《陳映真小說中的懺悔意識》（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

²¹ 張紀梅：《陳映真小說的鄉土敘事》（無錫：江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映真小說的較少數當中。

2017年有兩篇陳映真小說論文提出，其一是《陳映真小說中的人道主義情懷》²²，其二是《陳映真小說的創傷性回憶書寫》²³。前者針對的小說內容與之前的研究並無太大不同。舉凡底層、異化、個體關注、魯迅文學和基督教對其影響皆在前述的討論中有出現過，比較難以提取新的見解。後者則在標題上犯下重大的瑕疵。一般而言，「創傷」是一狀態的名詞指認。要進行這一指認，則一定存在指認的對象。而作為經驗指認，在小說研究中的唯一對象就只有創作主體。會使人聯想陳映真與創傷有關的經驗在歷史上的選項並不多，以這一時期的主體經驗作為整體小說創作的預設並不妥當。該文使用「創傷性」一詞則更使人費解。創傷是否可以作為一種「性質」來框架小說創作，實頗為可議。

2018年，《陳映真小說的中國情結》²⁴一文為陳映真國族觀與其小說之關係作了一次精采的梳理。該文從文學想像與主體探索、國家想像的多元困境與中國之子身分建構三個方面進行，脈絡與層次是相對明顯的。為陳映真小說研究延伸到政治觀的探討之路開設一種專項。尤其在「中國之子的身分建構中」，從中國認同、左翼道路與歷史敘事三個方面，由大而小的指出中國認同的文化意義、政治意義與敘事實踐，邏輯相當清晰。至2019年，牛傳琦發表《後殖民視域下的陳映真小說》²⁵與十九年前的《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遙相呼應，以後殖民之觀點切入陳映真小說研究。而與該文不同之處在於，牛傳琦在處理後殖民議題時，採用東方主義的論點，以東方建構為主體的表現。這讓論述的基點更為扎實，且明確了何謂「抵中心」所說的中心（對象化）。且該文強調小說內部現象多過於對外部社會的提及，較能符合陳映真小說研究的主題。

三、期刊論文

本文曾於前述中提及關於陳映真的研究之多一事，這一現象到了單篇論文的領域時則更加茂盛了，為更精確本文對象之範疇，以下針對涉及「階級」、「國族」、「性別」分析者進行討論。

關於「階級」的陳映真小說討論並不多見。以此為題者，目前只有趙剛的

²² 姜雁：《陳映真小說中的人道主義情懷》（鄭州：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²³ 唐蓉：《陳映真小說的創傷性回憶書寫》（金華：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²⁴ 王雅楠：《陳映真小說的中國情結》（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²⁵ 牛傳琦：《後殖民視域下的陳映真小說》（安慶：安慶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階級與人性狀態——試論陳映真〈兀自照耀著的太陽〉中的現實主義〉²⁶一文。關於階級、現實主義兩個詞彙，有一段論述本身即可給予詮釋：

作者透過這篇小說，以一種把他自己也包括進來的方式，對布爾喬亞的（特別是男性的）成人世界的虛空、虛假、虛榮、自是、自瀆、自欺，以及對他人的麻木不仁，進行了嚴格的逼視。作者也看到了在這個階級中的女性的不大一樣的道德狀態；女性在布爾喬亞的虛無中仍然能夠神秘地保有某種真實感，讓生命有些重量。²⁷

此論述直接點出討論的階級、它的樣態，以及它們的出現是為了一種現實的批判這件事。其中，能見到趙剛提及了小說中所謂的布爾喬亞階級亦出現了男性與女性的區別，此一「真實感」的評說可視為「接近人」的指認。在該文最末，提及小說對於布爾喬亞的描寫，其批判性帶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指涉，是一種對自我的布爾喬亞式虛無之意識，以圖對這種現狀的超越。是以，該文的意見並不是發現小說內部的階級衝突，它甚至直接揭露了勞動階級在該小說中的缺失。而這樣的階級表現，趙剛認為始終是對向陳映真自己，而非更明確的階級關係指涉。

涉及「性別」議題的陳映真小說討論中，目前最具有針對與重要性意見的當屬前一大節論題討論時提及的〈迷走《忠孝公園》——陳映真近期小說的女性缺位〉²⁸。該文旨在針對女性人物表現問題對《忠孝公園》當中之小說進行討論，然而因為該文提旨中提及的「缺位」問題，所以文中亦出現其它陳映真小說當中女性形象與人物定位的討論。該文的立基是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其所謂的缺位問題，並不是指小說完全無有「女人」，而是這些女人相較於以前表現更加立體、有所承擔，甚至在某些方面較男性英勇的形象在後來的小說中消失了。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就算過去的女性形象較為鮮活，可以說陳映真敘事帶有一種陽剛與陰柔並具，女性依然只是說中的陪襯者，這與〈男性世界的邊緣人——陳映真小說裡的女性形象〉²⁹提出的核心意見相同，定義了小說中相

²⁶ 趙剛：〈階級與人性狀態——試論陳映真〈兀自照耀著的太陽〉中的現實主義〉《淡江中文學報》第二十二期（2010年）

²⁷ 趙剛：〈階級與人性狀態——試論陳映真〈兀自照耀著的太陽〉中的現實主義〉，頁125。

²⁸ 周芬伶：〈迷走《忠孝公園》——陳映真近期小說的女性缺位〉《臺灣文學學報》第五期（2004年）

²⁹ 王瑞華：〈男性世界的邊緣人——陳映真小說裡的女性形象〉《福建論壇文史哲版》第1期

關議題的現象。

趙剛在〈理想的心，慾望的眼——重讀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麵攤〉〉³⁰中，將閱讀角度從原先的浪漫、溫馨之小品，提取出其中理想與性作為新的切入點，並加入一個名為「暗夜遊魂」的主體意識以轉譯該作。從大眼睛警官所代表的理想之形，與母親所代表的隱藏慾望，再一次說明陳映真在該時期小說的「現代主義」表現，所為包藏的理想（左派的）與慾望（男性的）之掙扎。這與他的另外一篇文章〈頹頹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³¹之觀點持一致口徑。與其相似的觀點，還有〈女性、革命與知識分子的人格模擬——論陳映真小說《山路》〉³²提出革命見證者蔡千惠的形象是為女性，是左派知識分子主體因創傷經驗而有的自我隱藏之安排。

國族方面的討論是較少的。〈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瓦解「本／外省人」、「台灣／中國人」、「美國人」、「歐洲人」……〉³³屬於較詳盡的分析。藉由對小說中的分段對立者進行分析，重構並解析所謂的第三世界台灣社會狀態。而其他大陸方面期刊如〈論陳映真小說中的感時憂國精神〉³⁴和〈論陳映真小說中的中國情結〉³⁵則顯然是對陳映真本人的國族觀有一定的價值評判後針對其讚揚的足價值進行分析，較不具備參考價值。

綜合前述專書、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之內容，可以為陳映真小說研究的現況作一梳理，並得出一些共同的現象。最為主流的共識似乎是在進行研究的時候，對陳映真小說進行「分期」。這似乎是源自於陳映真本人那篇〈試論陳映真〉³⁶中，對自己小說進行早期、寫實主義期之行為的影響。然而幾乎所進行分期的研究，不是在分期方式的標準不一，就是其分期對應內容難以服人，且都受到真實的時間考量所苦，而這又關乎到陳映真小說研究者們總不願放棄藉由其小說建構主體真相，或者藉由真實的時事來佐證小說的意涵（或陳映真的主

（2000年）

³⁰ 趙剛：〈理想的心，慾望的眼——重讀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麵攤〉〉《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6期（2009年）

³¹ 趙剛：〈頹頹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8期（2010年）

³² 劉堃：〈女性、革命與知識分子的人格模擬——論陳映真小說《山路》〉《婦女研究論叢》第4期（2017年）

³³ 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瓦解「本／外省人」、「台灣／中國人」、「美國人」、「歐洲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7期（2017年）

³⁴ 高玲：〈論陳映真小說中的感時憂國精神〉《散文百家》第1期（2022年）

³⁵ 姜智芹：〈論陳映真小說中的中國情結〉《東岳論叢》第2期（2001年）

³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二）（台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15-328。

體狀態)。這樣的做法固然更加貼近陳映真的人與觀點，然而卻時常不是喪失了研究中的共性提取，就是過分需求陳映真意見，無法單從小說文本之表現論及意涵，是較為遺憾的。是以本文欲透過針對文本這一規範，在研究過程中捨棄「分期」與「引用陳映真之意見」的操作，並以尚沒有見到的結構主義與世界觀得出來進行陳映真小說研究。

第三節 結構原則與世界觀之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

本文以「陳映真小說中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為題，擱置外部因素而關注小說文本的內部現象，以此前提作為研究框架，將研究下分為兩個階段，即結構的表現原則與主體意識之價值觀。而結構表現方面，依據文本表層涉及的議題分別可以分成「階級」、「國族」與「批判」，討論在這些主題之下，文本結構如何生成，又為深層意義的價值對立提供了什麼可循之跡。

在第二階段當中，本文將藉由原則性的表層結構，以「第三元的介入」與「價值在人物內部活動中的生成」兩種類型，對文本的深層結構逕行重建與分析，並最終在這種深層的對立當中，藉由文本的敘事表現模式探尋文本當中隱含的敘事主體之世界觀。

涉及理論術語的部分，在此依主題的分類進行爬梳。在研究當中，涉及階級主題者，其概念係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級分析。在《共產黨宣言》當中，這個宣告在說明其「對抗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之意圖後，第一個分類標題便是「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由此可以發現，「階級」概念在其一經提出之時，便具備了「對立」的前提。而其中有一段這樣的論述：

在早期歷史的各個時代裡，我們幾乎到處都可看到社會錯綜複雜地畫分為各種不同的等級，各自有高低不同的社會地位。在古羅馬，我們看到貴族、騎士、平民和奴隸；在中世紀，則是封建領主、陪臣、行會師傅、傭工、學徒和農奴。並且幾乎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各自不同的高下等級。³⁷

所以，階級在它的表現上，依附著時代的社會制度型態，而並不會固化在某個

³⁷ [德]卡爾·馬克思，[德]菲特列·恩格斯著，麥田編輯室譯：《共產黨宣言》（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頁39。

永世不改的外觀上。從陳映真小說當中，因為其選材上的寫實主義，對於社會客體的捕捉使得人物情節存在階級之對立。並且其階級可以分為資本或體制的職場階級與文化上的性別階級。

在處理完階級為主的議題以後，本文將接續針對文本內出現的國族議題加以探討。而「國族」一詞係對國家民族的一種合稱。當研究涉及國家民族之時，民族主義的討論就必須被提及，《想像的共同體》所提供的概念必不可少：

在此情形下，他暗示了有「真實」的共同體存在，相較於民族，這些真實的共同體享有更優越的地位。事實上，所有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許連這種村落也包括在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像的。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它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³⁸

是以，當安德森的概念提出，民族與國家的高度在一定的程度上被認為是相等的。除卻事實上的利益爭奪，與其他資源的積累所帶來的「實力」討論，國與族在被「想像」的這件事上是一樣的。而想像則成立於發起想像的主體，也就是共同體當中的人。當人物的衝突基於「想像的不同」或「共同體的不同」，就能夠被視為「國族的衝突」。而依照文本中出現的型態，研究方向應可以區分為「同一國族但在想像上有所差距」與「不同國族，共同體上被基本區分」的兩種類型，而會出現「同族對抗」與「異族對抗」之分野。

階級與國族的議題幾乎可以佔據陳映真小說之大多主題。然而在其中，有一些探討個體人物處境的小說仍因為缺乏與其他個體、階級的對抗行為而無法被列入這裡的討論當中。本文將以其處境在深層結構上所延伸出的批判意識為探討目標進行研究。這樣的文本，與其他兩章涉及的文本，不一定會表現出主題上的不同，而是相似現象的另一種形式。一般而言，涉及某一主題的對立時，小說的對立結構呈現如下：

表1 小說二元對立結構表

階級 / 國族文本對立概念	立場 A	立場 B
---------------	------	------

³⁸ [美]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版，2010年），頁42

對立組合	人物 a	人物 b
------	------	------

如圖所示，一般涉及對立的文本當中，在場域或是爭奪的事物之間，通常存在兩個（或以上）立場，在小說當中，能夠發現代表這樣立場的人物，組成這些對立的組合，發展出對立的具體現象和樣態。然而除此之外，亦有一些小說不符合這種原則：

表2 批判文本對立結構表

批判文本對立概念	立場 A	立場 B
對立組合	人物	環境

這樣形式的文本，本文依其不以某依主題為預設，進而在敘事中設計出相同程度、層次之對立單位的狀況為辨認，以其文本呈現之批判意圖為名，稱為「批判文本」。是以，當章節展開，可以發現「階級」、「國族」與「批判」成為三個分類的準則，然而這三個詞彙的意義卻不指涉「同一層次」的現象：「階級／國族」針對表層的設計；而「批判」則針對深層的意涵為一種分類的同一性質。

提及結構研究，則不可越過結構主義的意見。其中，李維史托的分析作為結構研究的原則影響了本文，即他在神話研究時歸結出的二元對立的變體概念：

我們已經證明，關於一個名叫比里莫多的一些博羅羅人神話儘管表面上各個相異，但可以歸為同一組，他以下數基本結構為表徵：一種過分的家庭關係概念導致通常相互連結的各個元素相分離。靠著引入中介項，聯合又重建起來，而神話的目的就是為了解釋中介項的起源。這種中介項有：水（天和地之間）；身體服飾（自然和文化之間）；葬禮（活人和死人之間）；以及疾病（生和死之間）。³⁹

這一概念所涉及的二元的思維模式在其他結構主義者的提出中也能看見，如格雷馬斯的行動元理論，即在三組行動元模式中個別的以對立的方式，推演這三者的內部關係與它們的形式。所以當提及文本的結構，實際上就是在探討文本

³⁹ [法] 克洛德·李維斯陀著，周昌忠譯：《神話學：生食與熟食》（臺北：時報文化，1992年），頁87。

內的對立關係，「凡結構必對立」遂是所有結構原則下的底基。是以，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針對三個主題進行結構的討論，必須是針對這些主題在文本中所呈現的對立關係進行探討：如一個上階級對下階級施行壓迫，顯然是涉及階級的對立結構；一個外國人跟一個中國人在搶東西，就涉及國族的對立結構；一個過往的壓迫者，受他自我的信仰崩毀所苦，就會是批判文本中的對立結構。

在確認文本內存在的對立結構之後，研究來到下一個部分，也就是藉由對深層意義上的對立之分析，尋求隱含創作主體可能的價值意識以及其所代表的世界觀，其概念出自高德曼之發生論結構主義。該理論主要以探究文本之意涵結構梳理文本如何建構，並且在這些對立的意涵中，尋求創作主體的世界觀。

所以，世界觀的得出代表兩個意義：一是價值必須是兩個以上的存在，並在文本敘事過程中有所揀選；二是使用該方法的研究討論必將是文學社會學範疇的討論，因為其雖不具備數字量化的人員考察，也不考慮媒體對該議題的討論，甚至沒有真實作者的參與，然而卻以社會體制、文化意涵等哲學問題，概括了創作主體如何去「觀看這個世界」。

而本文在討論過程中，將就其表層出現之形式上的對立，進行深層對立的探討。在這一過程中，本文將藉由「改變對立的第三元」及「語意的內涵」兩種發現，觀察對立於文本當中的下一個階段。藉由對這兩種現象的分析，可以見到形式上的對立在價值意義層面的指涉，並藉由對敘事表現安排的探討，得出敘事主體更肯定（去表現）哪一種價值，以辯證該文本的價值意識，與敘述主體的世界觀。

合前述所言，本文將以「陳映真小說中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為題目，分以「階級」、「國族」與「社會／政治批判」為對象進行研究，並以陳映真小說中之世界觀為終極追求，以期該題之提出，為陳映真小說研究更增豐富、圓滿。

第二章 陳映真小說中階級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

在陳映真小說文本中，可見相當比例關乎階級的題材與內容。然而要為這些階級議題找一個共性稱呼顯然並不容易。¹ 在處理本章當中相關的分類及其稱呼之前，必須先行定義本章主旨的「階級」一詞。階級依其表面符碼呈現出一種相當形象化的特質，「階」可以視為樓梯、台階，階階分明、逐步向上。「級」則說明了這種逐步向上的形象所代表的意義——分明的梯階表現人或團體的上下關係，其內部的特質，可以在《共產黨宣言》中發現：

自由人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地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傭工，總括的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自始至終處於相互對抗的地位，不間斷的進行或隱或顯的鬥爭，每一個鬥爭的結果，不是整體社會得到革命性的改造，就是參與鬥爭的各個階級玉石俱焚。

……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係從封建社會的廢墟之中萌芽生長起來，但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只是建構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以及新的鬥爭形式來替代舊有的而已。²

由此可以發現，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意見中，階級的內部特質有二：一是階級關係實際上就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在發生於階級間的活動，是不同形式的鬥爭；階級與它的表象不是永恆不變的，在不同時代、生產技術與環境中（在理論中，可能是前一輪的階級與鬥爭發生了革命性改變或是玉石俱焚了），壓迫條件會更新，是以新的階級樣態將會誕生，然而上下階級依然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其第一本質永不改變，改變的不過是鬥爭之形式。而本章所謂的階級，乃以此論當中的兩種內部特質作為原則，進行陳映真小說中人物間階級

¹ 例如醫生與政治家，或許分別出現在兩個結構相似的文本，也都面對著非知識階級的群眾。這時如若將醫生與政治家並稱「知識階級」（他們都是受過高級的教育，才得到了作為工具的知識與社會地位）看起來似乎相當合理。然而這是遠離本質的。因為當文本結構涉及「知識 vs 非知識（無知、未開）」，則可以發現故事中充滿有知與無知的拉扯，但是這樣的文本在陳映真小說中可以說是極少見的。雖不是沒有「主要人物是知識分子」或「人物的地位藉由學歷取得」，然前者類型篇數過少，而且更多不單純是想表達知與無知，而富含政治的思考於其中。而後者更不消多言，「人物的地位藉由學歷取得」代表學歷不過是這個人物被交待的背景，當然可以指涉社會上的典型，然而更多要著墨的自然是人物的現在、前景，那麼人物的地位顯然才是主要被討論的對象。是以本文在將階級分類的過程中捨棄「知識 vs 非知識」。

² 〔德〕卡爾·馬克思、斐特烈·恩格斯著，麥田編輯室譯：《共產黨宣言》（臺北：麥田，城邦文化，2021年12月），頁38-39。

關係的發現與分析。

陳映真小說當中，階級的存在並非只限於一種場域或是分別方式，而在此可以依內容分為「性別關係」的階級與「職場關係」的階級，這樣的分類針對陳映真小說當中普遍的現象及其樣態，因涉及題旨，在此先行對「職場階級」與「性別階級」這兩個專有名詞進行定義：職場階級針對陳映真小說當中以職場為描寫的片面中，呈現的工作場和當中人物間的上／下級關係及其延伸的衝突、爭奪與壓榨關係。

其與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階級壓迫的基本提出有局定性的不相同——馬克思、恩格斯在針對工業社會當中的階級鬥爭現象提出定義時，非常明確的予以「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二分，然而這樣的二分與陳映真小說中職場的階級呈現並不全等。

在其小說中，嚴格來說並不表現真正的資本家與勞工之對立，反而是將階級間的差距縮小，以職場當中的上司與下屬為表現對象，所以這樣的所謂階級關係，雖不存在對資本家的描寫，卻能夠體現在資本建立的公司體系中，壓迫與異化在人物關係的呈現；而相較於資本體制內等第化的階級變體，「性別」在一般的討論當中並不會被視為一種階級的呈現場域。

然而，性別關係與職場關係，在陳映真小說的人物表現上，卻有相似的「上對下」本質，這樣的現象並非一種全新的發現。在《黑皮膚，白面具》當中，弗朗茲·法農就曾經針對不同膚色種群的人，在男女交往的各種組合下呈現出的精神狀態進行討論，³從相關的論述可以發現黑人社群內部存在的自卑情節，以及這種情節反推出人種間文化上的殖民處境：

表3 西方社會的優越意識表

概念	優越者	卑下者
西方社會中的人種階級團體	白人群體	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群體

是以，雖然這裡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因為膚色與文化差異導致的「分類」，卻不難從這關係的本質中，看出文化、膚色作為一種「資本」而使得白人與有色人形成「上與下」階級型態。然而這樣將人純粹分為「白／有色

³ [法] 弗朗茲·法農 (Frantz Fanon) 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心靈工坊，2007年1月)

」的二分，卻不是其論述的終點：

表4 種族與性別之真實階級表

上層種群	白人男性
	白人女性
下層種群	有色人種男性
	有色人種女性

在論及黑人的自卑與認同的「漂白」時，法農採用兩種異性戀組合：「有色女與白男」、「有色男和白女」作為精神分析的舉例。然而，在這種精神分析當中，黑人主體，尤其是黑人男性主體的被剝奪，與白人男性的恐於被剝奪，卻在無意識間形成一種完美的對稱——男人害怕性的權力，也就是女人，被別的男人奪走。是以，表面上是「白與有色」的支配關係，卻在這兩個概略化的種群內部，都能看見「男與女」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本文基於這種現象，而將性別視為一種階級，並同樣從文化對男女的影響，分析性別人物間的支配與被支配之關係。

綜上所述，本章將針對其於表層展現之對立結構，以及這樣的對立延伸至內涵層面時，文本表現的價值傾向，下分為「結構原則」與「價值意識」兩節，並分別以「職場」與「性別」兩種階級關係，做為對立的主題進行分析。

第一節 陳映真小說的階級結構原則

在涉及階級對立的文本中，可以發現必然是一個階級的人物，對立於另外一個階級的人物。這樣的對立形式，說明陳映真小說當中階級的成立是建立在人與另一個人的關係上。而個體與個體間的階級關係，是階級可以成立的最小單位，也使得敘述這樣關係的文本，其主題之範疇相對顯而易見。在涉及一男一女、父子、婆媳等人物情節的關係，可以視為性別的階級展現；老闆與員工、上司與下屬、員工與位階更下級之員工，這樣的關係則歸類為職場階級的展現。是以本文將以上述規則為基礎，下分為職場、性別階級的對立結構兩個小節。

一、職場階級的對立結構

階級的表現，無外乎在其「上對下」本質的透露。在陳映真以虛構商業大樓「華盛頓大廈」為名，以職場為主要描寫場合的小說中，自然更容易出現關於主管／下屬或是老闆／員工這樣的階級關係。其中，〈上班族的一日〉、〈雲〉以及〈萬商帝君〉⁴的內容，最能呈現陳映真小說之職場階級，以及其關係中的對立。本文將在下列針對它們進行分析。

在〈萬商帝君〉裡，文本表現相當多的人物以及他們之間的情節，在此之中，「上司與下屬」的情節關係在文本的前半段率先出現：

林德旺細心地看著陳經理……他還是他啊，林旺德想……根本沒有把這姓劉的放在眼裡。可惜的是：陳經理沒有看到我不甩他的樣子，他想……他站起來，望著布契曼先生，堆出一個大約看起來蠻和善的笑臉。

……

……那簡直也不是握手呢，陳經理，他熱切地在心裡頭說……就是可惜陳經理沒有看見這，林德旺懊惱地想著。我不會的，他跟自己說：我不會心浮氣躁。你考驗我好了，陳經理，我是你的人……⁵

敘事不斷的在林德旺的內外部進行描寫，使得幾乎沒有與其他人進行互動的林德旺，其狗腿的、急於表忠心的樣態完整地呈現出來。在文本中，林德旺很敏銳的發現陳家齊與劉福金在權力與利益上的衝突，並且希望藉著表現自己對劉的不屑取得陳的信任與器重，從這樣的表忠行為可以發現，下位者確切的理解自己地位比經理低下，然而他的理解顯然與上位者的經理有著顯著的差距：

「生病了？」

……他低下頭，拚命搖著頭。

「有病就去看病！找 Rita 要勞保單不會嗎？」陳經理皺著眉頭說。

「我沒有病。」他微笑著說，「謝謝您，陳經理。」

「沒有病就好好工作！」陳經理怒聲說，「不要整天像個遊魂！」

⁴ 內文上述三者加上〈夜行貨車〉即為「華盛頓大樓系列」的全部內容。本文將在後文章節涉及國族討論時，以〈夜行貨車〉與〈萬商帝君〉做為例子納入討論當中。其中，〈萬商帝君〉雖然已經在此處的討論中提及，然該文本涉及的面向是多元的，在不同主題的討論中舉例的文本情節亦不會相同，故將該文本放入此處的討論中。

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18。

林德旺望著他，心裡想，他在說什麼呀，怎麼我全聽不懂。哦，是關於那個「香港的」嗎？呸！「香港的」有什麼，值得您陳經理這樣生氣。他想著。⁶

雖然兩人對階級的上下關係有著一樣的理解，然而對於造成這種階級關係的公司體制上，兩人的理解卻有非常大的不同。於林德旺而言，上司與下屬的階級關係，就是派系以及其所帶來的紅利；而對陳家齊而言，每個階級有他們的職稱，職稱涉及他們的業務範疇，理解階級的方式只有人對他們業務的把握程度。這樣的理解差距，使得林德旺一切的拍馬終究是徒勞的：

突然間，她看見三封她寄出來的信，整整齊齊地擺在汗穢不堪的枕頭邊。她拿著這三封信，發覺除了第一封，其他的兩封，卻一直不曾打開過。她知道，其中有一封說，陳經理發覺他請長假不高興，希望林德旺快些銷假上班。最後一封信則是經過布契曼先生親自簽名的英文信：林德旺逾假不歸，應予撤職。為了怕林德旺不懂，陳經理還特地請她附上中文譯本，和一張半個多月薪水六千三百元的支票。⁷

林德旺在現實中無法從工作上得到價值感，從而對自己的前途感到畏懼。然而在職場環境中，情感的問題被無視。林德旺在這種理性的機制內，展現出的事實就是無法提供業務上的效益，而這是他在職場的階級關係，能提供上位者最基本的價值⁸。無法證明這種價值的林德旺，被上位者從階級關係中排除了。是以，在該文本當中，階級的對立並不是以一種壓迫完成的，反而是一種上級對下屬的效率、能力以否定之「上司（評量者）vs 下屬（被評量者）」的對立結構。

1978年發表的〈上班族的一日〉中，講述一個在跨國公司「莫里遜」工作的（會計部）報表組主任黃靜雄，因為沒能得到主管楊伯良所許諾的升遷，憤而提出離職，而無事的一天。然而，這種客觀上外部的「無事」，並不是真相上的無事。事實上，這一天的度過，正好是一場內部拉扯的總體展演。它的核心是一種對決，一場衝突的後續發展：

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326。

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401。

⁸ 此處的價值並不是理論或是價值觀體現出來的精神上的價值，而是業務或者勞動者藉由工作所能提供給上級、資本家的利益。

「怎樣，報表差不多了吧？」楊伯良說。

他知道 Bertland 分明已經迎面看見了他因為無由自主的羞恥、忿怒和挫傷所扭曲的難看的臉，這若無其事的問話，使他僅剩的抑制力在剎那間繃斷了。他從口袋拿出那份全錄副本，撕成四半，扔在楊伯良的桌子上。

「大家這樣互相欺騙，沒意思。」他困苦地說。

.....

「我應該跟你先提的，不錯，」楊伯良說，「Olive，他們要塞一個人來，就塞進來，我能怎麼辦？」

.....

「你跟我這麼久，Olive，」楊伯良說，「也跟你說過多的話。我不是說過嗎？他們洋人頂多三、四年一輪，我和榮老董扣得很近、很密，我們才是長久的……你明白嗎？」⁹

這樣的對話不會發生在陳家齊與林德旺之間，楊柏良與黃靜雄之間的階級差距更小，而且黃靜雄所能帶給楊柏良的效益更大而起且直接。是以，雖然兩組人物的關係都屬於「上司／下屬」的關係，然而陳與林之間那種純粹的權力制約關係，並沒有發生在楊與黃的關係性質當中。楊柏良與黃靜雄是一種互惠的利益換取關係，只是楊柏良具備上位者的優勢，以更高的位階驅使黃靜雄，而黃靜雄卻必須付出心力，以提供楊柏良需要的東西——所謂的「相互欺瞞」的指控，實際上只有下位者的利益不斷被擱置、誑騙，是另一種階級壓迫的形式：

榮將軍需要他，黃靜雄自然明白。好幾次，楊伯良把榮將軍厚厚一疊發票，交給他。楊伯良什麼話都不必說，他就會把這些發票四平八穩地登上公司正當的開銷。楊伯良需要他，他自然也明白。「把這筆帳轉掉，」B·Y 若無其事地說。他於是就合情合理地轉掉，即使紐約委託的查帳公司也無從查起。¹⁰

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17-318。

¹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320。

從這些閃回的內容能夠發現，黃靜雄非常理解自身的處境。受壓迫者為了取得上位者所提供的較小的利益，而賣命以提供更大的利益給上級者。是以在某一程度上，「重要的下位者」也能通過掌握自己能提供給上位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上位者。然而只要不離開由上位者掌控的體制，實際上這種重要的下位者亦不能脫離被壓迫的本質：

就在這時候，床頭上的電話驀然響起。

——Olive……

是楊伯良的聲音。

……

——我剛剛從榮將軍的家回來。他說他那個寶貝姪兒早上倒了越洋電話，說是不願意回台灣來，向總公司辭職。

「哦。」他說。

——這個艾德華·趙，說是如果這時來台灣，他好不容易就要等到的Green Card 就會泡湯。嘿嘿。

……

——不說這了。你只不在一天，我才發現 Joe, Nancy 全部派不上用場。報表一塌糊塗呀……

「哦。」他說。

——你說什麼？

「我明天去看看！」他大聲地、生氣似地說。¹¹

從黃靜雄於電話中妥協開始，這種階級關係就無有改變的可能——那個許諾給黃靜雄的位子依然是空著，但沒有給他。在回歸崗位的同時，不滿依然存在，然而始終拿楊柏良沒轍，因為利益、權位的誘惑而甘願受騙。人物關係在文本內，由始至終都是「上司（誑騙者）vs 下屬（受騙者）」的對立結構。

由前述的例子可以發現，階級的對立結構藉由相對清楚、單一的人物關係與事件進行架構。這樣的情況在〈雲〉當中以較不相同的形式呈現。在該文本當中，階級的問題，不再藉由一個主管或老闆與一個下屬之間的關係。它在涉及這議題的方面，有更大的篇幅。更多的人物，表現出更豐富的階級關係——老闆下有廠長、總經理下有經理、廠長下有男女工人。然而，階級間本身帶有

¹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344-345。

的對立性質，以及爭奪生產利益的真相，使得一些較為細緻的階級分類，將在較大的對抗中分別回歸於「上位者」與「下位者」兩個集團。如此一來，這些看似更多的階級人物，實際上卻依然維持著二元的對立真相。

在〈雲〉當中，所有衝突的匯聚點，乃是以經理張維傑為領導的女工們，企圖組織一個真正屬於工廠端基層勞工的工會。然而給予她們這一行動之動機者，是經理的上司外國總經理艾森斯坦：

「艾森斯坦先生，我學到太多了，真的非常謝謝你。」

在講義接近了尾聲時，他由衷地說。

……

「在這兩個月裡，我知道我又挑對了人。」艾森斯坦先生笑著說。

……

過了聖誕節，艾森斯坦先對他下達了第一項行動的命令：重組工會。

「來台灣之前，我已經讀過了一些一般的和這個公司的工會資料。」……「那樣的工會，對公司是方便得多：言聽計從的。」艾森斯坦先生說：「可是，這種工會的代價，是怨恨、不忠、生產效率低下。」

……

他決心全力以赴。首先，他讀中華民國《工會法》。其次，他到廠裡去找人了解。就在那時候，他找到敏子和趙公子、素菊他們。¹²

艾森斯坦之理論，是給予更好的待遇、環境於勞工，於是使勞工在工作中有更好的效率，甚至是從精神上認同體制。這並非是去階級理念的實踐，而是以互惠的方式鞏固階級與體制，從中除去階級關係中的惡劣性壓迫，並藉此提高公司之獲益，才是其理論的真相。而從人物行動來說，一個上位者藉由他的權力，來促使下位者去爭取屬於自己的更多利益，這看起來十分反邏輯的行為，在衝突的最高點展現出它的真相：

當庫房那邊的女孩子們，圍著何春燕，憂愁地交談著什麼的時候，一輛深藍色的別克轎車，靜靜地滑進工廠的大門。車門打開，首先下來的是廠長，第二個下來的竟是宋老闆。張維傑看了看錶，九點四十分。「艾森斯坦先生呢？」他狐疑地想。

¹²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四）（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159-160。

宋老闆還是一身淺黃色的，裁剪妥貼的西裝。下了車，他自若地望著庫房那邊的人影，緩緩地走進總辦公室。侯廠長身邊，立刻聚攏了副廠長和蕭振坤一班人。從宿舍到圓環的人的欄杆，這時逐漸周密起來。送老闆和廠長的出現，彷彿使一個鼓脹的氣球，刺破了一個細小的穿孔，全場的氣氛，開始緩慢地、卻也持續地消降。

「請大家上工吧，」侯廠長笑著說：「投票的問題，改天再談。上工，上工，哈哈、哈哈……」¹³

最終，由張維傑組織、女工親力參與的新工會投票，被對立的宋老闆與侯廠長等阻止、取消，而原先與張維傑表示要對抗（宋老闆等）到底的艾森斯坦，則始終沒有依照他的承諾到場主持投票。在後文中可以得知，艾森斯坦是受到位階更高的外國老闆臭罵了一頓，所以放棄新工會的組織。而原先的堅持，也更像是要鬥倒本地勢力的宋老闆之行為——這些真相使得艾森斯坦的命令，不過是變著法子的指使自己的下屬去擊敗有權力的對手，其本質依然是「上司（使役者）vs 下屬（被使役者）」的對立結構。

前述的例子中，呈現出陳映真小說文本裡職場階級的對立形式與它們的原則。從文本設計看來，在其小說中呈現的職場階級現象，與原先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念是有一定差距的：

表5 馬克思主義中的工業社會階級對立表

概念	壓迫者	被壓迫者
階級位置	資本階級	無產階級

原先的工業社會新階級、新壓迫的提出，非常清晰的解釋了社會階級中的兩端以及壓迫的形式為何，而陳映真小說中的職場描寫卻不是這樣的：

表6 陳映真小說的職場階級對立表

概念	許諾者	被馴服者
類型人物之特徵	上位者以規則中的利益誘惑、說服下位者服從規則。	下位者因崇拜或追求利益而置身於階級的規則中。

¹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四），頁219-220。

在這樣概念在其小說文本中，是最常見的「支配／被支配」關係。從本文舉例的文本看，「許諾者」不論是帶入楊伯良、張家齊或甚至是艾森斯坦都能夠成立，是以能夠說發生在陳映真小說中的職場階級支配關係，是一種「願打／願挨」的關係。這樣的現象使得不同階級人物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不會時刻呈現出一種對決式的鬥爭樣態。然而即便是接受誘惑以服從規則者，在其本質上依然是「索求、奪取」規則中許諾的利益；而許諾者的許諾或者說馴服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支配的變體。可以說陳映真小說中對職場的描寫並不是脫離了原先階級的意義，它們更深入而細緻的表現了新時代的階級關係，也應證了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階一鬥爭在條件、形式會不斷更新的說法。

藉由本節分析可以發現，無論文本添加了何樣的議題、情節與人物性格，只要人物關係的設定是「職場中的上司（老闆）與下屬」，那麼支配行為就會是其必然的關係本質，並且一定是「上支配下」的型態。是以無論文本當中，被支配者的對階級的認知、態度為何，支配的事實永不改變，是對立的核心，也是其表現原則之共性。

二、性別階級的對立結構

在陳映真小說文本中，性別間關係的呈現，也多半是藉由人物個體與人物的關係去表現的。性別的階級，旨在針對不同性別之間上／下關係的發現與分析。無論如何，當問題涉及階級，其本質便是支配與被支配。是以，本文在下列討論過程中，將針對以不同文本之性別中的對立關係內，誰支配他人、誰被支配，以及如何支配進行討論，藉以尋得文本中的對立結構。

在相關的文本當中，最早可以發現該主題的，便是1959年發表的〈麵攤〉。該文本主要對社會底層的攤販生意人一家進行描寫，並在其中加入了關於執法者的跋扈與社會制度對攤販的不友善，但同時也出現個別的執法者予以這樣的底層群眾以關懷與體諒，一般將該文本視作陳映真具有浪漫色彩的溫馨小品看待。然而，其並不只是表現了一個攤車之家受人體諒的小說，它同時對單一人物作出了細緻的描寫：

「忍住看，」媽媽說，憂愁地拍著孩子的背：「能忍，就忍住看罷。」
但他終於沒有忍住咽喉裡那輕輕的癢，而至於罷發了一長串的嗆咳。等

到他將一口溫溫的血塊吐在媽媽承著的手帕中時，媽媽已經把他抱進了一條窄窄的巷子裡了……

……

……媽媽輕輕地搖他，間或也拍拍他的背。

「等大寶養好了病，媽媽給你喫很多的冰，很多很多的。」¹⁴

在整個文本中，這個叫金蓮的女性人物有其一貫的行動模式，而在其背後有一個簡單的原則作為動機，就是其妻子與母親的身分。在這樣的身分下有兩種來自父權的職責約束這個女人，而那個約束者，時常是她自己：

「這個警察，不抓人呢。」孩子說，那個年輕的警官也已經消失在街角裡。

「大寶長大了，要當個好警官。那時候，你們不用怕我了。」他說。媽媽一直沒有說話，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緊，一面扣上胸口的扣子。街燈照在她的臉上，也照著她優美的長長的頸項。這年輕的婦人無言地凝視著晦暗中的人潮，大抵她的心也漂得很遠了。¹⁵

在這個丈夫不在場，而獨自面對一個陌生男人之後，金蓮的兩個舉動證明了她行動是保守為了她的兩個職責：抱緊孩子是很直觀的提醒，母親的身分無疑是由孩子的存在而成立的；而扣上釦子，則顯然是保守身體。然而，身體的保守是為了什麼人？這個看來像是自我保護的行為，無疑是道德在行動上的體現。身體的保守可以說是為了她「所屬」的男人，也可說是對父權道德的效忠。是以，這裡的性別階級以較隱晦的方式表達出來。然而在文本中，金蓮與她的丈夫並沒有真實的對立，與其對立的是那個警察：

年輕人注視著爸爸的臉，不久那個溫藹的微笑又爬上了他的困倦的臉，終於留下十塊錢走了。

「啊，啊！不要——啊！」爸爸說：「呵呵！那麼也還得找錢，啊，啊，不要——」

爸爸著急的拿著十塊錢追了幾步，又跑了回來，慌忙拿了一張紅色的五

¹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11-12。

¹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6。

元超正要再追上去……

「啊，啊！」爸說：「啊誼，金蓮！你快追呀！」於是爸又忙著招呼客人，「金蓮！」爸爸喊著說。

媽媽默默地接過五元鈔，不一會便消失在黑暗裡……這個夜市最終末的人潮，也終於漸漸的消退下去，甚至連車聲都變得稀落了。

這時候媽媽悄悄地走了回來。她低著頭只顧走向孩子，甚至沒有抬頭看爸爸。她走近孩子就一把將他抱在懷裡，他感到媽媽的心在異乎尋常地劇跳著……媽媽像是把他抱得更緊了。¹⁶

警察以一個友善的人物形象出現，他在攤車一家做筆錄時觀察他們、在巡邏時對他們放水，而最後甚至自己光顧麵攤，多給錢並離去。這些與他的性別本無關連，然而他作為一個婚姻外的男人出現在金蓮的面前，並且在這些善意的舉動中吸引了她的注意，甚至是引發著段夜晚中沒有其他人看見的互動。從黑夜中回到攤車的金蓮，又一次做了抱孩子與扣釦子的舉動，然而警察不需要對這段留白有任何的說明。於父權的性別觀而言，在情愫與性的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加自由，並且呈現了男支配女的「警察 vs 金蓮」之對立結構。

在〈麵攤〉當中呈現了其特別的逆反設計：觀察其中關係可以看見父權道德於人物行為上的限制。然而，在文本中表現男人約束的是女性人物，而功能上體現女性情愫的，卻是男性人物。這樣的設計，使人物的表象逆反於他們的本質。而這種逆反在〈死者〉當中，以更奇特的方式呈現。

在〈死者〉的敘事裡，「死者」生發伯處在一個奇特的處境裡：在一個私通司空見慣、所有人心知肚明的村莊裡，他因為曾經在外地的見聞，而有一種對父權道德的堅持：

……「老伴，我要死了，可不要做些難看的事，使兒女見羞。玩玩四色牌，倒是不要緊的……」

那時候他還幼小，不會懂得這句話的意思。及至他成了家，他就懂得了。原來這裡是個敗德的莊頭，私通的事情，幾乎是家常便飯的事。沒有一個父親保得住自己的兒女都出於自己。然而他的母親果然不曾為子女們做了「難看的事」。後來他奉母至孝，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¹⁷

¹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8-19。

¹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77-78。

這種願望藉由其往後的見聞，傳遞到生發伯的價值追求裡。然而，男女之間的「所有」或是「支配」關係，不論是藉由經濟權、話語權或是性行為來達成，都始終離不開「支配者大於被支配者」的本質。在文本當中，生發伯的兒媳失去了支配她的人：

如今，大兒子總算在南台灣落了戶，總算為自己留下血裔而去了。老二死於壯年，寡媳無依，加以自己的衰老，便只好又回到故鄉，守著這間破敗的祖厝了。他終於不曾逃開他的故鄉。命呢！他想。¹⁸

二媳婦陪著他一起守著老家，表面上是守寡的二媳婦照顧老年的生發伯，而實際上卻是生發伯盯著二媳婦守寡。因為除了生發伯，男性的約束者已經不復存在。而生發伯的擔憂與他的約束，從結果而言是無用的：

但是在他自己醒轉的一個片刻，看見自己的媳婦。伊的孝順、周到，是無可責備的。便想起一件諱秘心中已久的事來。因為不幸他曾數度看見家裡似乎曾有神秘的男人的影子。無奈的事自己老眼昏花，加以重聾，自己也不敢貿然斷定了。何況那個時候一屋子暗壓壓的外人，也不好當著他們這樣叮嚀伊，說，「媳婦呀，可千萬不要為我們家做些見羞的事……」¹⁹

此處可以發現，二媳婦與金蓮的兩個女性人物的表現有其不同：金蓮作為一個活在父權道德當中的女人，同時也擔當自己的道德約束者。對她而言，「妻職」與「母職」並沒有分開理解的必要，它們都是她作為女人當然的責任；然而二媳婦則將自己的「媳婦」與「妻子」的身份分開——一方面孝順地侍奉著亡夫的父親，同時因為自己的無依與慾望，選擇與村莊中的年輕農人私通。從這種行為可以發現，其就算選擇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卻依然沒有放棄在其他方面孝順自己的公公。是以在精神層面，男（父）對女的支配並沒有改變，並以人物行為的對立形成「公公 vs 媳婦」的對立結構。

孝順與慾望在處境中的拉扯，並非僅出現在〈死者〉當中。在1961年發表

¹⁸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78。

¹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78。

的〈貓牠們的祖母中〉，這兩個東西被明確的描述出來，成為主要人物的內部拉扯。該文本講述一個幼稚園保母娟子，在與丈夫結婚之後冷落自己的祖母。從表面而言，這樣的內容看起來是祖母與丈夫張毅的對立，然而從本質上來看，卻不能這麼說：

卸了裝之後，看著伊忙著把它掛上衣架，他茫然的點起一支菸。他也感到那惡風評的威力了。但他也有過自己的祖母，哼，出奇的是伊們竟會長得那麼相像。他的祖母是個後娘，他的父親死後，便百般的苦待他。他一氣出走了，便投到軍旅去。就這樣的他開始了半生的戎馬的生涯了。

……

——老張混得不錯，官兒也升了，老婆也有了，還賺了間房子呢。袍澤們這樣說。他有些感到屈辱，又想著他自己的祖母，便無端的憤怒起來。他有著飽滿有力的青春，他便藉著這青春使役著伊。²⁰

從事實而言，張毅的來意是為了獲得一棟房子、一個妻子，也就是一個以他為主到的家。從對他過往的描述來看，幼年的他也經歷過這樣的「家的爭奪」。只是過往他是被搶奪的人，而今他是發動搶奪者。而作為搶奪的手段，張毅直白而明確的認知到自己是藉由容貌與性能力支配娟子。是以，真正的被支配者一直都是娟子，只是支配她的不只是張毅：

除卻慾望之外，伊盡力地懶散而延宕地過著日子，關於伊的惡風評便日復一日地明顯起來。伊因此覺得愠怒，便益發在他的熱情之中，完全的成了奴隸了。為了討好他，伊拒絕與祖母共食，甚至另外隔開一間十分侷促的小房間給祖母。風評算什麼，伊叫著說：風評算得什麼？²¹

文本中對這種「風評」的提及一直是隻字片語，既沒有藉由直接的描寫表現，也沒有明確其內容。然而從語意上看來，張毅想著自己如何成功使役娟子時想到了這個風評；娟子則是在沉溺於與丈夫雲雨的時候，想到這些風評。顯然這風評是對立於他們夫妻的行為，應該是指向他們對祖母的不孝與虧待。在描寫

²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04-405。

²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02-103。

張毅內部活動的一段可以發現，這種風評於他而言並不是值得在意的事，但是於娟子卻是足以牽動其情緒的。這種對孝順的要求，實際上也是父權式的價值觀，娟子的受指責其原因有二：血緣與性別。在這樣的語境下，娟子是一個永恆的被支配者，文本藉由其情節關係呈現「祖母、張毅 vs 娟子」的對立結構。

綜觀本小節的討論，觀察陳映真小說當中的性別階級可以發現，在其中並不存在除傳統二元性別以外的其他性別。並且在其語境的塑造上，女人之於不貞潔，總是以一種被指責或者預防被指責的態度應對。而在父權語境的性別階級關係裡，如〈死者〉中生發伯之母和〈貓牠們的祖母〉裡的祖母，都可能因為長年恪守父權期待的道德，加以她們輩份的影響，而成為性別階級中的上位者。而其中人物所代表的價值，以及這些價值在文本中被表象的傾向，本文將在下一節當中進行分析。

第二節 陳映真小說中階級的價值意識

在上一節中，本文討論陳映真小說中涉及階級議題的表層對立結構。在文本的階級設計上，無論是職場的階級或是性別的階級，其對立的方式都是人物對人物、團體對團體，在單位上同等，而在權力上不對等的關係。在表現形式上，有將對立之衝突內部化者，亦有在外部事件上衝突者。然而，這些人物在敘述上的共性，是他們多少對自己的階級處境產生想法或有對應之行動，這些思考言行使得表層對立的內部價值得以被發現，進而可以進行文本傾向於表現何種價值之討論。下述將繼續以職場與性別兩小節，探討文本表現之階級的價值意識。

一、職場階級的價值意識

將階級的討論放諸「職場」的場域進行分析，實際上是將議題放置在其最原始的探討當中——最早討論階級的卡爾·馬克思便在多個文本中，論述勞動者與非勞動者於職場中的關係本質。其中，《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提出是必須參考的：

……佔有表現為異化，自我活動表現為替他人活動和表現為他人的活動，生命的活動表現為生命的犧牲，對象的生產表現為對象的喪失，轉歸為異己的力量，異己的人所有……

首先必須指出，凡是在工人那裡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活動的東西，在非工人那裡都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狀態。²²

此處可以發現異化一詞的意義：最初的異化被指為勞動者的成果被非勞動者——也就是他的資本家老闆提取，是以勞動的成果就被轉化為利潤以及既起的資本，勞動的意義從勞動者的自我支配、生產，轉變為「幫助非勞動者支配自己」的活動。從這一經典的論述中，能夠發現勞動異化的前提，正包含著職場當中的支配本質。而這個名詞在它被提出一百七十年內，發生了許多異議的延伸——隨著生產型態、資本支配型態的變遷，異化也可以是消費主義下的商品化、職場效率計算的價格化……等多種使人離開其本質的物化現象。而在下文當中，本文將以此為解釋支配、異化、物化與商品化的說明，並且作為分析之理論基礎。²³

雖然於對立結構的討論中，〈萬商帝君〉當中的階級對立，是陳家齊與林德旺的對立。然而階級的對立不能視為人物關係的完全對立。從文本對人物內部的描寫可以發現，陳家齊與林德旺在對彼此的關注上有相當程度的不對等，而這種不對等正好是林德旺作為一個員工「不及格」的點——在數個段落當中，文本深刻表達林德旺對於「美國公司的體面人」之傾慕：

在這聞名全台北的國際性大貿易公司中，他第一次進入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地毯、冷暖氣，高級的辦公家具，一切文書都是好幾台漂亮的IBM打出來的英文。公司裡的男男女女，全是大學畢業的，體面漂亮的男男女女。於不知不覺間，他開始向姊姊素香要錢，買新的襯衫、長褲、皮帶、皮鞋。他去租下一間不錯的套房，買了一套小小的音響。他不斷地向姐姐素香伸手需索……²⁴

他對於地位與光鮮的嚮往，使他的慾望不斷被開發。林德旺對地位與成功的理

²² [德]卡爾·馬克思著，伊海宇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臺北：時報，1990年），頁60。

²³ 事實上討論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支配上有相當多的書籍、理論。其中馬庫色的《單向度的人》可謂討論消費、新工業社會如何支配人的經典書目，本應在本文中提及並予以參考，然本文並無將這種體制、利益關係的討論涉及精神分析的意圖，故在此有所取捨。[美]赫伯特·馬庫色著，劉繼譯：《單向度的人》（臺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15年3月）

²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67。

解，是從物質表象開始的。並且從這些行為不難發現，模仿嚮往者是他認為通往成功的路徑。對他而言，這一切都是可以討要與分享的，所以他向陳家齊寫了報告，討要一個「海關事務經理」的職位。然而這種過分膨脹的情緒，以及所有阻礙工作效益的私情，就是陳家齊所口中所謂的「有病」²⁵。所以陳家齊就將無有效益的人，排除於重要的業務之外：

當然，無需多久，林德旺就明白：陳家齊的勝利和這勝利帶給業務部的欣快感，是與他完全無分的……關於整個莫飛穆要在十二月間迎接的大會議文件。每一份文件都註明要送給某單位的某人，卻沒有一份是必須送達林德旺的桌上。²⁶

是以，陳家齊行為所代表的，是一個藉由業務實作經驗的苦幹，一步一步攀爬到高位的管理階級所抱持的效益至上之職場價值。而林德旺所代表的，則是以情緒作為判斷原則的功利崇拜²⁷者。對效益至上的職場價值而言，它需要的是具有穩性質的勞動力，而不是功利的崇拜者；但是崇拜者若受到崇拜對象之否定，則會在無依的情況下呈現崩潰與自毀：

……關閉的會議室門轟然撞開，進來了一位蓬首垢面，奇裝異服之男子。他用台語尖聲叫喊——
「我是萬商帝君爺……」那男子振臂呼喊，「世界萬邦，凡商界、企業，攏是我管轄哦！」
……
「啊！林德旺！」
陳家齊的叫聲。
「德旺！」陳家齊怒聲喝叫，「不要胡來！」
說來神奇，聽到陳家齊的聲音，那男子頓時像綿羊似地，馴服地讓門警和飯店經理押走。
後來才記得起誰是林德旺了……聽說瘋掉了。為什麼呢？似乎沒人知道。

²⁵ 出自陳家齊對他的怒罵。這樣的評價表現出管理階層認為職場中應該以理性、專注於工作本身的狀態面對公司業務。這與林德旺異常豐沛的傾慕情緒完全相左。

²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358。

²⁷ 這樣的崇拜是一種無價值的追求，以表象作為一種追隨的目的，其內部是空洞且虛無的。

……洋人問怎麼回事。陳家齊鎮定地聳聳肩，兩手一攤——
……「沒啥，一個瘋子，就這麼回事兒。」²⁸

對於這對人物之間的結局，文本以林德旺發狂，打扮為萬商帝君²⁹闖入會場大鬧，最後為陳家齊喝退做結。表面看來，是理性戰勝妖魔化的非理性之人。文本藉由陳家齊之口，簡化一個有脈絡者為瘋子，然而與此同時，像林德旺這樣身陷消費主義、愛慕虛榮者，正是他所打斷的這個銷售會議與會者最期望大量出現的消費者型態。文本藉由巧妙的安排，使得本來愛慕功利、消費的人，以癡狂的形象破壞他所仰慕的對象；而追求效益者，在一個追求銷售效益的場合，稱一個充滿消費欲望的人為癡狂的。這樣的安排體現文本這兩種價值採取的否定傾向，是為否定階級異化³⁰的價值意識。

〈上班族的一日〉的黃靜雄在表層敘事中就具有價值的反思與批判，這在陳映真小說當中並不算罕見的作法。透過對人物內部的描寫，進行其價值的預設，在這種情況下會使得人物在後文中的選擇朝向兩個方向前進——言行一致的順應期待行動；言行不一致的反期待行動：

——Bertiand，傢伙！竟而讓他騙了這麼多年，這麼多年。
——以後的生活嗎？美娟近三、四年來存起來的薪水，就是讓我閒個一年半載，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上班，幾乎沒有人知道，上班，是一個大大的騙局。一點點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殺多少人才志士啊。³¹

此段以黃靜雄之口說上班是一個騙局。從黃靜雄自己的獨白中，它提供的是一種保障，所謂的保障指得是定時定量並足以維繫生活的薪水；然而關於欺騙了什麼，他卻不說明白。但是可以藉由後文的折殺人才志士推敲，並發現語意中欺騙這件事，其實是指人的時間，或更直白的說是一種人的自由狀態：

²⁸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414-415。

²⁹ 這種將企業行銷管理者的改念神格化的行為及其形象，於文本設下成為消費與功利崇拜者的具體化意象，在癡狂的表象體現了隱含作者對此種人物本質的意見。

³⁰ 異化在此指人在企業與消費主義概念下不被作為人，而是被當成一個機器或是商品來看待的現象。陳家齊在職場中堅持的理性與效益，屬於把人當作機器元件看待；而林德旺將人的價值看做那些物質表象。這兩人顯然都發生了異化。

³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322。

也就在那時，他開始熱心地想望副經理的位置。薪水高、配車子，這都還在其次。黃靜雄想望著副經理的椅子，還因為工作會清閒些。那時他就有時間和心思的餘裕繼續他在大學時代沒有拍完的一部紀錄片。³²

此處可以看出黃靜雄對於上班之得失其實一直了解。與此同時，他發現了職場中關於階級的真相：職位越高、越是處於上位者，擁有更多的獲利之餘，擁有更多的時間跟空間去安置興趣與志業——被壓迫者犧牲的時間，其實是他們在這些喜愛的事物上之自由。這樣的自由被把持在上位者的手中，同時也可以是一種誘騙的手段，號招更多的人以「自由」換取「保障」，再讓他們說服自己累積「保障」以獲得「自由」，如此循環往復，而自由的狀態卻不曾真正到來：

「另一個消息：總公司要各國分公司搞一個『成本擲節計畫』。」

「哦，」他說。

「要我們搞人事精簡。嘿，我只好把我隔壁的房間暫時再空一空，嘿。」

……

「放心好了，全是表面工作——誰說美國人不搞表面的……？」B·Y 壓低聲音說著，又復笑了起來。

……不，當然只是個「表面工作」罷了。楊伯良、榮老董這兩個無盡無底的坑洞留著不堵住，卻盡揀著紙張、原子筆一類的小項目去擲節。而他的會計部經理，原以為是煮熟的鴨子，不料竟飛了。³³

此處直接將上司與黃靜雄的利益擺在一起衡量，藉由上司的言行之不一，可以發現黃靜雄所謂上位者的誑騙，其真相就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永遠會依利己主義為原則行動。而正是這樣的體認使他逐漸認為自己受騙、在做無用功，進而發生了文中楊與黃的爭吵。然而文本設計最終選擇了以黃靜雄的妥協做結：

「他們少得了你麼？」

她對著自己在鏡中的、卸了妝的臉，得意地笑著。然而她看見原已斜臥

³²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321。

³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336-337。

在床上的他，匆匆地爬了起來，走出臥室。

「什麼事？」她說，「大門我關好了。」

她看見客廳的燈亮了起來。過了一會，她又說：

「你在幹什麼呀？」

「把攝影機和放映機收起來。」

他低聲說。

「噢。」她說。³⁴

文本在整個敘事中藉由大量的內部描寫，讓上班族黃靜雄自己對公司的階級文化與真相進行批判，卻使其在最終再次放下個人的志向與喜好，重新回到階級的關係之中，使得原先的批判轉為對人物自身巨大的反諷，表現出隱含作者對上層階級的利己原則，與人壓抑自身價值之自我異化，予以反對的價值意識。

〈雲〉在人物對理論、理念的言說不比〈上班族的一日〉或〈萬商帝君〉少。從這些說著理論的人物而言，該文本的論說是少數針對著基層勞工展開的討論。外籍總經理艾森斯坦，以他的論文《跨國性的自由》³⁵向張維傑闡述跨國企業如何可能改善保守封建的當地文化，以及捨棄過往殖民式的經濟擴張中，那種干涉他國民主自由、赤裸而殘忍的剝削。若將這種理論視為艾森斯坦最初的理念，並以此探討價值，則能發現它是一種在目標為獲益的前提下，仍注重勞工權益的論調，屬於一種既是利己、也是利他的共好價值。這種價值作為理論足以打動張維傑的原因，乃是因為他本身的理念：

他還記得，文秀英的這篇稿子，原名是〈老爸爸和二哥〉，是他把「老爸爸」這幾個字刪去的。文章裡刪改的不多。這是她投來的最長的一篇……有一次，她送來一篇寄給友人的信，讀來真摯而溫暖……他原想以編輯部的名義寫一封鼓勵的信，終於也忘了。

——那時候，我終於也忘了啊……。

他抽著菸，落入了沉思裡了。他想起還沒有上師大，在荒陬的大武鄉教小學的時候，自願接下「看牛班」，為他們墊錢買珠算練習本子的那些日子來。「不要認為學校不要你們、社會不要你們、父母不關心你們，」他對那一班學生說：「至少至少，老師要你們……一畢業，你們就要去面對

³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345-346。

³⁵ 在〈雲〉當中的虛構論文，內容以摘要形式出現在《陳映真全集》卷四的155到156頁間。

充滿了各種風浪的社會。所以你們要好好學。多學一分，多一分保護自己的力量……」他猛地回過頭……讓自己滾燙的眼淚流呀流地，撇了一臉。³⁶

穿插於閱讀女工小文的日記與在閱讀的當下，敘事進入張維傑的回憶當中，展現他進入跨國公司前的言行。在這段閃回中，能夠發現張維傑理想中的知識分子是將知識分享給底層人，藉由教育可以使得底層人有生存下去的機會。是以早在他看過《跨國性的自由》之前，其行為就背負一種理想性的利他價值。而他所處的莫飛穆公司內，原本存在的所謂工會，看似是一個鞏固基層勞工權益的組織，實屬無作用的橡皮圖章，其中人員代表本地管理階層利益之鞏固：

「說到工會，蕭仔振坤、李仔貴、張仔清海，他們在勞資兩方面是靠著哪一邊，大家都很清楚。平時啊，他們高人一等的模樣，大家都領教過了。他們憑什麼？大家心裡都很明白。」何大姊說，「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真正代表工人權益的工會。沒有我們這幾個在這幾個月來的活動，我們會有獎金？蕭仔振坤會對你擺笑臉？會想到互助基金、福利社？」

一陣陣激動的掌聲好幾次打斷了何大姊的話。³⁷

何大姊的講話，說明舊工會的本質為管理階級的幫手，平常行的是仗勢與打壓，臨到有人出來企圖推翻這種體制結構時才釋出小恩小惠的紅利。這樣的發聲是犀利、精準的，因為涉及切身的權益問題。然而事實上，文本中對立於管理階層壓榨式的利己價值者，並不是真正使利益完全倒向工人的類似共產主義的價值，而是艾森斯坦理論當中的利他性質。同時，這樣的鬥爭能夠發生，從根本上也是因為艾森斯坦階級高過本地管理階層。是以，他的「倒戈」會使得活動由鬥爭關係再次成為上位者與下位者在體系內較量，如此一來鬥爭的崩潰將是必然的：

「不過，麥伯里有一句話，說對了，我想，」艾森斯坦先生說：「對於企業經營者來說，企業的安全和利益，重於人權上的考慮。他說的。」

³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四），頁147-148。

³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四），頁206。

張維傑抬起頭，看著艾森斯坦先生的背影。

「試著了解我的處境吧，Victor，」艾森斯坦先生轉過身來，用那一對漂亮的大眼睛注視著他。

他笑笑，站了起來。

……「企業的安全和利益，重於人權上的考慮」……

突然間，一陣翻胃，他衝到洗手間，哇、哇地吐了一地。

從洗手間回來，他抓起一張白紙，用鉛筆寫了一封短短的辭呈。他的辭職理由是因為「病得厲害」，卻料想艾森斯坦先生應當看出 very sick 的另一個含意：「噁心至極」。³⁸

艾森斯坦最終因為自身利益的被威脅，放棄了對理論中利他之堅持。在文本安排下，利他價值與它所保障的底層勞工，因為被犧牲而在鬥爭當中落敗。然而從文本表現而言，艾森斯坦這樣透漏著利己本質的上層者，在描寫上採用了相當多卑劣、表裡不一的形象；相比於文本前期的艾森斯坦、張維傑以及眾女工，那些神氣、熱情、磊落的正面形象，透露出隱含作者傾向表現分享利益、關懷勞工的價值意識。

整合本小節對於職場階級內涵之價值對立，以及隱含作者表現傾向之討論，能夠發現文本當中只要涉及職場階級者，不存在任何下層階級或下位者於鬥爭中勝利的例子，代表下位者的人物表現也相當不一致，至少在本文採用的例子當中就分為：崇拜、妥協與抗爭三種型態。有這樣的表現，首先是因為階級始終不是個絕對的狀態，在下位者的範疇當中包含了更多細膩的階級關係；其次，無論對立於上位者的態度為何，面對體制中的上位者，下位者的處境都是受宰制者。是以當文本傾向於針對這些或宰制者、或壓迫者的上層，以諷刺、醜惡、去人性的，即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被宰制者之處境，體現出反對資本、消費主義給予人之異化的社會主義世界觀。世界觀於此處之呈現，針對文本中體現之資本主義社會於利益、資源分配不均的社會性質，予以反對意見，是傾向勞工或下層者，並且訴求資源再分配的社會主義意識。³⁹

³⁸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四），頁225-226

³⁹ 分配不均同時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詞彙，作為一個現象多受學者討論。如托馬·皮凱提就曾經就此議題提及：「……『世襲資本主義』的概念——並且在二十一世紀初這幾年蓬勃發展。人們以為這是一種新穎的概念，然而事實上，世襲資本主義大體只是重複過去十九世紀低度經濟成長環境的特徵而已。」足可見資本分配不均之事實。「再分配」之概念即是在這現象上，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對制度的訴求，如〈雲〉當中的工會組織，即是一種典型的再分配組織。〔法〕托

二、性別階級的價值意識

在性別階級對立的文本當中，人物鮮少有能直接觸及性別政治議題者。所謂觸及，意指像其他議題在文本中發生時，人物就著這樣的議題直接發表他們的意見，如〈上班族的一日〉中的黃靜雄就是對職場階級有其意見表達。人物不明確表達價值甚至是立場，會使得外部事件的衝突性質被削弱，價值在其意傳達過程中，較一句直白的表述或內心的自問更為曲折：

「到這裡來！」

爸爸於是像觸電一般走向呼喚他的高高的櫃台……

「我是初犯，我們——」爸爸說。

「什麼地方人？」抽香菸的說。

「我是初犯，我們——」爸爸說。

「什麼地方人？」他的鼻子噴出長長的煙。

「啊！啊！我是——」爸爸說。

「苗栗來的。」媽媽說。

櫃檯上的輛個人都不約而同地注視著媽媽。正是那個寫字的警官，有著男人所少有的一對大大的眼睛，睏倦而深情的。媽媽低下頭，一邊扣上胸口的鈕扣，把孩子抱得很緊。⁴⁰

從敘事的內容看，金蓮的自我約束的需求來自於丈夫的失功能。此段就出現這種因果關係的展演。這種因果或隱晦或直接的成為一種人物情節的表現原則——丈夫不在場或失能，使得金蓮必須向其他人（尤其是男人）以及她自己證明她是一個有丈夫孩子的女人，這樣的行為本身就以一種宣揚成果的方式，彰顯父權中的婦道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實際上可以視為一種父權語境在意識層面對婦女自身的影響，波娃曾有相關論述：

女人本人也承認，這個世界就期整體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統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至於她，她並不認為對它負有責任；它是

馬·皮凱提著，詹文碩等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新北：衛城出版，2014年11月），頁237。

⁴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5-16。

劣等的、依附的，這個可以理解……⁴¹

這裡說明了女性對其在父權社會中依附（附屬）者處境的自知，而這樣的自知發生在陳映真小說的女性人物身上，則呈現出金蓮這樣的人物行為：

……忽然從對街傳來匆促的轆轤聲。媽媽抱著孩子朝著爸爸寧視的方向看去，看見兩三個攤車正忙著推過街去……爸爸也推著他的沒有削圓的木輪的攤車，格登格登地走了……

女人和孩子依舊坐在原來的地方，不一會果然看見一個白盔的警官。它從對街慢慢踱了過來，正好停在這母子倆的對面……當他要重新戴上鋼盔的時候，他看見了這對正凝視著他的母子。慢慢地，他的嘴唇灣承個倦怠的微笑。他的眼睛閃爍著溫藹的光。這個微笑尚未平復的時候他已經走開了。孩子和媽媽注視著他慢慢地踱進人的流水裡。

——至少女人應該認識這個面孔的。⁴²

一樣的模式下，丈夫因為逃避臨檢的扣押而跟著其他攤車一起逃走，所以將帶孩子為主的她留下來，因此她與這名好心放水的警官有了一次獨自⁴³的接觸。重要的是在這個段落裡，以女人視角描寫一個正面、溫柔形象的警官，為情愫的出現提供一個合理的語境。是以當女人遵從丈夫的命令，在黑夜中追逐警官並消失的那個段落，其敘事的留白才會有表現情愫的效果：

走在攤車左側的媽媽，是默默地走著，緊緊抱住孩子……孩子舒適地偎著媽媽軟軟的胸懷和冰涼的肩項。

「他，不要錢麼？」孩子說：「不要，不要——」

而不幸的，孩子又爆發了一串串長長的嗆咳……

「吐到地上去罷。」媽媽說。也不知為什麼，女人竟而覺得心頭一酸，就簌簌地淌下了淚。甚至她不確切地知道這個眼淚是否是由於憐憫自己的病兒。她只是想哭罷了。她覺得納罕，她說不清。男人和孩子都沒有察覺到

⁴¹ [法] 西蒙·波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臺北：貓頭鷹出版，2000年11月），頁552。

⁴²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4-15。

⁴³ 這裡的獨自一詞將金蓮身旁的孩子給省略，原因在於孩子並不具備成熟的認知能力，此處也沒有發揮一個父權監督者的功能。所以就實際意義上來說，他們這次的接觸稱得上是單獨的見面。

女人的眼淚。夜確乎很深了。⁴⁴

此處文本安排孩子嚴重咳嗽，以與丈夫的卑微、勞碌一同呈現為金蓮作為一個父權價值下的女人，其命運的不堪與沉重。與此同時，面對這樣的命運，她流出了眼淚。在這種她自己說不明白的內部衝突中，必須上升至隱含讀者⁴⁵之維度，才能明確的將她自己守護的父權價值，以及在存在著體諒與友善的互動中，她對警官暗生的情愫視作一種先在價值的危機⁴⁶。在這樣的危機當中，文本雖沒有明確貶低婚姻狀態下的男女，卻將這種狀態帶給金蓮的拉扯、不自由以內部描寫般排在最末一段。這樣的安排使得原本在人物層面不成其為價值的情愫，表現為隱含作者⁴⁷反父權約束女性自由的價值意識。

在〈死者〉當中，於敘事表層對立的人物是生發伯與二媳婦。然而這兩者其實沒有任何的衝突，因為生發伯是將死的彌留者；而二媳婦是生者。而兩種價值分別在兩個人物的內部發生，代表著這兩者始終不會在外部的意見交流當中衝突，是內部化衝突的另一種展現。是以，敘事安排了一個外於他們二人的第三者，讓價值的衝突有了投射點：

伊站了起來。他重又切實地感到那種噬人的蠱惑了，伊確是個強健的女人，在短薄的衣物中，伊是粗曠而結實的……

他的心劇烈地跳起來了。

二舅母為她收拾了阿公的房子……隔著一層壁板，便是他強健的舅媽，今夜伊得通夜地守著老人呢。

雖是蠱惑在噬著他，但他也終於睡過去了。⁴⁸

因為林鐘雄是一個螟蛉子，自覺與養母娘家不存在真實關係的他，以一個外來

⁴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20。

⁴⁵ 沃爾夫岡·伊瑟爾：「『隱含的讀者』的概念是一種超越的範型……本文的結構通過創造一個讀者的立場，暗含了人類感知活動的基本原則。」〔德〕沃爾夫岡·伊瑟爾：《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47-48。

⁴⁶ 情愫本身不能作為一種價值，而更接近於慾望，它並不是誰透過任何方式教育她的。所以在此不能說是兩種價值在碰撞，而是人物原本抱持的價值在其內部發生動搖或挑戰的危機狀態。

⁴⁷ 布斯·偉恩：「在他寫作時，他不是創造一個理想的、非個性的『一般人』，而是一個『他自己』的隱含的替身……作者的『第二自我』……」〔美〕偉恩·布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7年7月），頁66。

⁴⁸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75-76。

男子的心態看待他的舅媽時，情慾並非從舅媽方面發生，反而是作為一種內部的誘惑在林鐘雄身上發生。這樣的安排以男人之情欲，間接反對了生發伯所希望的父權倫理的道德觀。在這樣的道德觀中，面對反倫理（道德）事件，輿論習慣以女性為優先甚至是唯一的檢討對象。而在這段內部描寫的真相中，這種習慣的正確性遭受推翻：

命運如今在他是一個最實在的真理了，否則他的一生的遭遇，都是無法解釋的：他勞苦終生，終於還是落得赤貧如洗；他想建立一個結實的家庭，如今卻落得家破人亡；他想盡方法逃離故鄉，卻終於又衰衰敗敗地歸根到故鄉來。而那些敗德的，卻正興旺……

……

該遭遇的，都過去了。在這時候，一切的苦楚和寂寞都不過只是單純的記憶罷了。因此，他所剩下的，甚至是一種輕微的歡喜：他終於要睡在那巨大而光亮的樟木棺材裡了。他在製材所的時候，辛辛苦苦運回材料，做成兩副漂亮的樟棺，一副給母親，一副較小的留給自己……⁴⁹

從生發伯的回憶與獨白看來，他一直是處在一種被害者的語境裡——他的父親交代母親不要做「丟臉的事」，然而他的妻子、二媳婦卻相繼背叛這種價值。他以嘉獎的方式對待他的母親，表現為上好木材的大棺材，因為死代表了守護貞節的最高級狀態。是以他感受到自己將死時是愉快且輕鬆的，因為他終於可以懷抱著嚮往之價值離開敗德的世界：

……他站了起來，走出廳堂的時候，便聞出銀紙箔和香火混合的煙味了。

「成了。」他想著，覺著終於完結了一件事。

……

他已然沒有了蠱惑的感覺。一面是因為這屋子裡正逢著生死之間的嚴肅的事故；而另一方面，是他的心整個地被那個稀有的巨大而漂亮的棺材所魅惑了……有一層雄壯而威嚴的氣息，而且赭紅發亮。箔紙的火光在陳年的漆面上跳著舞，這個棺材便彷彿有了無比的生命了。⁵⁰

⁴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79。

⁵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81。

在視角切換回林鐘雄時，他的慾望消退轉而對原抱持敷衍態度的喪禮有了崇敬之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林鐘雄感受的描寫，依附在其所見的外物上，呈現出一種神祕的感召狀態——他並不是因為認同了生發伯抱持的那種價值，僅是認同了那棺材美麗的外貌以及其所突顯的儀式之莊嚴：

……大家都明白伊和那後生農夫之間的關係。但像林鐘雄那樣生長在外的後生，無從知道的。因為這些平板苦楚的臉孔裡，實在無法感到這裡竟有這樣一個怪異的風俗；或許是由於經濟條件的結果罷；或許由於封建婚姻所帶來的反抗罷。但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們是一群好淫的族類。因為他們也勞苦，也苦楚，也赤貧如他們的祖先。⁵¹

敘事者離開以林鐘雄為視角的敘事狀態，以一種對價值判斷的解說，道出對於這個生發伯所謂的「敗德庄頭」，一種環境型態導致的人物處境之體諒。這樣的安排否定了生發伯對此間人的行為之批判，並且結合前述當中的安排，可以發現文本傾向整體而言是否定父權對人、特別是女性情慾的綁束，呈現出反封建婚姻觀的價值意識。

在陳映真小說當中，女性最為被支配者的同時，她們的支配者不一定是男性，這樣的現象在女性主義學者的社會學討論中亦有出現。其中，凱特·曼恩（Kate Manne）在《厭女的資格》之論述或可作為一種歸納：

但也不是只有像林賽·葛蘭姆這樣的男人滔滔不絕大談這樣的說詞，並如此這般地重傷克莉絲汀·布雷斯·福特；有許多提出反對意見的人都是女人，包括參議員、記者、還有不具相關專業的門外漢。⁵²

此段曼恩旨在透過講述法律案例，來探討厭女現象做為父權機制中的一環是如何運作的。在論述當中，曼恩以一名特權男性受到性侵指控時，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些人士會以「針對有權力者人生的迫害」來看待這樣的指控，進而論證在父權語境下存在一種「同理他心」——男人的不當行為會獲得更多合理化解釋或是忽視。而這樣的論證當中，「女人迫害女人」的現象就被作為舉例進行討

⁵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82

⁵² 〔美〕凱特·曼恩著，巫靜文譯：《厭女的資格》（臺北：麥田出版，2021年5月），頁31-32。

論。是以，在父權環境當中，女性支配女性並不是什麼特殊現象，而是鬥爭的另一種形式。

在〈貓牠們的祖母〉裡，對對立人物的狀態之安排，與〈死者〉十分相似：以將死之人對稱於有活力之生者，且兩篇中的將死之人都代表著父權的價值，只在生者的部分出現一些變化。然而從敘事對女性處境描寫的篇幅而言，則與〈麵攤〉相近。女性處境在該文本當中有兩種呈現：支配人的女性；被支配的女性。支配人的女性在過去也是被支配的女性（與上文曼恩的舉例不謀而合）：

伊這便想起泉兒清瘦的臉來……那年高商畢業，正巧逢著他父親瘐死在一個荒遠的島上的監獄中。他叔伯欺負我們孤寡，把他父親一切產業全奪了去……這便使他瘋得不成人樣，直到如今。

……

……德興先生倒是贊成過這門婚事……家裡有個男人，也才成其為家……

……

……伊要捐子成婚，大半也是因著不願娟子又重步入她母親的命運那樣，因剩下私生兒不能立身兒漂泊以去的緣故。⁵³

這一段祖母的回憶，也可以說是娟子家三代以來狀態的演進脈絡。現在以她的輩分而擁有鄉鄰輿風尊重與同情的祖母，在過去的時間裡一直是一個受害者的身分。她受害的理由，可以歸結為家庭裡缺乏一個男人，而受到其他男人的迫害。這也成為了她鼓勵娟子成家的因。而因為家庭男性的長期缺失，祖母才會以她的勞動、養育以及輩分，取代男人成為家庭裡的支配者。而從她選擇聽從德興先生「家裡應該有個男人」的建議看來，其始終抱持著父權價值的家庭觀。這樣看來，後來藉由婚姻進入這個家庭的張毅在價值觀上與祖母並無二致：

……他對自己的俊美有著自信。他曾被幾個連長太太愛過，而且最近升了官。這固然由於他的聰明機智，但據說他的美貌很使上司喜歡也是個原因。至於伊，則完完全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了。⁵⁴

⁵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99-100。

⁵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04。

張毅的行動與祖母的差異，在於同樣是父權價值觀的代表人物，然而因為性別、年齡的不同，張毅對自身的支配者性質是有意識的——他以明確的手段、明確的目的性在與祖母爭奪一個家庭的所有權，而他慣用的就是以外貌及性能力使異性依附自己，藉以獲得支配的權力。相對於這些父權價值的代表者，受支配者的娟子的行動卻不是表現明確的價值觀：

——善哉善哉！

德興先生說。他還說能如此太平寧靜地圓寂，真是佛家之幸。他詢問娟子寂於什麼時刻。伊胡亂說了一個時刻，但突然悟到那個時辰正是自己耽於慾情的時候，便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德興先生滿意地割記著……

……娟子老師看著庭院裡的父母貓們，突然感到自己的祖母是多麼的遙遠。

——伊是貓牠們的祖母罷。

伊幽幽地、沉默地說。⁵⁵

當她依附於丈夫時，因為忽略了對祖母的照顧而受到輿風的批評；當作為至親的祖母去世，她又獨自承受關於自身不孝的自我批判。她的行為若代表價值，則是被動、依附於這些價值給予的教條。並且祖母在過去所謂的受害，也同時是娟子的經歷。文本最終安排娟子發現祖母的死亡，而在內疚當中發出感嘆，呈現女人對於另外一個女人悲劇的感嘆，這樣的設計能夠發現隱含作者對於女性受男性欺壓、爭奪的同情，表現出反父權支配的價值意識。

綜上所述，在本小節中討論的文本當中，能夠發現一些共同原則：在表層當中對立的男女，其人物行動未必使其本身代表某種價值，這樣的性質在受支配者的身上尤其明顯，並且在所有的例子中，這樣的受支配者都是女性；對立於他們往往是各種父權價值的擁護者，在結構當中處在支配者的位置。然而，在發現這些關係的本質以及其中的價值 / 無價值表現後，文本的表現傾向卻不是一種明確的主義可以說明。從設定社會語境為父權式，並以女性人物在其中的被壓迫處境為主要表現之內容而言，其主體意識應當是抱持女性主義價值的世界觀。然而其內容並不具備任何表現這種價值的人物；其次對於婚嫁、持舊

⁵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05-106。

價值者，文本中皆無有批判的情節設計，甚至在其中出現同情這些人物的描寫：如〈死者〉的生發伯與〈貓牠們的祖母〉的張毅，都有關於他們背景、苦衷之描寫。是以，在性別階級的價值傾向上，隱含作者呈現出的世界觀並非絕對的女性主義世界觀，而是反對父權封建性質的進步主義之世界觀。進步主義世界觀對立於保守、封建性質的社會特徵，是一種相對性的訴求。



第三章 陳映真小說中國族的結構原則及其世界觀

在進行本章分析之前，題要的「國族」應當先行被解釋。國族一詞，乍看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國」的定義在中國文化中有其流變，在最初指地理概念的「地方」，後又在政治體制、統治權力的界定上，逐漸從地方變成城市、自治地區……最終因為與西方列強的戰爭、法律糾葛，而轉變為「現代國家」

(country)；而「族」的解釋看似較為簡單，然而卻更加抽象。族是族類、族群，但是在族群或族類的分別上，不只存在一種界定方式，這會使得分析很難具備一種有說服力的共性。而事實上，雖然國的概念往往有法律的背書，它的存在與族一樣是抽象的，是以將國與族兩個概念合稱時，實際上便是將這種抽象作為共性，並且以兩個詞彙的指涉相互填補，針對人在其族類、國家的認同現象進行分析。而學界當中，討論這種（國族）現象之抽象性質的發現，則不能不提及《想像的共同體》：

最後，民族被想像為一個共同體，因為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像，去屠殺或從容赴死。¹

從這段論述可以發現，雖然安德森稱自己在進行「民族主義」的探討，然而共同體的概念，在他的形象論說裡顯然指涉了「民族主義的國家」對人們的影響力。而民族主義國家在概念上，既具備主權國家的部分，也有民族（族類）的內容。可以說，「想像的共同體」在概念上，說明「國族」一詞的抽象概念以及如何生成（透過想像），同時指出它核心的意義（是一個共同體）。是以，本文在以國族為主題進行分析時，主要依「想像」（討論同族對抗）與「共同體」（討論異族對抗）兩個概念作為的基礎，進行本章的分析。

陳映真小說文本當中，許多人物設計、情節張力部分，呈現國族的拉扯。這些國族拉扯、對抗，源自於這些人物本身被賦予的身分，與文本中所呈現的認同或不認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物與他們的國族，由於寫實主義在文本題材方面的呈現，相當接近、依附於創作的客觀對應物——創作當下或所描寫

¹ [美]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臺北：時報出版，2010年），頁43。

時代共時的台灣社會。以至於這些國族的提出、認同的混亂，乃至於國與國、人與人的對抗、敵視、不理解，都與真實的社會是貼近的。甚至在一些文本當中，可以看到直接而真實的放入社會事件、社會造物作為附加文本，完整或加劇情境的可感受性質。與陳映真先生自己在《雲》的自序²中所說同理，文學作品並不「解決」企業與人之間的問題，文學作品亦不能真的解決人與人、人與國或是國與國的問題。然而作為對對應物的表現，勢必反映了其中的樣態與其下可能的問題。本章所欲探討，是文本所呈現的張力結構中的對立，與這種對立中所展現的關於國族之意識。在這種類型的文本中，依照方法下分兩節為國族之結構原則與國族的價值意識，內部再以同族對抗、異族對抗區分小節。

第一節 陳映真小說的國族結構原則

在陳映真小說當中，涉及國族對立者，必然呈現以人物與人物間的對立關係。這樣的對立關係依認同上與法律上的國族符碼，可以分為同族之間因不同認同而發生的對抗；或是在法律上分屬不同國族之人的相互對立、爭奪。下列將依同族、異族兩個小節，探討陳映真小說中國族的表層結構之原則。

一、同族的對立結構

在陳映真小說文本中涉及的同族對抗，有一個繞不開的關鍵字——「省籍」。雖然因為寫實主義特性，存在一些真實社會的特徵，但在比例上省籍的概念依然是最常出現的，而且並不能當成一種時間分期，而是在多種主題的文本都可以見到³。一省籍議題延伸的同族對抗文本，在其對立對立的形態上，依附於台灣社會中的國族認同方式出現「本省人 vs 外省人」、「本省人 vs 中國人」或是「台灣 vs 中國」等相似但論調稍有差距層次，將在下列進行考察。

〈夜行貨車〉屬於同時涉及同族與異族對抗的文本⁴。文本內容中，既有詹

²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六）（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15-18。

³ 如〈貓牠們的祖母〉、〈將軍族〉、〈文書〉、〈將軍族〉、〈某一個日午〉、〈纍纍〉、〈第一件差事〉、〈夜行貨車〉、〈萬商帝君〉、〈歸鄉〉及〈忠孝公園〉等十一篇都能見到該議題的表現。然而，存在省籍或者說「外省人」的小說文本，並不一定都表現該議題為對立，這前述篇章在本章當中不做全部討論的主因。

⁴ 本節討論陳映真小說當中出現的同國族者之對立，是為一種不同小說間共性的討論，本應避免過度提及單一或固定幾篇文本，然而小說不會全部以單一的定式表現。文本中會有一些同時

奕宏、林榮平與劉小玲的三角戀拉扯，亦有在三角戀之外摩根索對劉小玲的騷擾與侵犯。其中同族的對抗來自於省籍概念的介入，並以此為衝突時之言論：

……「你覺得，台灣人，怎樣？」

……

「你看這些台灣人，」他盯著螢光幕說，「你看這些台灣人，一個個，不是癩，就是憨。」

……

「如果，一個外省人，」他說：「一個外省人，從小到大，從這種電視劇中去認識台灣人，那麼，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心目中，台灣人，是什麼樣的人？」

……

「我當然知道，」他說：「編寫這種劇本的，也正是台灣人。」

……

「說開了吧。」他叫著說，「你以為，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和 J.P 的事，哈！」

……

「你以為，我，也是電視裡的，那種，又癩，又憨的人嗎？」⁵

這是詹奕宏揭穿劉小玲搞三角戀時的發難語，然而它卻表現為一段省籍發言，藉由「外省人看愚蠢的台語劇（看不起本省人），而編這劇的正是台灣人」來暗示外省人劉與本省人林愚弄了自己，自己並不願受騙。這使得此處的對立變得相對複雜。在詹提及而使得「省籍的問題介入情感的問題」前，他們之間的問題就是「兩個男人在爭奪一個女人」，所以對立的方式會是男人與另一個男人的對立；然而在發難以後，則變成詹對立於劉與林。而且以詹奕宏為出發的對立，其主要對象從林榮平轉為劉小玲。這種省籍對立的人物行動傾向從文本其他地方亦能見到：

由於不大不小的家庭的庇蔭，他的父親在日治時代受完了中學的教育。

具備「同族對抗」與「異族對抗」之例子在研究過程中被發現，對這樣的例子本文將在下面分節將其對應於小節主題的部分加入考察。

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206-208。

中學畢業後第三年，台灣光復，他的祖父也在這年過世。「這時祖父留下來的產業已經不多，街上一間藥店；一家布店和鄉下的不足一甲的田地。」他悠悠地說。又兩年，他的父親在一場動亂中枉受牽連，差一點送了命……

……「我父親託了人情，總算在小學裡弄到一個美勞老師的職位。」……

……從小到大，他慣常聽見他以那快速的話鋒抱怨校長，抱怨訓導，到院將近三十年前招致他破產的金融波動，抱怨政治，抱怨天氣，抱怨「外省人」……⁶

從前文的這一設計，便不難感受到這種傾向一部分來自家庭教育，而成為詹生命脈絡的一種因子。而這種受家庭影響而將政治、族類的概念介入到個人關係中也有其他提及，例如：

初識劉小玲不久，有一回詹奕宏同她乘坐夜車回到南部的鄉下。車上有柔和的燈光，寬敞的座位。她的左手讓他握著，他的右手把玩著火車窗子上的紗簾。就是這樣地，她喁喁地說著這十幾年來不斷出現在她的夜夢的情景：一片白色的、一望無垠的沙漠。

「每次看到蓋房子的工地上有一堆堆的沙子，我總要走過去用手摸摸那些沙子。」她說。

他漫不經心地聽著。心裡卻在想著他的父親看見他帶了一個「外省婆仔」回家，會有什麼樣的反應，而獨自漠然地笑了起來。⁷

由此可見，省籍的觀念⁸被設定為人物的家庭觀念之延伸，這種觀念根源上影響著人物，從而使複雜化的對立在三個人物間發生。在省籍關係的介入下，原先的三角戀關係，在對立上呈現詹益宏對林榮平的「本省人 vs 本省人」，與詹奕宏對劉小玲的「本省人 vs 外省人」為該文本中雙重的同族對立結構。

發生在〈夜行貨車〉中的同族對立是相對小規模而流於私情的，直觀原因

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201-202。

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220。

⁸ 藉詹奕宏呈現的省籍觀念並不是一種客觀冷靜的分析。在其中表現為兩種情緒內涵，一是繼承自父親的對命運的不滿，這是忿怨；另一個則是歷史導致的政治體制下，這省籍差異有時會表現在資源分配上，是階級概念，同時亦是詹表現出的自卑。

是因為這種三角關係本屬私情，放在一個討論跨國公司中人之處境的文本時，這問題就顯得有點無足輕重。然而一樣涉及家庭史所帶來的國族觀對立，並且同時在文本後段中轉變為「異族對抗」的〈萬商帝君〉，則將這種對立從私情的領域中解放，並融入職場中的爭鬥。所以在該文本當中的同族對抗，一方面是體系中的權力之爭，另一方面是國族認同的衝突，其表現的形式則是一場關於歐洲家用鐵板烤爐的行銷報告會議。然而在這場會議之前，文本就率先表現了這場對抗在「認同」方面的內涵：

……喜歡在中午一塊吃飯或其他場合，找他談問題……說「管理教授」認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是山地人（更正確地引用他的話，是「馬來·波里尼西亞」人）和荷蘭人的混血人種……他認為台灣話就是台灣話，和中國的閩南語已有這樣那樣的不同……他認為黨外運動就是「台灣人」尋求新的「自我認同」的運動……那個「中國人」候選人，其實是一個「大漢沙文主義者」，是一個「併吞派」哩！

此外，「管理教授」對時事的見解，也有獨到之處。例如說：美國保護台灣，主要是保護「台灣人」。美國對台軍售拖拖拉拉，其實不是受到「共匪的牽制」，而是不讓台灣人在武器的威脅下「人權受到蹂躪」，云云。總之，美國人特別疼「台灣人」。在美國人眼中「台灣人」「中國人」並不一樣！

……口無遮攔的結果，他的政治見解，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⁹

從此段引文可以發現，對立的同族在它們的名字上發生改變，從「本省人」變成「台灣人」；而「外省人」則變成「中國人」。這種分化稱呼的改變，呈現一種「新的想像方式」，這呼應了班納迪克·安德森對於「共同體」並無真實、虛假之別，而在於它們如何被想像的意見。¹⁰顯然，在法律上同一國族的人，並不一定持有廷樣的想像方式，一個人的想像可能與另一個的完全不同：

最早警覺到劉福金「危險思想」的，是陳家齊。在本省人多於外省人的工作環境下，平時沒什麼，可依但有人提起「中國人」、「台灣人」的話

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34-335。

¹⁰ 班納迪克·安德森：「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它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美〕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臺北：時報出版，2010年），頁42。

題，上海籍的陳家齊，警覺的紅燈立刻就亮了起來……陳家齊印象最深的是，小時候做錯事，挨打之餘，還要向著據說是古代堯帝之後的祖宗長跪。

……

……不論如何，劉福金的「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論，很深地激盪了他深在祖宗情感和忠黨愛國的心懷。

……

……更何況在留美期間，他還是某個「反共同盟」的中堅分子，所以在政治上，他比管理教授老到得多了。在他看，像劉福金那樣的言論，在美國，他聽得太多了……「這兒畢竟是台灣啊！」他冷冷地想：「劉福金這樣喳呼，總有一天倒霉的。」是以他小心、謹慎，當心不使自己同可預期的劉福金的破滅，扯上任何關係……他在工作上不住地挺進，以具體的業務成績向著「管理教授」的權威形成逼人的包圍態勢……¹¹

從此不難發現雖然這種想像的不同，並沒有致使劉、陳二人在明面當中交鋒。然而兩人在外部的利益上即將衝突的過程裡，這種認同的差距在人物內部事實上是衝突的，是為「台灣人 vs 中國人¹²」的對立結構。

在陳映真小說文本當中，隨著發表時間越新，從中出現的同族對立，其表現從人物到環境的描寫上無不更加深刻。及至1999年發表的〈歸鄉〉，一種更新、更「妥善」且能夠感受到其意圖的新的神話¹³被表現在小說文本當中：

「楊師父不知道打什麼地方來？」郝先生說。

「遠了。」楊斌老頭笑了。他說，「不叫師父，叫老楊。」

「能有多遠？台灣這麼個巴掌大的地方。」郝先生笑著說，「最北，基隆，從咱們這兒，三個半小時的自強號火車。南到高雄，一個多小時公路局國光號。」

「其實，國家不在大小。」張清的灰色的臉上堆滿了蓄意的笑容，「不在乎大小啦，只在於，有沒有那個……主體意識，有沒有明運共同體的概

¹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335-338。

¹² 這裡的中國人從情節上看是指像陳家齊這樣的外省人與其後代。然而從整體語境上看，是以本省人為主的台灣人分割出的他者，所以亦能指向中國大陸的人。從文本內容看來，劉福金的論調已經從文化、根源層面切割了台灣/中國人。

¹³ 此處的神話並不是宗教或文化起源的創世故事，而是指涉社會中流行的「迷思」。

念。」

即使是外地來的楊斌老頭，這時也感覺到空氣中有輕微的僵硬感。郝先生沒有收起臉上的笑意，卻沒說話。張清的女人素嬌抬起帶著精細金飾的素白的手，在空中搖了搖，說：「一刻鐘不談政治，男人準會憋死。」包括張清和郝先生在內的人全笑了起來。張清這幾年來個別喜歡談「台灣主體性」、「命運共同體」。他還喜歡談「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就應該「愛台灣」——「一類的話……」¹⁴

團契早覺會的成員發現公園中太極打得很好的生面孔老楊，遂上前詢問其可否留下教拳。然而同前例的兩個文本一樣，這種本無關於政治的情節或者互動，如一種傳統慣例一樣轉向政治。同樣的，外部上有兩個人物提出了不同的國族想像，且互動朝著鬥嘴的傾向前進，然而文本真正要表現的衝突並不在此，敘事遂向下延伸：

「台灣，宜蘭……」楊斌平靜地說。

「楊師父真愛說笑。」……張清終於堅決地說。

……

……張清說，「台灣人？說幾句台灣話來聽聽。」

「都忘了。」楊斌老頭搖著頭說……

「如果是台灣人，楊師父這個年紀，準會說日本話。」張清的女人說。

……

「也都忘了。」楊斌老頭安靜地微笑著說。

一桌的人如今都確定楊斌師父開了一個玩笑……

……

「可說到底，楊師父是什麼地人？」老朱收起了笑意說，「方才聽你們聊天兒，覺得師父的口音很特別，不知是大陸什麼地方的話。北方話吧，不全像。南方話？想不起哪裡人的口音。」

「大陸地方大的啲。」郝先生嘆息似地說。他在桌子上用手指劃了一條線，「一個地方，單是個著一條河，翻過一個山，講的話就叫你瞪眼，一句也聽不懂。」他說。

¹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七）（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65-366。

「河南。」楊斌說，「河南，吳台廟。」¹⁵

此處表現之現象不是爭吵、打鬥或爭奪資源，然而其實際上就是一種同族的對立。而且結合之後後文的敘事，能理解老楊第一時間的答案是事實。然而當他操著一種不知大陸何處的口音，並且口不能言台灣話或日語，在台灣新政治神話的分類法當中，他就屬於「外省 or 中國」人。理解到這種以對立為前提的分類，不願發生衝突的楊斌才退而選擇一個與自己脈絡相關的大陸地名。此即以這種相對無波瀾的方式呈現「本省人 vs 外省人」¹⁶的對立結構。在一些陳映真小說的前人研究當中，提及省籍問題或外省人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詞——分斷體制，¹⁷將這一詞彙於陳映真小說研究中提出是高明的。所謂的分斷體制，就歷史關係而言是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失利、全面遷台，自此兩岸分治，中國分裂。其中，大陸上跟隨政府來到台灣的各省籍的人們被本省人民稱為「外省人」。它既說明了族群的由來，也說明了政治的實況對其之影響。而分斷雖然來自政治的實況，卻也在社會中有它的體現。在陳映真小說當中，分斷，或者說一種社會當中的分類法不斷的影響著人們，並且不斷更新。到了2001年發表的《忠孝公園》中，分斷以一種複雜而畸形的方式呈現，並創造了新的對立結構。該文本中，主要的兩個人物依然是一個本省人（林標）與一個外省人（馬正濤）的設定。且在情節上，他們的「族類」也是依省籍來進行分類，並表現在2000總統大選中作為最終對決。然而，因為其他政治符碼的介入，使得馬正濤與林標的對立看起來頗具殊性：

第三天，馬正濤有些捺不住越積越強的好奇心……不經意地用日本語說：

「你早。」

林老頭霎時觸電似地停下體操動作，目瞪口呆地看著馬正濤。

「你，為什麼，日本語，懂得？」林老頭用日本話說著，臉上漾開了最

¹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七），頁370-372。

¹⁶ 這種對立的分類看似不比劉福金提出的「台灣人與中國人」之概念來得強烈，實際上卻是該概念的延伸。它（此處的本省、外省）在衝突的終極追求，是台獨與兩岸統一的國家型態之爭。

¹⁷ 如陳光興：「從理論與方法論的層次上認真思考，我們會發現從分斷來切入問題，不可避免地必須聯繫到帝國主義史、後／殖民、冷戰、社會主義、階級等相互織纏的議題。我個人認為分斷不僅構成了陳映真整個第三世界觀的骨幹，也揭示出東亞乃至於亞洲區域在世界史上的特定性。」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瓦解「本／外省人」、「台灣／中國人」、「美國人」、「歐洲人」……（上）〉，《台灣社會研究》107期，2017年8月，頁133-134。

真摯的笑顏。「外省人，為什麼，日本語……」

林老頭的榮光像是一盞油燈似地、被馬正濤的日本話挑亮了起來。馬正濤說他在「舊滿州」長大，讀過日本書。

「啊，舊滿州。」林老頭快活地說。

「是的。舊滿州。」馬正濤微笑著說。

「小名林標。標是標準的標。」林老頭用日語說，熱情洋溢地伸出手讓馬正濤握住……

……

……林老頭嘰嘰呱呱地說日本話。馬正濤聽出來，林老頭的日本話太髒腳，難免用錯的助詞全用錯了，而不該用錯的助詞也錯誤百出。馬正濤聽得煩心了。「幾天前，我看見你穿日本軍服……」馬正濤笑著說。

馬正濤開始一逕用普通話說話。那時林老頭才說他在戰時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事隔多年，當年的台灣人日本兵要問日本人要賠償。「去高市，組一個戰友會，交涉補償……」林標說。¹⁸

文中，林以一種歷史遺留的認同，視馬的出現為一種驚喜。然而馬正濤卻不是這樣的¹⁹。就過往而言，他們在台灣與大陸的另一個分治時期，都屬於日本殖民體系下的人，一個是滿州國的警察頭子，一個則是皇軍的南洋軍伕。然而今日的兩個人物因為歷史與政治局勢的改變，變成中華民國的國民。他們擁有屬於自己的族類，同時又被賦予了一個新的權利——總統大選選票：

……「X 他的娘。日本人，無血無眼淚！」曾金海說。

就這曾金海，這半年來竟又活動起來了。「從前台灣人去日本索賠，國民黨政府不出面。」曾金海說，「委員陳炎雷說了，咱們幫過日本人打中國人，能指望這個政府為你出面作主嗎？」而又據曾金海說，如今就有機會「換一個台灣人自己的政府」，換成了，台灣人向日本人索賠，就有人做主。曾金海帶著體體面面的陳委員到處找台灣人日本老兵為「換一個政府」拉票，馬不停蹄。²⁰

¹⁸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九）（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08-311。

¹⁹ 關於馬正濤對林標的鄙夷，涉及日本殖民體制中的階級關係，因與本章題旨無關，故在此不以內文進行深刻討論。

²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九），頁336。

此段展現出一種新的言談、新的說法，牽連所謂本省的「台灣人」作為「台灣人自己」²¹的支持者，希望本省人社群以選票支持他們。這裡，共同體的想像方式被一群人主動操作，而他們的對立面則是一個較古老的想像，在這種新言談出現時採取守勢並充滿危機感：

「老馬，真要叫他們上了台，我們外省人，死無葬身之地呀。」……
「國民黨完選舉，進攻不足，守衛政權有餘。當年我們幫著黨搞選舉，是怎麼組織動員的，你都記得。」曹廳長說馬正濤躲到鄉下十幾年，早已不知道形勢大變了……叮嚀馬正濤，一定要選「宋先生」。祝景幾次來電話也是一樣。「我投我的國民黨。」……「國民黨早沒了，馬伯伯，早被人搞垮了。」……現在外省人過日子……還得結結巴巴地學閩南話……「但我們不能每天每天一家子過擔心受怕的日子。」馬正濤沉默了半晌，說「離開了國民黨，宋先生連他自己也保不了，他還能保護誰？」馬正濤沒想到祝景生氣了。「好。馬伯伯，您繼續睡覺做夢。」祝景冷著聲音說，「到時候，怎麼死的，您自己還不知道。」²²

此處是表現是一個富有層次的設計，對於外省人族群的「保守」進行了兩個方向的詮釋：第一是新派的意見，欲離開分裂的國民黨，以保全外省人的權力；第二種則是老派的黨國信徒，馬正濤正屬於這一派。而不論派別為何，文本設計以這場大選中的兩方作為族類，而終於使這兩個無有直接衝突的老人在最終形成「台灣人 vs 外省人」²³的對立結構。

綜觀前述當中出現的同族對抗，可以發現其中始終不離省籍問題的蹤影。對立的形式雖然因為個別文本的設計而有不同，然而其本質始終不離以省籍為名的兩個問題：資源的分配²⁴，以及分斷體制之下兩大族群在想像上產生的分歧。是以，本文在本節中發現並依序討論這些對立，同時得出這種對立 / 分歧中的言談與想像，會隨著歷時向前不斷地演進與變化，卻始終不離其原本範疇。

²¹ 台獨的傾向也是這種言談用以宣傳的訴求。

²²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九），頁388-389。

²³ 因為新的言談，這場選舉所代表的兩個族群已被不同的想像方式給定義，僅在法律的層面上屬「同族」，而兩種想像卻難以見容彼此的想像。

²⁴ 一個族類的人擁有多過另一個族類的自由、權利與機會。

二、異族的對立結構

從整體設計來看〈夜行貨車〉與〈萬商帝君〉都是涉及異族對抗的文本。然而，它們又同時具備同國族的對抗。所以從這種對立關係的梳理上，可以發現兩篇小說出現特別的對立狀態，它們是「三元」的，而且從情節表現的模式上，它們都是「先進行同族對抗」並「在後來轉變為異族對抗」。是以，接下來的討論，即會從「什麼使它們的對立轉變」和「轉變過後，是怎麼樣的對立結構」方面進行。

就對立的關係而言，〈夜行貨車〉涉及的人物情節雖然相對較多，人物間對立的原因卻出奇一致。在討論到該文本的同族對抗時，三角戀情是人物間關係的一個簡單統稱，而後來加入的摩根索，以另外一種男性型態接近了劉小玲：

「怪不得他老衝我笑得那麼邪道兒，」她愠然的說。他默默的抽著板菸。「我要走了嘛，琳達，他說，若無其事地站起來，然後他忽然抱住我……」她筆直地望著他，在一剎那間，眼眶就紅了起來。「他 X 的……豬！」她漲紅了臉，悲憤地說：「讓我走，否則我就叫，我說。他忽然放開我，說，琳達，別讓我嚇著你了。我沒有惡意，琳達……」她的語聲逐漸平靜。「他 X 的，」她悲哀地說，「豬……」他面露怒容。他感到一股曖昧得很的怒氣……²⁵

在林榮平而言，劉小玲受到摩根索侵犯的事實感到愠怒²⁶。然而他選擇的是隱忍，實際上在文本的整個敘事當中，林榮平與摩根索從未在利益層面，或甚至在「劉小玲問題」上有任何程度的衝突。反倒是較林榮平晚成為劉小玲情人的詹奕宏，出現了反抗的行為：

……顯然是喝醉了酒的摩根索先生把臉湊向劉小玲，「奇怪吧，」他說，「我們美國商人認為台北比紐約好千萬倍，而你們 XX 的中國人卻認為美國是 XX 的天堂。」

詹奕宏看見劉小玲的臉僵硬地往後退。「我並不以為美國是一個天

²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182-183。

²⁶ 林榮平的怒氣在語境中指向他的「所有物」遭到他人的侵犯。在整個文本當中，男人對待女人的態度始終都是視其為不同重要程度的所有，這顯然涉及性別的階級關係，然而本節題旨不在於此，故此議題不在此處內文中做討論。

堂……」她矜持地笑著……摩根索先生：「奇怪吧，達斯曼先生？」達斯曼呵呵嘩嘩地笑……詹奕宏深吸一口氣。他的腦袋頓時空盪起來。摩根索還在不住地咿咿哦哦地說著些什麼，但詹奕宏只覺得「f…ing Chinese」在他的空蕩的腦筋裡打轉。他忽然發覺他的手在不由自主地、微微地顫抖著。

……

「先生們，你們最好當心點你們說的話。」

……

「我已辭職表示我的抗議，摩根索先生，」詹奕宏說。他的臉痛苦地扭曲著，「可是，摩根索先生，你欠下我一個鄭重的道歉……」²⁷

此處可以觀察到在衝突的呈現上，該文本有一個相同的模式。在表現同族對抗時，文本藉由三角戀當中的一方，也就是詹奕宏的言論使這種爭奪愛人的關係上升到政治的討論當中²⁸。而此處摩根索的行為代表了同樣的功能，使得詹奕宏與之衝突的行為上升到國族的對立上，是為「中國人 vs 美國人」的對立結構；另一方面詹奕宏的反抗與林榮平的不反抗也在此處形成「有國族者（幫自己人） vs 去國族者（外國人的幫兇）」的對立結構。

同樣是被本文列入特殊例子的文本，〈萬商帝君〉在其轉變為異族對抗的過程與結果都與〈夜行貨車〉不盡相同。因為此文本所表現的情感是較為曖昧的，但是它內部表現的事件反而更加深刻……文本涉及的事物已從個體的表象跳脫，直接描繪了國族群體的某些側面。直接地說，介入該文本的「異國符碼」不再是一個冒失、自大而下流的美國人。它變成一種在特定場合灌輸意識形態，而與之對立的，則是另一個國際事件的帶入，使得另一種意識形態出現並與前一種意識型態形成對立。它們在文本當中幾乎是同時發生、同時作用：

美國卡特總統宣布承認中共。明年元旦生效！

……

……老康要大家保持冷靜，要求政府「不要採取違背民主的魯莽行動」或「造成不安的緊張狀態」。老康說：「台灣一千七百萬人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制度，與中共格格不容，強加合併，勢必引起可怕悲劇。」

²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223-224。

²⁸ 而且還都設計人物在上升衝突維度時，都處於醉酒的狀態。

怎麼就談到「強加合併」？問題有這麼嚴重啊？

奇怪！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強加合併」，台灣莫飛穆怎麼辦？

我應該會是這樣問：「那麼台灣人怎麼辦？」

為什麼一霎我沒問這個問題，至今我也搞不清楚。²⁹

這是共美建交（卡特斷交）的歷史事件。文本藉由劉福金的日記使其進入敘事當中，並同時使此處的敘事者同時也是敘事接受者劉福金，直接呈現這件事在其內部造成的波動。而在此段當中，劉福金做出了兩個反應，這兩個反映本身就是對立的：第一個是「台灣莫飛穆怎麼辦？」；第二個則是「台灣怎麼辦？」第一個反應是非國族考量的，在乎的是公司與自身的利益；第二個是以國族為任，心繫自己的國家與人民。自此，新的對立已經被預告，而在文本安排的異族符碼介入之後，新的對立於是完成：

「這兩天來，我親身感受到台灣民眾對於美國與中共建交所感受的悲忿。但是，容許我提出一個新的看法：

「使中共和蘇聯不破壞我們『世界購物中心』，不威脅我們自由、富足生活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們也拉到這個『世界購物中心』裡頭來。用『資本主義的皮帶』（belt of capitalism）把它們緊緊的綁起來。

「先生們，尤其是台灣的同事們，容許我做一個預言：你們將不久就見證這個事實：在你們看來野蠻的中共，從美國與它締結外交關係之日起，不消多久，我們多國籍公司的萬能的管理者的巧思，將逐步把中國資本主義化。我們有這個把握！（掌聲）

.....

掌聲雷動啊！我甚至不知不覺地站起來鼓掌了。³⁰

此處引文如前一段那樣同時出現兩種人，他們巧妙的在這段演說的最初與最後分別出現，其一是民族主義者的台灣人，他們在中華民國體制主導者依美、親美的走向下，認為美承認與中華民國敵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件傷害國家利益、罔顧台灣人情感的惡行；另一種則是受美資本主義論述影響、站在美國一方，甚至為其鼓掌者。顯然，劉福金在接受了資本主義反攻大陸說（異國符

²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417-418。

³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427-428。

號)後,由前者轉變為後者。是以,此處文本呈現「台灣³¹vs 美國」的對立結構。另一方面,依其衝突的方式,也呈現出「有國族者 vs 去國族者」的內涵。

1967年發表的〈六月裡的玫瑰花〉以其短小的篇幅,相對其他文本集中的敘事,描繪一個黑人上士與台灣吧女的戀愛故事。文本的主要人物就指有艾密麗·黃與上士巴爾奈,是以該文呈現對立的方式,有別於一般「衝突」的對立形式。它的開始,是一個陪酒女與一個尋歡的的士兵言語調情,隨後士兵巴奈爾因著官階的晉升,開始了與艾密麗的狂歡(留白,從後文艾密麗的懷孕可以得知是做愛),巴奈爾與艾蜜莉的關係出現了承諾:

「誰是高尚的人?」

「巴爾奈上校的朋友們。」

「當然,他們都是高尚的人。」軍曹笑著說。

「你要娶他們之中的某一個女兒。」伊幽然地說。

.....

「我誰也不娶,我只娶你:我的寶貝,我的小麻雀。」

「真的嗎?」伊欣悅地說。

「真的。」軍曹說。

.....

「什麼意思嗎?」伊微笑著說:「我只不過是吧女,我不能做上校夫人。」

.....

「耶穌!」軍曹嘆息著說:「一百年前,我們曾經像牲口般被拍賣!可是你瞧,現在我是個軍曹哩.....。」³²

這番砥礪與動情的告白,宛如跨種族版本的〈將軍族〉情節。然而它們只是看著像,在本質上卻有不小的差異。在這段許諾的橋段中,巴爾奈講述了一段故事,是他在越南戰場上看到跟台灣鄉下一樣的低矮民房,房中有個小女孩,他說自己把所有的糖果都給了女孩,然而事件的真相卻不是如此:

「伊告訴我一生長在那些低矮的、陰暗的屋子,」軍曹說:「這困惱我。但不是艾密麗困惱了我——艾密麗是個可憐的好天使。」

³¹ 這裡就不是指本省人,而是中華民國政府轄下的國民。

³²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二)(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195-167。

……

「艾密麗帶我到一個小村莊去玩。」軍曹沉悒地說：「那裏的太陽，太陽下的稻田，甚至於茂盛的竹林，使我想起另一個村莊，醫生。」

「你記得這個村莊嗎？」

……軍曹激怒地說：「我們被殲滅了，那些狗娘養的！」

「你說你們被殲滅了。說下去，軍曹。」

……

「你變得十分緊張，只要看見出聲的或會晃動的東西，你就扣板機。」

醫生說。

……軍曹憂悒地說：「那些稻田，那些猙獰的森林。我不斷地開槍，一直到我走進一間矮小的屋子。」

……

「屋子裡坐著一個小女孩，抱著斷了胳膊的布娃娃。」軍曹說：「小女孩既不駭怕，又不哭喊。伊只是睜著大大的眼睛看著我。我扣了扣板機——耶穌基督嘞——」³³

使巴爾奈積壓成病的真相是醜陋、血腥的。這個真相一方面顯示著巴爾奈個人的罪孽，二方面它也是美國掀起的戰爭之醜惡。而這在巴爾奈與黃相遇之前，是隱忍深藏的創傷，使其重新困擾之的，是黃在生活上展現出的與那個村莊、那個女孩相似的性質——「住矮房的女孩」既是被殺死的亞州人，也是他的台灣愛人，這樣的設計頗具反諷性。而文本的對立在此還沒完成它最終的型態：

伊在門底下撿起一封漂亮的白信封……伊看到一隻憤怒的梟鷹，抓著一簇銳利的箭……伊一下子記起他晉升軍曹的證書上，也有一隻這樣鷹揚的猛禽。伊快樂地親吻著信紙。「巴尼，你辦到了——雖然我不知道你又升成了什麼。」……

……「明天要找酒櫃的小劉讀這封信給我聽，」伊獨個兒說：「這次起碼是個少尉。少尉巴奈爾·E·威廉斯！」伊不禁笑出聲音，吐出滿口的冷水。

……

「……他為無可置疑的民主、和平、自由和獨立而戰；他為合眾國傳統

³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二），頁204-205。

的正義和信念捐軀。他的犧牲為全世界自由人民堵塞奴役和反人性的逆流底競爭，墊上一塊有力而雄辯的巨石。……。」³⁴

巴爾奈在給黃以承諾，並使其懷孕後，選擇再次投入戰場而最終得到陣亡的結局。從一個承諾者而言，他的死必將使他的諾言不能實踐，並傷害黃的身心；同時，他為了軍銜，濫殺越南的無辜者。從這兩方面而言，他成為一個「異族掠奪者」，這樣的行為與其所造成的局面，表現了「亞洲人（越南、台灣）vs 美國人」的對立結構。

從題材而言，1978年發表的〈賀大哥〉與十二年前的〈六月裡的玫瑰花〉如出一轍，都是越戰故事。然而其內容出現了一些不同之處。從人物設計上，「賀大哥」邱克與上士巴爾奈在背景上的差別，使兩個文本中的互動與信息有著不小的差距。麥克·邱克是一個有一定知識背景且內心富含理想的人物，然而這種理想，在文本當中遭受兩個方面的否定。其一便是在戰場中，他自己因為從眾而強姦小女孩的戰爭暴力之事實，這讓他的無政府主義理想在自己心中深受重創。而人物小曹所預見的「賀大哥」實為邱克的另一個人格，這個人格保留了理想與其相關的記憶：

「在六十年代，美國也有過類似的運動。」賀大哥用英語說：「那時的美國青年，在一個又一個運動中，對美國的富裕，提出道德方面的質問；對美國國家永不犯錯的神話，提出了無情的批判。」

那時候還在讀大學的賀大哥，「曾以為美國的『革命』就在眼前。」

……

「啊啊，」我憂愁地、筆直地望著他，說：「那麼，你的一生，如果明知道理想的實現，是十百世以後的事，你從哪裡去之取生活的力量啊。」他的隱藏在棕色的、開著極為分明的雙眼皮中的燈火，悠悠地燃燒起來。不，他說，毋寧是清楚地認識到不能及身見到那「美麗的世界」，你才能開始把自己看作有史以來人類孜孜矻矻的欸著一個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而堅毅不拔的奮鬥著的潮流的一滴水珠。看清楚了這一點，你才沒有了個人的寂寞和無能為力的感覺，他用英語說，並且也才得以重新取得生活的、愛的、信賴的力量。³⁵

³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二），頁210-211。

³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146-147。

這些內容以理想的形式提出，吸引了年輕的小曹，轉而成為小曹的理想。自此而言，小曹或可稱為邱克理想的繼承者。這樣的人物關係，要從國族的角度進行解釋是相對牽強的。然而在另一名人物的指認下，邱克被說成是「美國邪說的信仰者」，對立便以國族為線，朝著線的兩端拉扯、構成：

我一眼就認出他是在機場上送走賀大哥的人群中唯一的中國人。他看來堅定、幹練、和藹可親。

……

「在我們不知道你那個外國老師是個精神病人以前，我們還很傷過腦筋。現在，他變成那個樣子，倒是反而很同情他。」他說：「在美國，自由過頭了，再加上美國歷史短，美國人又天真，說得不好，有些幼稚，我們有個中心思想。」

……

「……可是難免有極少數幾個人帶來不正當、不合我國國情的各種邪論來污染我們的青年。我們注意到你這一位老師，便是這個緣故。」

……

「你們鄒訓導主任也很誇獎你。很好。希望你以後專心學業，心不旁騖，那麼你真的是前途似錦的。」

……

我辭了劉先生，請准了假，走出辦公大樓。校園裡遍地煦和的陽光……只是我突然覺得自己與他們已經不是同一代的人了。

——明天去登個報，找個英文家教，是是過自食其力的生活。

我想著，輕捷地走向通往校門的大路。³⁶

這個劉先生的身分文本中並沒有描述，然而從他的說詞當中，可以理解到含有隱晦脅迫的勸戒。而從其展現的權力與出言的立場，不難推測其來自政府情治單位。同時，面對脅迫的小曹表面上服軟，可是其內部描寫卻是「找個英文家教工作」，這與當初賀大哥與她之間互動的原始因由是相同的。所以，此處的「英文家教」應該不是指真正的家教，而是轉換立場繼承麥克·邱克的理念，並成為了劉先生所謂的「美國邪說擁護者」，使對立結構呈現為「中國 vs 美

³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172-174。

國」。

通過對前一章以及本章的部分文本的對立結構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一個外於主題的現象：單一的文本不一定只能發生一種主題的對立結構，而所有的對立結構實際上只是單一文本部分或片面化的呈現。在本文曾經舉例的文本當中，較能說明此現象莫屬〈萬商帝君〉、〈夜行貨車〉以及〈雲〉等「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如本節不只一次舉例的〈萬商帝君〉，就同時可以發現「同族」與「異族」的對立結構，但是在討論同族對抗時，關乎異族對抗的人物情節就會被排除在討論之中，更遑論在討論階級時的部分人物情節。甚至是在討論一個主題時，亦只能從這一主題的全部對立情節中，擷取重要的幾個人物情節做為討論都中的現象：

表7 〈雲〉中的階級對立情節全貌表

概念	既得利益者及其附庸群體	反對既得利益者壓榨之人物
全部的對立團體	外國老闆、外／本國管理者、部分工廠男工	張維傑、新工會核心成員、部分工人

上為以階級為主題時，〈雲〉文本當中全部參與對立的人物或團體，而本文採用的不是這種完全的情節：

表8 本文採用的〈雲〉之對立情節表

概念	上司（使役者）	下屬（被使役者）
採用的對立團體	宋老闆、醫公會與艾森斯坦	張維傑與新工會女工

這是因為實際而言，就算所有人物都有屬於自己的等第、位階與立場，卻不是所以有的人物都被充分而完整的表現了。這便是一個明顯的「對立情節之討論不全然等於全部情節」例證。它同時反向說明了小說的構成，本就可能來自多個不同的面向與片段。而從對〈夜行貨車〉的觀察中，更能夠發現小說的多元構成現象：

表9 〈夜行貨車〉中的國族對立組合表

國族意義的對立情節	美國（外族）	中國／台灣（本族）
人物的對立組合	摩根索	劉小玲、林榮平、詹奕宏

上為國族意義中，異族對立的人物情節關係，然而從性別關係上看待該文本時，對立的組合又會發生改變——原先屬於同一群體、立場的人物，在新的對立主題中產生新的立場：

表10 〈夜行貨車〉中的性別對立組合表

性別意義的對立情節	女人	男人
人物的對立組合	劉小玲	摩根索、詹奕宏、林榮平

在性別的情節關係上，劉小玲作為女性對立於其他男性人物，其中亦包括與他同族的林榮平與詹奕宏，這樣的現象體現出文本的真實狀態是能夠涉及多個議題的，而其原因是因為文本中的人物設計帶有不同層次的意義。〈夜行貨車〉與其他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因為設計上針對著跨國企業殖民式的經濟型態，在其中劉小玲為一種美國人與中國人的爭奪呈現（情節可視為一種隱喻）。在這樣的設計下，考量文本的全部情節可以將劉小玲視為「被爭奪的物品」，然而這樣的認知並不會使其不能夠被拆解為「異族人發生爭奪」與「女性受父權物化」這兩種對現象的詮釋。本文在這樣的前提下對文本進行局部的考察，雖不能顧及文本的全部意涵，卻能夠針對主題進行共性的梳理。

綜合前述，涉及異族對抗的陳映真小說文本，其對立結構總是指向美國對其他國家、地區（通常是台灣）的侵犯與掠奪。而其形式與程度在不同文本當中皆不相同。在此其中，共同體的被想像更容易指涉為一些價值，又實際而言這些價值也只是徒有虛名，利益或才是不同族類的人主動、被動發生對抗的原因。而這些涉及內涵與價值的問題，本文將在接下來的分節中進行討論。

第二節 陳映真小說的國族價值意識

要從價值的層面解析文本，則必須以結構當中更深層的意涵為討論對象。決定這些深層意涵如何展現的因子，在不同的主題中各不相同。例如在前章提過的階級議題，在陳映真小文本中屬於受隱含作者安排影響較大且較明顯的主題，即從人物個體的表現、覺知³⁷來看，他們的內部活動並沒有明確的指向自己

³⁷ 從表層而言確實較不會以人物的內部活動為主要探討對象（而是行為、功能）。然而涉及文本的內部意涵時，就無法繞過敘事對人物內部活動的描寫，尤其是以人物狀態作為表現重點的文本。

對階級的認知，這種認知只能藉由設計，傳達至隱含讀者的維度時方能發現。雖然就共性而言，陳映真小說幾乎不存在沒有明顯安排而導致表現傾向不明確的文本。然而涉及國族議題的小說，卻總是在人物自身有明確感知的情況下，對國族議題進行表現。所以在文本中，可能是敘事者、視角人物或是被敘事描寫內部活動的個別人，都可能有意識地進行國族的爭奪或對抗。這樣的文本更容易理解其內部意涵與其所展現的價值，也更容易獲得文本對價值表現的傾向。下述就以「同族對抗」、「異族對抗」兩小節，分析小說文本中關於國族的價值意識，以及隱合作者的表現傾向。

一、同族對抗的價值意識

在同族的對立結構一節當中，本文得出了舉例文本當中的對立結構，且這些結構當中始終圍繞著省籍的符碼，以及分斷在人對族群的想像造成的影響。順著這些幾乎是明說的意涵，本小節將繼續針對對立在價值層面之延伸進行價值意識的討論。

國族對抗在人物關係中的發生，往往涉及人物的非理性狀態，例如〈夜行貨車〉的詹奕宏上升三角關係為「一齣受外省人鄙視的本省劇」與摩根索傲慢的失言，都是在酒後導致自制力下降的設計精密的表現。在文本中，理性的人不會進入「國族狀態」之中，而這種人物最好也是唯一的代表就是林榮平。在所有可能會出現衝突的狀況下，林都選擇安穩、息事的做法與講話。不難發現的事情是，這些安穩與息事作風，為的是保障自己在公司的職位與利益。而三角戀當中的其他兩人，都相當富有感情，並且在這些情緒當中處事：

他們開始吃飯。一桌子都是她不知從哪裡學來的台灣菜：一碟蔭豉蚶；一小鍋豬腳麵線；一盤炸肉塊；半隻白斬子雞……「做得還地道嗎？」她邊吃邊說。「嗯，」他說。其實她並不是一個善於烹飪的女人，除了白斬子雞，都很不對味。³⁸

此處可以從微小處見到外省二代的劉小玲對「台灣人」的真實想法，是努力想要融入，並且不是持鄙視或排斥態度的。這種溫馨的橋段顯現了她在乎詹奕宏的台灣身分，而這種溫馨完全是來自於她的這種體貼與在乎是來自於對人的感

³⁸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200。

情，來自於一種愛戀的情緒。當她受到詹質問對台灣人的看法，也能發現這種情感正（於行動中）持續作用著：

喝醉了酒的男人的問題，她想。然而她依然認真地說，「我的心裡，有個台灣男人，」她望著他的老是有點寂寞的、有點生氣的側臉，「他最像個男人……」「我愛他。」她無端地感傷起來，「可是，他並不愛我。不愛。」她說，「不愛啊。」³⁹

情節的定義取決於人物的關係。從事實上本文採用三角戀愛來描述詹、林與劉三人的關係。然而，在「劉小玲－林榮平」與「劉小玲－詹奕宏」的情節關係中，劉小玲始終都是處於「可被捨棄」⁴⁰的。是以，劉小玲與此二人的情節關係呈現一種畸形、不對等的愛，它時常是單向而不是雙向的。而這樣的設計，與其中不斷被提及的省籍符號相結合，使得「分斷與省籍」的符指在這樣的情節中被透露出來——失去了原本家園的中國（外省）人，在台灣也受到本省人的排斥與不愛惜。如此將「分斷」於台灣社會的第二重意義，不只與大陸分離，也不被台灣人接受，包裝成愛情故事的「女盼男」不可謂其不高明。而相比於其他涉及國族對抗的文本，〈夜行貨車〉中隱含作者的表現傾向相對而言是明顯的。在設計的比重上更多的安排劉小玲的流落背景與盼男之心，而最終安排一個圓滿其愛戀與依附需求的結局，展現「團結」的中國意識⁴¹。

若說在〈夜行貨車〉當中，同族對抗與它們最終應該和解的希望，以一種隱喻的形式表現，那麼及至〈萬商帝君〉時，相關議題的表現已經到了「明說」的地步了。在該文本的敘事當中，隱含讀者可能會產生一種錯覺，是陳家齊與劉福金的對決實際上就是「國族認同」的對決。這樣的想法忽略了這兩人在表層的行動動機之設定，本來就是相互爭奪權位的情節關係。在〈夜行貨車〉中藉由事象表達國族意涵，然而在此文本中，國族是夾雜在商案報告中的言談，相互對決、辯證：

劉福金以一種精巧陰謀的設計者那種快樂的聲調說，要使每一個消費者

³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206。

⁴⁰ 關於這點在其他小節討論中亦曾提及，女性的「被所有」與「被拋棄」在劉小玲這一人物的呈現上是鮮明的，蓋因非本章節題旨所以不就性別階級的角度進行分析。

⁴¹ 期並不如法律明確的規定「什麼是中國人？」，或者是明確的指出中國是哪個國家。而是以本省人與外省人放下省籍、相愛相持的和解為呈現的現象。

成為今日的國王……劉福金說，「挑起慾望，驅使他們採取滿足慾望的行動——購買我們的產品。而且要在滿足了一個慾望的同時，又引起一個新的慾望……」

基於這樣的企業哲學，劉福金展開了他那把 Rolanto 小鐵板爐向「廣大的台灣農村」推廣的計畫。據劉福金說今天的台灣農民很富裕。凡是買得起電視、電鍋、機車，甚至小貨車和小轎車的農民，全都應該是 Rolanto 的市場。「在當前，台灣有一場鄉土文學論戰，」劉福金說，「鄉土成了最流行的時髦語：文學家寫鄉土；畫家畫的是鄉土；攝影家拍攝的，也是鄉土。但是，So far，還沒有人把商品和鄉土聯繫起來。Rolanto 就是這個產品！」⁴²

劉直接將文壇當中的文學任務之爭，援引到銷售受眾與當下潮流的說明，其餘銷售層面的意義在此處不做討論。而從國族的意義來看，這樣一段報告其實就是一段他將自身認同的國族意識，包裝為言談的講話。對此，文本安排陳家齊隨後予以回應：

……在這個新的台灣中，對襟唐裝的老人……我曾在美濃，一個台灣最南部的小鄉村，看到過。但整體來說，這樣的台灣，早已消失……我的父親，是一個堅持在傳統中國方式下生活的老人……任何人都知道，這樣的中國人，儘管個別地存在著，卻一般地——在社會上、歷史上，以及在統計上，完全消失了……

陳家齊的結論，是他支持劉福金把 Rolanto 在整個台灣市場中推進。但是，他認為在廣告上，有兩個可以考慮的思考……「我希望，我們的廣告代理商，在重新拍攝農村時，千萬要放棄對襟唐裝老人、竹叢、古井和老房子這類映像，」陳家齊笑著說……「要使我們的台灣鄉下人，看起來明智，具有現代意識，絕不憚於使用任何優良的、現代的、進口的商品。」陳家齊說。⁴³

從銷售的角度上，陳家齊的語意是劉福金的行銷廣告對受眾的把握是失真的。然而放到國族觀的語境中，此處的語意就轉變為在諷刺劉福金對於國族認同的

⁴²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342。

⁴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352-353。

膚淺與盲目。而將這段較勁放在一場行銷案的報告當中，能夠使這兩種意見看起來真的在「對決」。如此一來，在兩人的國族觀都被敘事完整陳述之後，這場簡報的贏家就被理解成隱合作者的表現傾向：

劉福金知道他被打敗了。對手是個可畏的敵人，打倒了他，卻留下他的面子，留下他的全屍。

——他們中國人，真厲害。真厲害……

他軟弱地對自己說，⁴⁴

從這裡的認輸，雖然能夠說明兩個人物在論述上的優劣，然而文本顯然並不是在褒揚兩種論述中的任何一種，只是藉另外一個的相對高明、見識更深，來顯漏那個代表台獨論調的言談之膚淺。是以隱合作者是以一種貶抑的方式，透漏反對分裂的中國意識（反對的傾向）。

在表層結構的對立原因上，〈歸鄉〉不若〈夜行貨車〉那樣立於男女之情上，其動機更接近〈萬商帝君〉，由利益引發人與人的衝突。該文本以兩個階段的鋪墊，創造最終的對立——楊斌與他的二弟一家不能相認：

「我再說，你行許就懂。我在大陸做了幾十年中國人，這回回到台灣老家了，沒有人認我這個台灣人，還當我外省人！」楊斌說，「張清、郝先生、老朱，都應說我是個大陸老兵。」

……

「連自己的親弟弟，自己的親姪子，想吞占我的財產也就罷了，」楊斌苦笑說，「還硬生生編派我是共產黨，是冒牌來搶財產的外省豬。」

「你怎麼也知道了？」林啟賢詫異地說。

「有一回，左思右想，兄弟一場，一些話總得說清楚，就撥了電話找你二伯父。」楊斌說，「林忠接了，借著酒意，說了那些話，說我是外省豬，還掛我電話。」⁴⁵

在該文本情節安排下，呈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真相是不斷改變的⁴⁶。然而那些關

⁴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351。

⁴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七），頁420。

⁴⁶ 最初楊斌順著公園眾人說自己是外省人，第二隊跟外省老兵聊起台灣兵時又成了外省老兵，最後姪子揭穿他說的那個故事裡的台灣兵正是他自己。

於楊斌身分進行隱藏、扭曲的段落當中，卻都包含了其一部分的真實。面對此處姪子林忠的謾罵，藉由前文能知道他說的並不是事實。而這些楊斌或者可以稱為林世坤的記憶，正好讓吞占財產、翻臉不認兄弟、伯父的林家二房的利慾薰心，對比楊斌訴諸家鄉、族人情感的訴求。同時，因為情節的設計，而使得「分斷」的情境首次逆轉，將外省人在分段體制下的處境巧妙的轉讓給一個本省人：

「方才和小虎打了電話。我怎麼忽然就明白了。」楊斌說，「你方才老說不懂。你懂的。你不是說，人不能那樣。這就同你大伯母說到一起了。她說，再怎麼，人不能就不做人。你懂的。」

「……」

「可是，別人硬要那樣，硬不做人的時候，我們還得堅決不那樣，堅持要做人，這不容易。」楊斌說。

「可是你做到了，大伯父。」林啟賢說，他的大眼睛閃爍著喜悅和孺慕。

「你明天去幫我辦機票。我一個禮拜內走。」楊斌說，「想家了。」

「大伯你得常回來。」

「我會，下回帶你大伯母，帶小虎來。」楊斌笑了起來，「畢竟，台灣和大陸兩頭，都是我的老家，對不？」

「對！」林啟賢簡潔地說。⁴⁷

這次處在分斷的人不再依靠其他人物的決定來得到救贖，楊斌的心念直接決定了他的選擇與言行，這與劉小玲有所不同。然而不可忽略的事情是，在這個敘事序列當中，文本加入一個相當扁平卻又相當重要的人物林啟賢。在這個幾乎一半以上的篇幅都由主要人物楊斌擔任敘事者的文本，如不安排一個明顯的、也在文本內的敘事接受者，則會使楊斌的話語從關於個體的敘述，轉變為精神病患的獨語。如此段引文，若不是對著一個正直、熱心且孝順的姪子說，這段看似溫馨的話，在語意上就會顯得詭異又反諷。是以，可以說藉由人物情節的安排，使得行動動機訴諸情感的楊斌得到一定程度的圓滿，藉以表現出「兩岸為家」的價值理念，呈現出團結、反分斷⁴⁸的中國意識。

⁴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七），頁421。

⁴⁸ 從文本表現上來看，傾向的展現依然脫離不了對於「非傾向」價值的醜惡描寫。

相較於前面的文本，〈忠孝公園〉所能乘載的內涵與意義，是更為豐富且複雜的。在該文本中，「本省人／外省人」這一分斷體制下的基礎分類顯得很膚淺，只能觸及兩個老人人物的最表面。以這樣的分類去看林標與馬正濤，甚至會有去其脈絡、產生誤解的風險。從個人的處境而言這兩個人都是受人利用、又被人遺棄之人，而文本的表現方式是分別表現這兩人的同時，也把選舉與他們之間的關聯呈現出來。然而奇特的是，在這人物情節完整呈現時，選舉這個大事件之結果顯得與林標幾乎完全無關：

曾金海說，他和陳炎雷委員依據各種數據，算出來這五十年間，連本帶利，帶物價指數，應該以一千七百倍算……

……

三月，果真就換了一個政府了。「台灣人的天年了。」曾金海興奮地在電話裡說。

……

五月，陳炎雷委員成了資政……要台灣人原日本兵或其遺屬直接去找日本人洽領兩百倍的補償金。

「這就是說，兩百倍計算，你要領不領」……

……

「新政府是我們自己的了。我們的新政府特別需要外交支持，需要日本支持不能為難日本，因小失大。這是陳資政說的。」曾金海在電話中誠懇地對林標說。「為了咱自己的政府，請大家無論如何要體諒。兩百倍就兩百倍吧。」

曾金海是用日本話強調了「為了國家」這句話的。

「日本人當時不就是以『為了國家』、『為了天皇陛下』，騙了多少人死在南洋沒有回來……」林標提高了嗓門對著電話筒嚷起來。⁴⁹

從這段情節，能夠發現選舉前的族群（共同體）在小規模的瓦解，這是由於政客已經取得屬於他（們）的利益，就不再關注老日本兵的利益。可以注意的是這些講話依然充滿了關於想像的言談⁵⁰。不同於其他國族文本當中，國族的價值

⁴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九）（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93-394。

⁵⁰ 羅蘭·巴特於《神話學》中的「布爾喬亞作為匿名社會」中提及在布爾喬亞的社會中，沒有無產階級的文化、道德觀及藝術，即一切不屬於布爾喬亞的事物都被迫「借用」布爾喬亞之觀念。而若將此處的布爾喬亞代換為「政治的既得利益者」，則不難發現「陳委員們」即是用這套

藉由人物行動、言語逐步堆積。林標與馬正濤越是隨著時間向前，原先內部的價值越朝崩解狀態前進，而時間是表現在文本的順敘上：

大選揭曉，國民黨果真失去了在台灣的江山。馬正濤一個人在家裡發了幾天傻，不能理解這對他而言是天翻地覆的大變故……

……自今而後，那秘密地封存在各個機關裡的，富有他親筆簽註的無數的殺人檔案，難保沒有曝光公開的一日……

……

約莫一個月後，人們循著異味，在馬正濤那家孤獨舊屋裡，發現馬正濤在睡床上被一把金黃的手銬反銬著的屍體。⁵¹

如果說林標是在大選後被新的政府與日本人遺棄，則大選的結果證明了國民黨的失勢，也就視同過往在黨國特務體系下骯髒事做盡的馬正濤，不再受到黨國庇護，是受到國民黨的遺棄。論及國族觀與這兩個被遺棄的老人，其脈絡無疑是複雜難解的。

從文本對其過往的插敘來看，林標的一生都在被別人灌輸「他是某國人」的說法，而這種說法經過幾次改變使得他混亂、迷茫，且完全無有歸屬感。而馬正濤一生的選擇其實能夠歸結於他欲要維持自己處於一種「特權狀態」。他起先是一個地主階級的孩子，因為日本人佔領東北而進入警憲體制，後又轉投國民黨的警憲體制，可謂是從「半封建的布爾喬亞轉向專制體制的布爾喬亞」。如果國民黨的中國國族論，是將大陸人與台灣人都看成中國人，那麼馬正濤在他的職涯裡就殺了一輩子的中國人。文本安排這樣的馬有上面引文中那樣的死，投射出隱含作者對這種人物的無可同情，且對其行為持反對意見的表現傾向；從林標的情節安排來看，其無論是情感的訴求或是對「我是誰」的疑問都沒有在文本情節中得到圓滿的完結。然而文本呈現的更多是其可憐無助的方面——他並不像馬正濤一樣擁有選擇的機會，他的不幸有一種命定特質。是以，隱含作者在整體的敘事安排上分別以不能同情與值得同情的方式描寫兩個老人的狀態，並以此對這兩者的國族價值進行否定，呈現出反分斷⁵²的中國意識。

綜本節前述，在陳映真小說文本當中涉及同族對抗者，在其價值的表現傾

道理在創建一套「自己的政府」之神話。

⁵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九），頁389-391。

⁵² 該文本中的分斷又有了更新、更深刻的意涵，不但指涉中華民國政府與其警憲體系所維持的兩岸分治局面，同時指涉到更早的歷史階段，日治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斷事實。

向上並不具備絕對的同一性。這是因為從人物、情節到敘事結構，在不同文本中有不一樣的安排與表現。然而無論其如何安排，隱含作者必然會呈現出對深層的價值的傾向，在無有直接言說的前提下，傾向的表現不出「對其一予以肯定」、「對其一予以否定」、「一方否定，另一方肯定」及「對兩方都否定」這幾種。而無論傾向如何透漏，陳映真小說文本總是指向「中國國族意識」，並從這樣的共性當中，折射出一種「民族主義⁵³的中國統一」之世界觀。

二、異族對抗的價值意識

在異族對抗的文本當中，對立以及其內部所涉及的價值意涵就表現形態上，不若同族對抗文本那麼一致。在上一小節當中，最具殊性的舉例莫過於〈萬商帝君〉中「特別的」省籍關係。然而就是這種人物脈絡最豐富、怪異的例子，也不脫「同族人的對抗」的範疇以及「省籍情結」的表象這樣的同一性。而若除卻「異族符號」，異族的對抗就基本不具備國族的意義，這點才是異族對抗文本的同一性。所以從表現價值的方式，到價值的維度，每個文本都是不大相同的。就〈夜行貨車〉與〈萬商帝君〉而言，同族對抗及異族對抗的描述，都是文本中的部分內容，是相對片面的。

從〈夜行貨車〉講起，在同族的對抗中的表現，其比例顯然大過了對異族對抗的表現——在分別表現了林榮平、劉小玲與詹奕宏，以及他們之間的情節關係後，摩根索顯得像一個可有可無的配角。他以他被賦予名字、國籍講了一段非常冒犯人的話，然後被詹奕宏大聲喝斥，稀里糊塗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由此可以歸結，摩根索的敘事意義有二：一是他做為一個扁平人物，卻能牽動事件的行動；二則是他所代表的國族符碼是美國。所以實際而言，摩根索不只是站在詹奕宏與劉小玲對立面的「美國人」，而應該將其視作文本中「美國」的具象。真正站在「台灣的中國人」之對立面者，是那些跟著美國人走的「去國族者」：

他看見摩根索和達斯曼一左一右地坐在劉小玲身邊，興高采烈地談著。他對兩個外國人感到忿恨。「不，」他想，輕輕地搖搖頭，「最可恨的毋寧還是自己吧」。曾是自己情婦的女人，受到外國老板的輕薄，卻要幾乎

⁵³ 這樣的論點認為兩岸人民係屬同文化、同種族的社群，理因合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從這個觀點也可以看出「想像的共同體」的想像可以是針對著文化的根源，也可以針對區域、生活方式進行分析與討論。

反射性地佯裝不知；佯裝自己和那女人之間什麼也沒有。「這樣的自己……」他想著。

「林經理，」Davis 徐說，「敬您。」

林榮平堆下滿臉的笑，舉起自己的酒杯。Davis 是個苦學的青年。十年前，高商畢了業，到美軍單位做事。美軍的裁減使他失了業，經青商會的朋友介紹給林榮平。⁵⁴

從此段可以知道林榮平對於他身處的狀況、以及國籍的意義都是有知覺的。然而當他幾乎要進行自我批判時，一個不曾出現於前文的、「靠美國吃飯」的青年的出現打斷了他。整體展現了這種失國族者的樣貌，與他們所代表的價值，實際上就是依附強權、爭取利益：

「James……」林榮平小聲說。

「像一個來自偉大的民主共和國的公民那樣地道歉。」詹奕宏說。

「怎麼回事，J·P？」摩根索先生嚙然地說。

「James……」林榮平說。

詹奕宏猛然轉向林榮平，臉上掛著一個悲苦的、痛楚的笑。

「J·P，」他改用台語說，「在蕃仔面前我們不要吵架，」他免強地扮著笑臉，努力用平和的語調說：「你，我不知道。我，可是再也不要龜龜瑣瑣地過日子！」⁵⁵

從人物行動的表現來說，詹奕宏在此事件中的行為選擇，有兩個超越：其一，他超越了同族對立中，對省籍與「鄉土劇」的自卑；其二，在一成立的前提下，超越林榮平去起身對抗外國人。這使得原先在同族對抗層面爭奪劉小玲的兩個男人，在異國符碼的介入之下，變為「爭取同胞尊嚴」與「罔顧同胞尊嚴」的兩種價值選擇。並且從該文本在同族議題下透露出的「團結中國意識」，可以在這個前提下得出「反抗美國，團結爭取尊嚴」的反美國國族意識。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發現，陳映真小說裡，兼具同族與異族對抗的文本，實際上是在一種對立結構成立後，藉由情節的豐富（介入第三元），去改變原先的

⁵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217。

⁵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224。

二元以形成「新的二元」⁵⁶。在討論異族對抗結構時，本文指出劉福金與不滿美國政治行動的那些民眾是對立的，而且同於林榮平與詹奕宏是一種「去國族者 vs 有國族者」的對立：

「Irrational nationalism!」陳家齊突然獨語似地說：「盲目的民族主義！」

「Peter Drucker!」我脫口而出。

彼得·杜拉卡著名的一句話，就是「盲目的民族主義」！

「這一句呢？」陳家齊從後視鏡中笑著看我。他用清晰的英語說：「…We need to defang the nationalist monster!」

「Again, Peter Durcker!」我又一次脫口而出，覺得向猜到了好謎那麼高興。

又是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卡的名言：「……吾人應該將民族主義這個惡魔的毒牙拔除淨盡！」

真不料陳家齊對 Peter Durcker 這麼熟悉，我想：這傢伙，還真不錯！

……

我們在鏡中相視而笑了……⁵⁷

從此段能夠發現劉福金與陳家齊已經從一種敵對的關係中，藉由一段對管理學之父論調的背誦與對答，成功地與彼此「劃歸」⁵⁸在一個新的族類當中。關於這裡的設計值得一提的是，「民族主義」的表現及其訴求本就不是一種理性、合於科學要求的學說或理論，一如安德森如是說：

但是，如果事實是清楚的，那麼該如何解釋這些事實則是一段長期聚訟紛紜的公案。nation（民族），nationality（民族歸屬），nationalism（民族主義）——這幾個名詞涵義知難以界定，早已是惡名昭彰，遑論對之加以分析了……具有說服力的民族主義理論卻明顯的屈指可數。⁵⁹

⁵⁶ 事實上，〈忠孝公園〉也具備這樣的第三元描寫（日本帝國）。然而這個第三元卻不是在文本中增加，反而是在敘事過程中消解。發生在林標與馬正濤身上的，並不是你要選擇當什麼人？反倒是對他們原來的想像加以否定。

⁵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429-430。

⁵⁸ 透過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去認定某人為「自己人」，其實也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的發生。

⁵⁹ 〔美〕班納迪克·安德森著（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頁38-39。

是以，劉福金與陳家齊捨棄對自我文化、民族的情感，實際上是在某種動機下，作出的「理性決定」。然而這種理性的動機，終究不外乎是對金錢、權力的追逐，使他們身上「人」的成分減少，而最終透露出了一種自我異化的本質：

……我們看見一列學生在遊行，前頭一個巨幅的紅條，用白紙寫了幾個大字，貼在條幅上：

「中國一定強！」

「要是幾天前，這五個字，一定叫我流淚。」

學生們捧著獻金箱，高喊口號，揮舞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我們的車子 in 行列邊不能不放慢了速度。⁶⁰

文本此處讓對立處在一個突發的事件中，使這種對立極大的外顯。這種直接的描寫使得隱含讀者可以不受文本空間的限制，結合陳、劉兩人在前文當中的對立和這種對立的原因⁶¹，發展出一種諷刺的「逆成長」表現，由此便透露出隱含作者反對「美國『理性』⁶²的背叛」、支持中國國家民族的國族意識。

將〈六月裡的玫瑰花〉與〈賀大哥〉放在同一章節討論是很值得嘗試的。就題材而言，它們都對應著越戰。而從時間上看，它們相隔12年的發表時間又能夠在同一場戰爭下，因時間與人物的不同而展現出的不同意涵。雖然具體而言，兩文本的人物有著當然的不同，然而他們的內涵上的不同，更甚於表層可見的差異。

在針對表層對立結構的討論中，本文得出〈六月裡的玫瑰花〉是「亞洲 vs 美國」的對立結構，這樣的階段結論停留在對文本相當表淺的觀察上。因為就定義而言，「亞洲」顯然不能僅止於台灣、越南這兩個區域。又從美國軍事介入的區域而言尋求一種「共性的亞洲」亦不能成立。誠然在亞洲區域，美國（曾經）軍事介入了中國、日本、韓國、越南與阿富汗等國家，然而這些國家全部總和也不能等於「亞洲」之概念。在文本的設計中同時引入越南與台灣的人物處境，是因為這些處境有其相似之處，甚至是在命運的本質上基本一致而能相互呼應、完成結構。而欲要證成這樣文本中的深層價值，則要從人物的內部活

⁶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五），頁428-429。

⁶¹ 民族主義訴求的「意」，被新的「象」也就是遊行的青年學生繼承了。

⁶² 這種理性在文本中的經理口中是對消費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信心」，然而從文本設計來看，這樣的說法無疑是一種逃避責任、利己的開脫之詞。

動下手：

「你的父親說：孩子，我們回家去——說下去。」

「我們回家去。有時候，有時候那個白人還沒有走，我們就得躲著等他。然後我的母親在門口送走那個白人——他是一隻骯髒的豬……」

……

「有些駭怕，」軍曹認真地說：「……但你一下子就喜歡它了——你曉得，在我的生平，第一次同白人平等地躲在戰壕裡，吃乾糧，玩牌，出任務，一點差別也沒有。他們被敵人擊倒了，一點也沒有特殊。在打仗的時候，你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合眾國的公民。」

……

「我不知道，」他說：「有時候我真希望戰爭永遠沒完……」⁶³

在看診的橋段裡，巴爾奈講述了自己在（美）國內的種族經歷，以及受此經歷影響所衍伸的對戰爭的看法。從這樣幾乎是對人物內部進行直接剖析的敘事中，能夠從社會問題的層面質疑美國的建國精神及其價值⁶⁴。而在文本內，這樣的敘事則把戰爭這一群體的大事件帶入個體人物的感受當中，並發生新的意涵——黑人巴爾奈陷入必須透過投入戰爭、取得軍功的行為，消彌種族階級所帶來的貶低。這是一種藉由暴力來獲得認同的價值，而且是體制帶給他的一種「方法」。然而，這種方法的本質，其實是轉嫁暴力而達成體制利益。是以，與這使他從祖輩奴隸的命運解放，從而獲得軍銜的「美國價值」（美國夢）其實際的對立者，即為那個他在異國引發的「跨種族的愛」。這樣的愛情，從人的認知層面消滅了種族、階級所帶來的分裂、不理解與暴力。而藉由安排最終選擇繼續轉嫁暴力巴爾奈迎來死亡的結局，文本以一種懲罰的方式顯露出對暴力的美國價值之否認，是為反美國戰爭侵害、支配的國族意識。

〈賀大哥〉文本表層的「中國 vs 美國」對立結構存在一個很弔詭的問題：它表現的是越戰對於美國青年的傷害，這個青年與台灣（中國人）少女發生一段幾乎是柏拉圖式的戀情，而這樣的文本最後卻表現中國與美國的對立，而且其成立的方式與〈六月裡的玫瑰花〉基本上並不相同。欲要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必須理解該文本中的美國青年麥克·邱克是陳映真小說文本裡，不常見的

⁶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二）（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201-203。

⁶⁴ 這裡指人的自由、平等。

美國左派。是以，面對擋在他身前的國家發動的戰爭，他的反應與黑人巴爾內有些不同：

病：「不，醫生。我只是想明白罷了。你為什麼那麼做？每個人為什麼那麼做？在越南，為什麼？諱名『瘋狗』的梅地拿上尉，為什麼？」

醫：「為什麼？」

病：「因為他們的後面站著一個巨人——國家。在越南的孩子們，都是國家的受害人。你以為這是無政府主義的胡說嗎？」

醫：「不全是，我想。」

病：「我是想明白了的。不一定跟什麼無政府主義有什麼關係。可是，你瞧，正是由於受害者，終於成為加害者——你懂我的意思嗎？然後加害者又成為了加害於人這個事實的受害者。醫生，你懂我的意思嗎？好像我，醫生，整個的我自己被撕成一片一片，好像，好像他們用整堂的子彈把一個越南女人打成稀泥那個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啜泣聲）

醫：「麥克，好兄弟，不要擔心，我們就是要把撕成一片片的你再粘回整個的你……」

病：「不！醫生，我猜我已經恨透了我自己。我在想：如果能像脫衣服一樣，脫掉骯髒的衣服一樣，把不堪的我脫掉，然後，像換上一件又乾淨、又新的衣服一樣，換一個我……」⁶⁵

麥克·邱克與巴爾奈最大的不同，是他們在文化資本上的差距。從邱克的這段言論中，美國人（以邱克狀態為象徵）的價值被分裂成兩種：「被國家掌控的兇手」與「反對這種掌控的反抗者」。這對應了邱克的人格分裂。顯然，對女學生小曹而言，「賀大哥」的教導對其的影響應當是後者。所以其特別的狀態藉由情節安排發生——中國人的女學生繼承了來自美國的「反抗者」價值，所以被政府的情治人員視為美國邪說的擁護者；這樣的情治人員，實際代表的不是他表面所說的中國「仁義」，反而是美國曾在戰爭中顯示的國家暴力。藉由邱克的瘋，文本表現「反抗者」的值得同情，從而透露出反對國家暴力的國族意識，其對象針對發動戰爭的美國與國民黨的專制中國。

⁶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三），頁169-170。

綜上所述，本章中舉例的異族對抗文本在表層上皆以台灣或者中國為本位⁶⁶，去對立一個永恆的他者——美國。而在敘事表現上，立場則往往顛倒過來，美國作為強勢的軍隊、上級、理論家，而將中國人視為他者，肆意侵犯、奪取。而結合這些文本對負面價值否定的表現傾向，可以發現其中展現出「反美帝國主義」的世界觀。



⁶⁶ 從內容上可以發現文本中的台灣與中國並不是矛盾的關係，它們更像是對地域與政權的分別稱呼。

第四章 陳映真小說的批判結構及其世界觀

雖然性別、資本、權力、國家與種族的議題不分時期的出現在陳映真小說文本當中，其內部的人物情節卻不一定是「兩相對立」的。亦即有些文本的結構，並不若先前提出的例子那樣，以「人物對立人物」的關係，這是「對立內部化」的最大展現。如是，本文以這種單一主要人物，或是沒有明顯人物間對立的文本，將其表現意圖稱為「批判文本」，探究文本內「反對的意識」。

在相關章節分類導出，以及內文分析的進行之前，本章的指導詞彙意旨因當在此爬梳。關於「批判」一詞，可以普遍的在政論、社會學論文或是任何單位的社會批判意見中被提及。它既可以是動詞，也能夠代指一種對社會母體、事件、現象、團體乃至個人的意見。這一詞彙的使用，雖然幾乎是一種分析上的習慣用語，卻沒有被仔細定義過。相關論題裡，若要尋找說明批判為何物者，當屬一些學者針對其他哲學的分析，較可以看出其論證邏輯。而馬庫色對黑格爾哲學的整理便是其中較為明確的：

黑格爾的哲學的確被稱為反思的哲學。那個體現一般感觀的假設事實確信，作為真理的實證標誌存在於現實真理的否定之中，是一種原初的動機。通過這種否定，使真理能夠被承認。辯證法的力量存在於批判的確信之中，全部的辯證法都被一種瀰漫著本質否定的存在形式的概念聯繫著。¹

從該段論述可以得知「批判」的定義，來自於辯證法當中否定性質的發現。而該意見指出否定的意義，是在進行真理探求的過程中，對現有的真理提出假設與挑戰，是為批判的抽象概念。本文的批判不脫離「否定」之意義，乃針對小說敘事表現，探討文本內的敘述意識在設計上的反對對象為何。因為小說文本具備的事件與人物的描寫，這樣的分析裡，批判將從它較為抽象的概念，變為具體的人物、安排或事象，從而可以論證主體意識之傾向。

以下本文將在本章以同樣的研究架構，將大節分為「結構原則」與「批判意識」進行討論。而在大節當中，將依文本主要人物之設定類型分為「社會人物」與「政治人物」，這樣的分類針對了主要人物在社會體制當中，處於什麼樣

¹ [美] 赫伯特·馬庫色著，程志民等譯：《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興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10月），頁24。

的立場與位置，以「是否從事政治活動」作為分野的標準。並且依循這樣的標準，延伸主要人物內部的對立，延續其主要人物分類為「社會型文本」與「政治型文本」，以分析對立當中，文本之敘述意識傾向於表現對立之兩種價值中的何者。

第一節 批判文本的結構原則

本文分類的批判文本，與其他兩章中的對象最不同的地方在於文本設計的對立形式發生了一些變化。在現有的陳映真小說研究當中，有些研究依據時間的分期，認為這種文本當中的一些具有「自傳」或「自我批判、檢討」的特質。然而，這種依照時間分類的研究方式可能會發生的問題是，該時期的小說都一定具有「自傳性質」嗎？或是具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如果不在這個時間段發表，要算在哪一個分期？而且，將陳映真生平、真實事件納入考量的研究，或許可以說某些人物對應著陳映真的真實經驗。但是，陳映真總是沒有當過城鎮醫生、情治人員或是國民黨官員的，那這些單獨存在文本中的人物，又當如何解釋？這樣的扣問彰顯了分期方法的失當之處。如若除去陳映真的因素，將批判的意涵指向文本當中的人物、群體或事件，這樣一來方能使研究有同一性可循（無論如何文本內的人物都是討論的唯一對象）。下述將以「社會型文本」與「政治型文本」兩節探討批判文本當中的對立結構。

一、社會型文本的對立結構

如前所述，社會型文本意指文本當中，主要表現社會人物與環境對立的文本。本章所探討的文本，有時缺乏明確的對立者（敵人），有些是不存在，有些則是不表現之。在這之中1960年發表的〈故鄉〉就具備這樣的現象。在該文本中，此刻的衝突以一種情緒獨白的形式存在：

吃光了父親的人壽保險金，四年的波希米亞式的大學生活也終於過去了。現在，我憂愁的倒不是職業，倒不是前途，而竟是我之再也沒有藉口不回到一別四年的故鄉了。自從房產和家具被那些曾向父親陪笑鞠躬的債權人運走以後；自從父親咳血而死以後；自從叛教的哥哥開了一間賭窟……故鄉便時常成了我的夢魘了。²

²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57。

在這段說明「現在我畢業了、我不想回家、我不想回家是為了什麼」的陳述中，提及了家道中落、已死的父親以及經營賭窟的哥哥。而前面說明自己並不是憂愁於職業與前途這兩項關乎未來的事情，他害怕那個將要回去的故鄉：

在我考取高中的時候，我的家裡，便起了相連不輟的風暴了。正無措於生意的大失敗的時候，父親就不為人所注意的病倒了。及至於看見他咳血而慌忙起來的時候，他早已嚥了氣。這個時候的我的哥哥，清蒼著臉，條條理理的清算著債務，估價著房產家具。我茫然地看著他在燈下，一手支著他的海般的額，不卑不亢地同債權人交涉著。葬掉了父親，理清了債務之後，一家便搬出了老屋子。我第一次從半月來的麻木中醒回，便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萬沒料到的是，我的虔誠和藹的哥哥，竟左右開弓地把我掌摑在地上，並還像狂人一般踐踏了我。³

在前文中，敘事建立了一個有知識、有閱歷、虔誠且充滿關懷的哥哥，在此卻毫無緣由的毆打勝雄。此處可說是整個文本中唯一接近於「衝突」的事件。然而它並不是「現在」發生的事件，是離開家的主因。卻不是「不回家」的全部原因：

我於是簌簌然地流著淚了。沉沉如山的哥哥、細緻到我的血肉裡去的伊，可憎的鎮上的無數的嘲諷著的眼睛……然而，家是不得不回去了，是的罷……⁴

家道中落、哥哥為了生存拋棄理想（放棄行醫）、開了賭窟並且娶妓女為妻（叛教），加諸父親的離世……這現實層面的家族之不堪，它對立於精神層面勝雄喜愛的原先的家，在勝雄的內部活動中不斷拉扯，是為「現實 vs 理想」的對立結構。

從〈故鄉〉一例，可以發現社會人物這一分類的特質。在這樣的文本當中，人物身處社會的變動⁵，因為並非統治階級或一定程度的掌權者，他們的描

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60。

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65。

⁵ 變動小至家庭，大至社群、種族或國家，都可以視為人物周遭的社會變動。

寫多是軟弱、無能或者是悲觀的，〈鄉村的教師〉即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與該文本中的主要人物吳錦翔對立的，並不是一個現在存在的人物或者團體。而這種對立的由來，來自於他過去的經歷：

寡婦根福嫂變得健碩而且開心了。她不但意外的從戰火裡拾回她的兒子，而且更其重要的是：第一，錦翔依舊像出征前那樣順從和沉靜；第二，由於他自小苦讀於山村，現在竟被鄉人舉到山村小學裡任教去了。⁶

此處文本以一種隱晦的方式敘述了吳錦翔的政治立場與核心理念。吳錦翔身為一個台灣漢人，在山村苦讀的是什麼，而導致他的最終投入了日軍在南洋的戰場？這個疑問被後文的那句「舉到山裡任教去了」以及文本其他內部描寫可以推測出來：

四月的風，糶和著初夏的熱，忽忽地從窗子吹進來，又從背後的窗子吹了出去。一切都會好轉的，他無聲地說：這是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同胞。至少官憲的壓迫將永遠不可能的了。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將好轉。⁷

人物內部的獨白顯示出其對於民族的認同，與對民族國家改革進步的期待。由此不難推測，過去的學習正是這種國族認同的養成因素，而這樣的認同與殖民政府的立場發生衝突，這是人物的「因」，代表理想與過往經驗。然而現在的事實與他的希望產生極大的偏差：

那一年的夏天，他赴了一個學生的席。這是他的學生第一個應召入營的。席筵擺在正廳裡，圍坐著一家大小。紅櫃桌子下排著一大瓶一大瓶的土米酒。在燈光下，每個人都興奮著；都紅著臉。

……

「可也真快。」老年人說。

「快呢。」大家和著說。青年人兀目笑著，都沉默了。

「快什麼，嗯？」吳老師說，強瞪著眼：「快麼？……人肉鹹鹹的，能吃

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45。

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46-47。

麼？嗯？」

……

「自然，自然。人肉是鹹的，哪能吃呢？」

「我就吃過。」大家都還懶散地笑著，「在婆羅洲，在 Borneo！」

……

「吃過麼？……拳頭那麼大一箇，切成這樣……一條一條的——」……

……

大家都噤著。這時候，吳老師突然用力摔下筷子，向披著紅緞的青年怒聲說：

「吃過麼？都吃過麼？嗯？……」

接像一個小兒一般哼哼哀哀地哭了起來。⁸

吳身為一個老師，面對學生即將進入軍伍，展現出屬於他的無措⁹。他的理想從兩個方面受到打擊：民族的分裂與政爭的再次發生——發生在他曾經希望能成為改革社會手段的，受他教育的學子身上。這是將戰爭放在吳錦祥的對立面，而學生則被放在拉扯的中心點，將之放在吳所暢想教育環境下可以代表「希望」，然而現實中他只能被放入戰爭，代表「絕望」。而這樣的對立發生於吳錦翔一人的內部，是「理想 vs 現實」的對立結構。

提及人物的無能狀態，在陳映真小說文本裡，並不限於學生或是鄉村的小學老師這樣幾乎可以說是無產階級的人物。這點從分析〈兀自照耀著的太陽〉一文可以得到證明。該文設計了一群市鎮的布爾喬亞人物，¹⁰因為其中一人的孩子病重命危而齊聚一堂，而這個人是一個醫生。作為情境的對比在文本持續了一段無主題的人物對話，這名魏醫生加入這場對話，提及三個月前的一場礦難。因為自己醫生的身分，傷重的坑夫們排滿他的院子。當時他女兒的小淳，不同於因為階級以及常見這種傷亡而麻木的魏醫生，貼著窗子流淚。對比魏醫生當時不以為然，呈現了相當程度的冷漠：

⁸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51-53。

⁹ 這種無措是無力改變現實的挫敗，表現為對戰爭的忿怨與瘋狂。

¹⁰ 布爾喬亞一稱來自資產階級的英文「bourgeoisie」。在《共產黨宣言》中，它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對立於無產階級：「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本文在這裡所謂的布爾喬亞人物，並不是指這些人物掌控生產工具、奪取勞動成果，而是指這些人物擁有的資產、文化資本以及意識形態，在這種以勞工為多數的城鎮中，屬於另外一個階級，而以布爾喬亞稱之。〔德〕卡爾·馬克思、斐特烈·恩格斯著，麥田編輯室譯：《共產黨宣言》（臺北：麥田，城邦文化，2021年12月），頁40。

「那時我甚至是沒有安慰伊的。」

……

「我還想了些什麼呢？」他對注視著他的陳哲說：「你起初很不同意我，後來竟然也接受了。我這巴該耶落！」

魏醫生輕輕地拍著後腦勺。他無助地笑著說：

「對罷？……我曾自以為是另一種人。我的資產，我的教養，我的專業者的訓練，……是罷？」

「……」

「你們與我並不盡相同。這我是知道的，當然知道。但我把你們當作表親似的，終於也是『同族』的罷？」¹¹

魏醫生與小淳，或者應該說當時的礦工家屬在一定程度上共情了。這是因為現實的情況超越了他的階級與知識所能處裡的範疇，使得那知識給予的理性規範消去，無所適從的魏醫生，自一個醫生、一個布爾喬亞族類，變為一個單純的父親：

「可是，陳哲……」菊子惶惑地說。陳哲看見菊子抓著小淳的手。他失聲地叫了起來：

「魏醫生，看看小淳！」

……

「媽咪，為什麼哭呢？」小淳說：「爸爸，為什麼媽咪……」

……

小淳看著陳哲，微笑了起來。那樣無邪的笑臉，使陳哲的整個心發疼起來。

……

「許阿姨；媽咪；許叔叔……天一亮，我就好了。你們要陪伴我到天明……。」

女孩又睡了過去。所有人都站立起來，圍著病床。魏醫生按著小淳的脈搏……醫生看了看手錶……

……

¹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313-315。

「也許淳兒能留下來也說不定。」醫生說，俯視自己按著脈搏的手……¹²

情緒與希望充斥在所有人物的行為之中，其中變化最大者依然是魏醫生。在文本安排的這段迴光返照下，魏醫生原先的理性反而直接瓦解了。他所說的話語不再是一種專業的判斷，比較像是一種對情勢發展的祈禱：

凌晨的時分了。一股不可抗拒的睡意侵襲著他們。京子夫人和菊子相互依傍著睡熟了，他們低垂的睡臉，彷彿夜裡的睡了的水仙。醫生斜著頭，把雙手抱胸前；陳哲沉落在他的大沙發裡；許忻仰著天斜在它的藤椅上；都深深地睡熟了。太陽升起的時候，小淳安安靜靜地在五人沉睡的勻息裡以及初升的旭輝裡斷了氣。……¹³

人物個人的願望與最終的事實相違背了。而這種願望所造成了後續效果，也形成更深刻的拉扯。其經歷了努力、認知、告白、妥協，並且最終仍一無所獲的魏醫師，從理想的方面而言無論是布爾喬亞的、專業醫生的部分，都與現實呈現的，一個動搖、擺盪而自我否定的「父親」有相當程度的拉扯，表現出雙重的¹⁴「理想 vs 現實」之對立結構。

與〈故鄉〉相似，〈鈴鐺花〉的文本敘事並沒有什麼「當下」的事件。在大部分的過程當中，衝突與事件是缺少的，而對話則比較多。藉由對話與「不得不向前的時間」，敘事才得以推動，使得很大一部分內文，顯得「像在紀錄兒時的某一段時間與對話」那樣。然而即便缺少，並不代表文本無有事件表達：

「他打過你一巴掌，你不會記恨吧？」曾益順說。

……

……他茫然地坐在地上，蒼白著臉，顯然不曾料到這突然的攻擊。

「沒有筍龜，還錢來！」謝介傑說。

就在這時，高東茂老師走進了教室。除了我一個人，來要筍龜的同學，全都一哄而散了。高東茂老一個箭步衝了上來，揮出一記沉重的掌摑，

¹²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318-320。

¹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323-324。

¹⁴ 一方面是理想著女兒能下來，而現實是女兒死了；一方面是想像中的理性原則，對應現實中的感性行為。

準確地甩在我的右臉上。

「還沒有到社會上去，就學會欺負窮人麼？」

高東茂老師怒聲說。¹⁵

在該段敘事裡，體現了高東茂對於分班制度、貧富問題、教育的方式與型態都有想法，他甚至會直接以言教的方式分享給他那些放牛班的學生，這樣的高東茂顯然是有「敵人」的。然而他所打的孩子阿助其實並不是那所謂的敵人，如此一來此處的「拉扯」其實不是藉由「高東茂 vs 他者」來呈現，反倒是藉由高東茂自身的言與行之間因為價值的本位而產生的偏差，呈現拉扯。例如反對「分班」的高東茂，教訓阿助的第一句話就是對於貧富、階級的分別，可見在其意識中是存在分別的。或是教育學生一向以愛與關懷的他，看見「厭惡的場景」時卻是以「暴力」對待對方。然而這些「矛盾」並非一種成形的定論，而是一種對人物的立體塑造：

「我們都不要讓別人教你們從小就分別彼此，彼此仇恨，」高東茂老師說，「啊，彼此……」

……

寒假結束以後，回到學校，卻不見了高東茂老師。「看牛仔班」換了一個脾氣暴躁的女老師。曾益順被撤去了級長的職務，又開始恢復打架、鬧事和逃學的舊態。但唯獨在小徑上經高東茂老師恢復起來的兩個少年的友情，卻從此不曾再鬆動過。¹⁶

理想以一種具體的話語展現，並且呼應人物在前文中表現的價值取向。這樣的設計方式，依然不出社會型文本慣常的結構模式，當理想出現，對立於它的現實也會隨之而出、形成對比：

而那年的夏天，我考取了台北的C中初中部。這以後的一年中，我逐漸從大人的口中知道了逃離山洞的高東茂老師，不久就被捕獲了。並且又在其後不久，有人在台北車站的一個告示上，在一排都被重重地用朱紅的墨勾畫過的名字中，找到「高東茂」三個字……

¹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六）（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40-42。

¹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六），頁43。

至於曾益順，則自從在鈴鐺花下的一別，三十多年來，一直都沒有再遇見過……¹⁷

在文本中，理想的破滅源自於高東茂這一人物的身死——他預想藉由少年的友誼打破階級之分別，然而兩個少年最終目睹了老師的破敗與消失，不再維持友誼、相忘江湖¹⁸，由此成立了「理想 vs 現實」的對立結構。

社會型文本採用了含範很大的「社會」一詞，然而其中的表現範圍其實很小，只有一個人或一群人的一時一地。它們的篇幅是小的、地域是小的，從而整個表現出的故事也是短小的——但是從內容進行，真正小的是人物本身。這些人物或有理想、有學識甚至也可以是非常專業的人，然而面對之於他們而言的外部環境¹⁹，那些學識、專業與理想是無用的，在困境之前他們都是無助或無能的，是以呈現出一種孤獨、或是虛無的人物狀態。關於這點，趙剛亦有發表過意見：

這個「有趣」使人聞之愴然，是極其辛酸的假語反言，讓我們理解到，「虛無者」必然是那個時代的「理想者」的另一面。唯其真信而又知其不可行，方有虛無。虛無是真信的受挫狀態，而非沒有信仰的空虛狀態。²⁰

該段針對〈我的弟弟康雄〉中，康雄的所謂虛無主義的真相。然而這種真相的評價，放諸社會型文本中的主要人物，難有其不成立者。正是因為人物之小，所以只能將衝突與對立扼殺，留在人物自身的內部活動當中。是以這種文本的對立結構，往往呈現出「理想 vs 現實」的共同樣貌。

二、政治型文本的對立結構

陳映真小說文本當中「政治人物」並不少見，其中不乏在其他章節中曾經提及的例子，如〈忠孝公園〉中的馬正濤或是〈文書〉當中的安某這樣，都屬

¹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六），頁70-71。

¹⁸ 孩子並不是因為什麼爭吵或衝突而分離，是因為高老師消失了，阿順不再擁有去學校的理由。文本以事件作為次動機引發下一個事件，最終方完成了這種「沒有衝突的對立」。

¹⁹ 文本當中描寫的社會，在這樣的環境正是本節當中與主要人物對立的對象。

²⁰ 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臺北：聯經，2011年9月），頁50。

於代表統治階級權力的情治人員。這證明了「政治型」定義於陳映真小說文本中的存在，而〈加略人猶大的故事〉中的猶大，便是具備這樣性質的人物。〈加略人猶大的故事〉中，描述在《聖經·福音書》當中背叛耶穌的門徒猶大，因為其政治理想加入了耶穌的行伍，關於這種理想，文本中有詳細的描寫：

他對復國運動有不亞於他們的熱情，但是他那某一種形式的世界主義卻怎樣也不容於奮銳黨人那種偏狹的選民思想了……

「羅馬人的擔子，羅馬人的軛一旦除去又如何呢？因你們將替代他們成為全以色列人的擔子和軛。」年輕的猶大說著，彷彿激怒起來：「你們一心想除去那逼迫你們的，為的是想奪回權柄好去逼迫自己的百姓嗎？」……

「憐恤？千萬不是的！」猶大憤然打斷了他的話：「你們配去憐恤他們嗎？那供應著你們從容為以色列的首領的，不正是日日辛勞卻不得溫飽的他們嗎？主人倒受憐恤，這當是律法的正義嗎？況且——」……「況且，正如我們所說，一切的權柄源自耶和華，那麼羅馬人的權柄——她的權柄如今遍布世界——又源於誰呢？」²¹

顯然，執著於「選民」概念的猶太教是宗教，代表了保守與封建。而猶大的理念是對立於此的，他所訴求的是奴隸階層的「革命」²²，而並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復國」。也就是「將神的愛分享給世界」。顯然宗教本身不是他的終極追求，推翻政權、反階級壓迫的政治訴求是他所理想的。這種想法不僅止於羅馬人，連保守的猶太教也不見容，所以他淡出這個圈子，與祭司之女隱居異鄉，直到他遇見耶穌，這種理念又得復燃。然而他的另外一個面向——政治野心家的特質卻逐漸浮現：

自從那次榮耀的進城之後，猶大對耶穌的失望，使他終日感到噬心的痛苦。他已經明白耶穌真的不對世上的權柄和榮耀抱有野心。但另一方面猶大卻發現了以色列人對耶穌絕對無可取代的愛戴……

²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23-125。

²² 在文本當中描述猶大具備一種「世界主義」，其概念與後來基督教對於上帝是否「只是猶太人的上帝」一問是相同的。這種概念否定了猶太人的「選民說」。選民說來自猶太教經典對上的與猶太人之間關係的界定。該說認為猶太人是上帝選擇的臣民，上帝的看護與承諾指限於猶太人的社群。

.....

每次聽著耶穌預言自己的命運時，他總是忿忿地這樣想著。直到有一天一個黑暗的意念湧上他的心，使他終夜不能成眠。他想既然耶穌要死，為何不佈置要他死在羅馬人的手中，激怒那些深愛著優蘇的群眾，叫奮銳黨人起來領導推翻羅馬人的運動呢？這一剎那的意念使他興奮了，他不由自主地計畫著細節和估計著後果。猶大的心又熱烈地燃燒起來。²³

這樣的對立塑造，在其他的陳映真小說文本當中亦較為罕見。因為就算是將衝突內部化，衝突的兩個方面也會有相當明顯的區別。而此處的猶大敵意向外，不斷以對外部局勢的算計，試圖使自己的理想可以達成。是以，實際而言發生在文本當中的對立，依舊是現實與理想，然而因為文本中政治人物的活動較具備明確的走向，這種對立也能以更明確的詞彙命名：

第二天早上，羅馬巡撫彼拉多的法庭前，集合了全耶路撒冷並周圍諸城的人，一個震天的浪潮湧著：

「釘他十字架！」

.....

「除掉這個人！」

.....

猶大遠遠地望著，在恐怖之中癡呆著。這些瘋狂地喊著處死耶穌的人眾，不正就是七日前以王稱頌著他的那些人嗎？

.....

現在他們要他死去，要一個曾一度為他們所深愛的人死去。猶大像死屍一般青蒼起來。他聽見一個更黑暗而且凶張的呼嘯聲。耶穌的磔刑已定。猶大的計畫完全覆滅了，現在他永遠不是一個以色列的志士了，他只是個卑鄙地出賣了師長的門徒。²⁴

猶大對過去對立於他的祭司、法利賽人妥協，並且完全忘記自身理念當中的那種大同性質，與現今的合作者那種封閉、保守——他最終的行動滿足了保守者的願望，而他的希望斷然沒有實現。這兩種願望的衝突，便是文本的表層對

²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39-140。

²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42。

立，是為「控制 vs 反控制」²⁵的對立結構。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在人物塑造上的「逆向成長」性質，表現了一場「屠龍者最終成為龍」的（追逐權力之）悲劇。而在這個前提下，〈某一個日午〉亦呈現這樣的悲劇。它的人物極其簡單，一個過世的兒子、兒子的愛人、管家與一名姓房的處長。而其中較為立體，其實只有房處長這一主要人物：

房先生收起菸斗，把絲娟方方正正地疊成方塊。他的心愁慘得不堪了……他的大半生涯裡，一直便是這樣孤獨的呵……妻卻只留給他一個無眉目的空臉……然而她們留給他的卻剩留幾種模糊的口音和不同牌子的香水氣味罷了……他想著兒子，這個與他共度二十五年歲月的兒子，如今除了他蹣跚地走出大門的姿態，以及遠遠地注視著車子裡的自己的那種犬儒式的神情，其餘的便只剩得一片蒼蒼的空茫了。²⁶

這種失落狀態下的人物內部描寫，很明確地展現這位房處長直到如今的生活之空虛。這種空虛對比著他的華房、美車以及在政治當中的高地位，本身即帶有一種不言自明的強化。然而此段描述當中的對比，除了呈現這樣的空虛感受，也同時釋放出一些懸念，好比為何一介處長的生活空虛自此、以及為何孩子會以那種犬儒式的眼神看他——這些疑問在後文的信件中得到解釋：

房先生茫然地翻著，漣漣地淌著淚。他彷彿聽見兒子的聲音在信上說：讀完了它們，我才認識了：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幾年的生涯，都不過是那種您們那時代所惡罵的腐臭的蟲豸……我自己便是那欺罔的本身……我崇拜您，但也在那一瞬間深深地輕蔑著您，更輕蔑著我自己……一張發黃的照片飄落……看著自己蓄著列寧式的鬍子的臉，房先生便自然地想到兒子的也是蓄了鬍子的仰面的死臉。那麼久以前的事；那是多麼遙遠的一個小亭子間裡的事了。²⁷

兒子受房處長青年時期的思想與活動影響，而這裡將其內容模糊化，只留下批判性的詞彙，使理解可以朝向左派對階級、官僚的批判前進。而此段的對比設

²⁵ 此處的控制不是指對個體的操控，而是體制本質。保守者所希冀的是藉由封建的階級結構控制社會狀態；而進步主義者則希冀人能夠從這種狀態中解放出來，是為反控制。

²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二），頁69-70。

²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二），頁72-73。

計亦是明瞭的，用青年時的「小亭子」對比中年以後的「大房子」，從物質的豐沛指向理念的消散。如此看來，房先生的早年與他的今日是完全對立的。從少時渴望的覺醒、解放，對比而今的受體制豢養而在人的情感、記憶上幾乎一無所有，形成「控制（豢養）vs 反控制（解放）」的對立結構。

1987年發表的〈趙南棟〉，從主要人物處境上，葉春美與趙氏夫婦所受的政治迫害與〈鈴鐺花〉中的高東茂相同；從政治立場的傾向上，這些受政治迫害的人與〈加略人猶大的故事〉中的猶大站在相似的立場；而在對立的形塑上，則與〈某一個日午〉中的兩代人之對比相同。

「到底寫著什麼，有那麼多的話說啊！」

有一次，宋大姊一邊為小芭樂換下尿布，一邊促狹地這樣逼問葉春美。

……葉春美再也沒有像當時那麼用功過……

……

「慎哲桑叫我把這送給你。」他說。

……破舊的《辯證唯物論之哲學》。

……把她以為理解了，卻毫無自信的部分，寫在長長的信上，寄去給慎哲大哥。但除了書本上那些，她偶爾也寫業壓在春天的溪流上遠遠地滑游的景致。哲慎大哥回信的時候，有一次，就這樣寫過：

「較乎哲學，你看來是比較傾向文學吧。能把黃昏的溪畔，寫得那麼樣地安靜，我以為是不容易的。不過，要當勤勞者的文學家，還是需要哲學的呢……」²⁸

從人物關係看來，一種相似的邏輯干涉這些人物的境遇——這種邏輯下，這群坐政治牢人皆富有強烈的情感²⁹，甚至於他們坐牢的原因未必是因為政治意向的緣故，有可能只是因著愛情或者婚姻的連帶關係，理念的因素反而次之。所以，看似是一群政治意向，不見容於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政府的人物之政治驚悚故事，實際上卻是從政治意向的主題入手，而在人物的情感關係造成拉扯：

「可是，蓉萱，你一直沒告訴我一件事。」趙慶雲深鎖著眉宇說，「你找

²⁸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九），頁239-240。

²⁹ 這一設計與國族對抗中，「有國族者」人物的感性表現有相同特性，皆設計其為感性、情緒豐沛的人物特質或狀態。

到黨，入了黨嗎？否則，為什麼……」

「你說：號子裡每有變動，你總是心緒不寧者數日。」宋蓉萱悠然地說，「苦難的中國。你寫著：昨晚有人因瘧疾死。死前慘呼，聲凝寒夜。」

「否則，為什麼判決下來，你竟是死刑！」趙慶雲激動地說，「我一人獨生，卻又無法照料孩子們。」

「孩子們。啊，我的小芭樂呢？」她說著……

……

現在趙慶雲看見張錫命對著病房門口指揮著……

……趙慶雲想著，因為張錫命溫柔的，深怕吵了別人的安靜似的指揮手勢中，趙慶雲終竟聽見了豎笛流水似的獨奏，彷彿一片晨曦下的田園，旋轉流瀉而來，開始了〈勞動節〉交響曲的導引部分。³⁰

在這段敘述中，趙慶雲在病重的彌留裡，陷入了一種無時空邏輯的體驗。而這體驗表現出來的除了過往經歷的真相，也與亡妻進行了一段交融著對理想與真相的徬徨，以及對親情失落感到歉疚的對話。而這份情感關係的另一端，也就是他們不曾好好相處過的孩子趙南棟，則表現出對情感的無認同感與放蕩：

……兩個禮拜以後，他終於說服了自己，依址尋去。兒納進是一個風塵女子的公寓。

然而，一個叫做曼麗的女子告訴趙爾平，他的弟弟，才在兩天前，和一個他新認識的女子走了。

……

「……他走了。可是看見他經常說起的大兄，你不要見笑才好。覺得，像是我的親人……」她終於抬起頭來，歉然地笑著說，「才這樣地失了體態。真對不起喲。」

「對不起的，是我。」他說著，沉默了一會，「他怎麼說起我的呢？」曼麗說他的弟弟經常會提起自己的大兄，說是從小父母早亡，和這大兄相依為命，由大兄帶著他長大。「他說他大兄和藹慈愛，很疼惜他。」曼麗說，「大兄刻苦讀冊，事業很發展，不像他，沒出息。他這樣說。」³¹

³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九），頁303-304。

³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九），頁274-276。

在趙南棟的話語中，可以發現父母之於他的關係是斷裂的。趙南棟被哥哥發現與同性伴侶尋歡，而後離開了哥哥的家，開啟了不斷更換伴侶的生活。這種行為，與其父母因為夫妻的關係的連帶雙雙落入牢獄有極大的對比。自由與囹圄、左派與右派或是對愛人的有責任與無責任，³²都是趙南棟與他的父母表現出的對立是多方面的。然而，若仔細觀察這些對立面向，則能發現它們都出自人物與政治的直接關係——順從統治者的人，呈現了右派、自由與無責任；不順從統治者的人，則是左派、囹圄與有責任的。是以文本中的對立本質，是「順從統治 vs 不順從統治」的對立結構。

陳映真小說當中，像2000年發表的〈夜霧〉這樣描寫「政府機構當中的人物」者，極目去找也只有〈忠孝公園〉中的馬正濤可與其歸為同類。然而從人物的內部活動去看，他們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唯一相同的認知，就只有「畏罪」的意識而已。這種亦是從人物生活的某一天開始，逐漸使其往原先工作的立場之對立面逐漸移動：

我坐著想，悄悄問自己，我為什麼害怕，憂愁著些什麼……問我自己，鼓勵我自己慢慢想，這十年中，最早，什麼事讓我怕，讓我擔憂……
想著想著，想到了那幾年。

在那幾年，先是因為K市事件判了刑、在監執行的一些人，政府他們分批釋放、假釋了。當年我們在偵訊室裡費多大的功夫，之所以把一千人的口供，勉強按照上頭的需要，將人犯敲敲打打，湊成一個大政治陰謀事件，明裡暗裡，總有一個大前提：這些人一送到牢裡，起碼也要十年二十年，用無翻身之日。現在上頭怎麼就把這些當年他們要我們不擇手段送進去的人全放了，猛虎出了柙了。「壞人」、「國民黨特務」的帽子讓我戴一輩子，上頭的人卻去充開明「開明」、「民主」的好人。³³

在李的認知裡，過往掌握體制與國家機器的國民黨逐漸放權，以往的「業務」將要被指認為罪惡，是以罪疚的意識以及畏罪之心萌生。這樣複雜的人物情緒，使得對立的發現時常在敘事當中被混淆、誤導。人物狀態因無安全感而逐

³² 右派與左派的稱呼，最早起源至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國民議會中，保守黨坐在右邊、自由派坐在左邊，而後人們慣稱持保守主義意見者為「右派」；而持進步主義意見者則稱為「左派」。

³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八）（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20。

漸轉向病態：

我其實是早就料到的。那個把下巴刮得像早收的青澀的高麗菜似的醫生，東問西問，後來果然開始問我有沒有某種「被壓抑不宣的內疚」，又問我有什麼長期讓我焦慮不安和憂慮之事。

我當然斬釘截鐵地說沒有。「沒有。我能有什麼內疚，笑話，什麼叫罪意識？」我笑著問他。他狡黠地聳了聳穿白衣的肩膀，「隨便談談罷了。」他說。

「隨便談談」，其實就是偵訊方法中的一種，一但「談」出了破綻，那就緊咬不放，沒完沒了，這是我受過的專業訓練，他們豈能欺我？我在心中冷笑了。我自投了羅網，他們竟扮成了醫生，來套你口供了。我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嗎？

醫生說這一次先不開藥給我。他做對了。我怎麼會去吃他開的藥呢？但是護士帶我去量取我的身高、體重這些基本資料時，我看見醫生對月桃簡短地咬著耳朵說話。

我想，如果月桃都是……我就認了。我大不了受死就是了。³⁴

自這段敘事可以發現人物行動的矛盾性：身為一個人，他希望在困擾當中得到解放，所以投醫；而身為一個「國民黨特務」，他意識著自己的歉疚，以及這些過往可能帶給他不利的處境，所以他必須保守住內部的真相。然而這種在想像中涉及政治勢力的全面衝突，在文本中卻似乎只發生在李清皓一人的內部當中，與其他人並無關係：

和邱月桃通了電話以後的次日，丁士魁透過醫院人二部門一個相識的學生，到醫院約見了主治醫生。

「他表現為慮病、焦慮和憂悒。」醫師說。他說通常這些精神症狀源於淺下意識的、病人的嚴重內疚和犯罪意識。醫生翻著李清皓的病歷說，在治療上，最好能配合心理治療才好。「我們試過了，希望他逐漸把他的內疚透露出來。」醫生嘆息了。「但他守口如瓶，什麼也不說。」醫生說。

……

³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八），頁341-342。

「他什麼也沒說了。」丁士魁說，舒了一口氣。

「守口如瓶」醫生說。³⁵

醫生與丁士魁所說的「守口如瓶」顯然在意指上有所不同。對於醫生來說，守口如瓶的行為是阻礙治療，使得醫者無法真正了病源（真相）；對於丁士魁來說，李清皓的顧慮是對事態以及職業的謹慎，真相被任何外人得知都可能造成危害。不難發現，這兩個人物的在這一事件中呈現的態度，正是將原先李清皓內部衝突中的兩端，從外部予以個別表現。而這對立，是一個具有普通意義、良知與對幸福的渴望之人，與國家體制、情治組織的利益的對抗，是為「控制 vs 解放」的對立結構。

綜合前述，在本節針對政治型文本進行的對立結構討論中，可以發現無論文本採用什麼樣的人物情節，人物始終不會與另一個人物形成真正的對立。在〈趙南棟〉當中，人物是相互疏遠的，不是藉由互動發生對立，而是因為文本敘事將他們分別描述，所以能夠進行比較。而且人物的狀態始終無關乎另一個人物，影響主要人物的必然是環境，或更直白的說是政治體制所造成的狀態。所以即便舉例的文本間，因為主題、表現方式這些個別差異是存在的，對立的兩方卻始終是人與體制，是受控制與不受控制，這是政治型文本在表現上的共同原則。

第二節 陳映真小說的批判意識

上一節當中，本文分別針對兩種類型的小說文本進行對立結構之考察。在討論過程裡，結構原則與其共性向「內部理想與外部現實」以及「人的不受控制與體制的控制」這兩個方向呈現，而可以發現它們都是「人與環境³⁶」的對立。在這樣的對立當中，比起其他以人物對立人物、群體對立群體的文本，並不是那麼對稱，而這種敘事的不對稱，其實正是內部價值與意識的突破口。在這樣設計下，主要人物的內部描寫在整體當中的比例增加了，而價值的衝突會更其明確的被表現，而且直接具有對他者的指向性。本文將在下列兩個小節當中，繼續依「社會型文本」、「政治型文本」兩類，針對價值在文本中的表現，以及它們的指向性，分析其的批判意識，以及衍伸出的世界觀。

³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八），頁350。

³⁶ 這種環境並非討論自然生態的環境，而是指社會的兩個成分：社群與國家體制。社群指得是以複數人組成的生活環境；體制指得是國家帶來的政治制度及其表現。

一、社會型文本的批判意識

在〈故鄉〉當中，本文的視角與敘事者皆是由勝雄擔任，然而這個以個體內部情緒作為敘事者動機的文本，卻幾乎對敘事者勝雄本身毫無表現。而對其觀察以後，可以發現文本更多表現的顯然是勝雄的哥哥而非勝雄。勝雄視角的設立，是因為他「最適合當哥哥的旁觀者」，並且同時對哥哥的外部行為與勝雄的內部活動進行描寫，將兩者組合為一種富有理想的人：

我崇拜他，我的哥哥。即使現在，對於開著賭窟，並且娶了一個娼妓的賭婦的我的哥哥，我的崇拜只有相反地因著我的受了滿不是那麼一回事的大學訓練，而有增無已的。哥哥自日本歸國的時候，我才是個甫上初中的小子。那個時候，在機場看到的我的哥哥，高大、強壯，的確很英偉的，在深冬時節的空氣中走下飛機。那個時候，以至於後一段很久的時間之中，我都迷惑的不能分辨他和父親的聲音和腳步的音響。那個時候，雖說父親的生意縮小了，而父親卻整日地微笑著。³⁷

敘事的勝雄在精神上認同他的兄長，這種認同本身就帶有價值的選擇，只是敘事者的價值認同不一定等同於隱含作者的價值傾向。是以文本敘事當中，人物的內部價值早已先行顯露：

哥哥帶回來的，除了一箱箱的書，便是他的基督教信仰……自然，不到兩個星期，全家受了洗。以後的時光，全鎮的人都用異樣的眼色看著我們一家，在禮拜天早上走向通往教堂的街道去。過了不久，哥哥便在焦炭廠裡做著保健醫師。這便很使父親失望了。全鎮的人都在議論著：開業醫師是怎麼樣高尚而且賺錢的事，而某人從日本學成回來的兒子，竟是怎麼樣的想法呢？但是我的哥哥卻是熱心地生活著……³⁸

哥哥的是基督教式的價值觀，具體而言則可以在引文中看見，以一種對勞動階級的生命保障做出奉獻，可以看到其價值是關懷勞動者的。這解釋了勝雄理想

³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58-59。

³⁸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59。

的故鄉之樣貌，其實就是他曾經歷過的，家庭圓滿、哥哥因為實踐著自己的價值而充滿熱情的生活。所以，在這樣的設計下，實際上兩個人物的理想是重疊的。而與這種理想對立的價值抑是顯而易見的對功利、金錢與道德之追求：

……「我聽見他說起過。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你們兄弟長得真像。」

……

「你哥哥都說過，」伊說，聲音滿是悽惶的，「其實你不要棄嫌他。」

「沒有……」我搶著說。

「他是個好人，」伊說，「他或許不記得——其實我到後來才知道。他在焦炭廠的時候，救活了我爸爸。」³⁹

哥哥在家族的生意破敗以後，整理、償還了債務。而當他的背後不再有家庭經濟上的支持，原先的理想就無法再繼續實踐。他墮入了功利社會當中離他的理想最遠的身分，一個非法賭場的經營者。而那些在勝雄敘述中曾以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們家的鎮民，又復以哥哥開賭場、娶妓女為道德瑕疵在閒談間批評之。然而，哥哥的情人在與勝雄的對話中，說出了與哥哥在一起的理由卻是「報恩」，而且是源自於哥哥過去在焦炭場對其父的救治。是以在外人眼中的妓女，卻依然是哥哥理想的見證者。這樣的設計，雖依然是不圓滿、墮落的表象，卻在情感上使勝雄與其價值不至絕望。而文本安排勝雄以理想的嶄露、現實的艱難與墮落中依然能見證理想的敘述他的哥哥，藉由對墮落的理想者之同情，呈現隱含作者對鎮民之冷漠、虛無的功利價值之批判意識。

〈山村的教師〉對於吳錦祥以外的人事物之描寫，顯然是比〈故鄉〉中對鎮民的隻字片語來得豐富、完整。不同於勝雄對鎮民的明確敵意，主要人物吳錦祥在整個敘事過程都不曾對立於鄉人。然而那種對於理想者的異類處境塑造，以及他們命運一般的不受待見、受非議上，卻與勝雄的哥哥如出一轍：

開學的時候，看著時機個黝黑的學童，吳錦翔感到自己的無可說明的感動。他愛他們……或許，這樣的感情應不單只是愛而已，他覺得自己甚至是在尊敬這些小小的農民的兒女們……務要使他們對自己負起改造的責任。然而此刻，在這一群瞪著死板的眼睛的無生氣的學童之前，他感到無法用他們的語言說明他的善意和誠懇了……他甚至走下講台，溫

³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63。

和的同他們談話，他的眼睛燃燒著，然而學童們依舊是侷促而且無生氣的。⁴⁰

他以社會主義者、同時也是民族主義者的立場，視他的學生們為勞動者之子，是其價值中喜好的階級群體。然而，他的這種因為書本、理論而來的熱情，卻與這些最真實的勞動者之子們失去了真實的交集——鄉村勞動者的孩子就是下一代的勞動者，在那些長時間的農忙勞碌裡，他們終不可能朝著書本中的學問前進多少。所以，因為這種對知識與政治改革在熱情上的差距，吳錦翔的這種改革失敗幾乎是命定的：

逐漸地，過了三十歲的改革者吳錦翔墮落了。他如今只是一個懶惰的有良心的人；他絕不再次苦讀到深夜如少年時一般，因為次日的精神不振對於學生是一種損失。每學期剩下的簿本一定賣掉以添購體育用具；他從沒有讓學生打掃他自己的房子或利用他們的勞力為他自己的廚房蓄水；他為貧苦的學生出旅費參加遠足。凡此種種，當然少不得有人嘲笑他的愚誠的。但這些行為對於吳錦翔畢竟不只是一種道德或良心而已，而是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後的遺跡。⁴¹

理想者又一次落入世俗、現實之中委身。這種從充滿關懷與熱情的異類，轉變為一個「好人」的過程，是對社會環境不可忽略的真實因素之妥協。如若文本敘事在此完結，那麼後續的對立其實是不會成立的，因為主要人物的吳錦翔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轉變為「務實」的人物。文本塑造對立的方法，是在後續對村人「視戰爭為喜事」⁴²，卻又同時不能同理吳錦翔戰爭經驗的他者化描寫上：

吳錦翔吃過人肉人心的故事，立刻傳遍了山村。從此以後，吳錦翔到處遇見異樣的眼色。學生們談論著；婦女們在他的背後竊竊耳語；課堂上的學童都用死屍一般的眼睛盯著他。他不住地冒著汗。學生的頭顱顯得那麼細小。那些好奇的眼睛使他想起婆羅洲土女的驚嚇的眼神……

他的虛弱不住地增加著。南方的記憶；袍澤的血和屍體，以及心肌叮叮

⁴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47。

⁴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50。

⁴² 在〈鄉村的教師〉與〈歸鄉〉當中，都出現關於台灣人張燈結綵地送自家子弟去當兵的描寫。

咚咚的聲音，不住地在他的幻覺中盤旋起來，而且越來越尖銳了……根福嫂發現他的兒子竟死在床上……⁴³

村人對「上戰場」抱有英勇、享受政府福利的想像，但是卻對吳錦祥真實的戰爭經歷予以異樣眼光，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鄉人的無知與矛盾。而若從整個敘事脈絡上，矛盾進階為一種荒謬：最一開始吳錦翔以對勞動者的崇敬，以一腔熱血去教育鄉人的孩子；感受改革滯礙，從而放棄理想，以對勞動的體諒作為教師的守則……這樣的吳錦翔總是主動去理解、同理鄉人，然而鄉人對他的回報卻是視其為異類，並在無知中傷害吳錦翔與自己的孩子。這樣近乎醜惡的對比描寫，呈現出一種針對麻木、盲從且功利的社會現象⁴⁴之批判意識。

從價值對立的塑造而言，〈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無疑是相當特殊的文本。在其敘事當中，沒有一個與主要人物對立的階級或族類。一如魏醫生的告白那樣，所有的在場者皆是他的「同族」。是以敘事中的轉折，無非就是魏醫生自己提及的那個事件，以及事件中的另一個階級之處境。而與其對立的，則是同族的言行呈現之內涵：

「蓋了一棟房子，最近。」許忻細聲說。

「哦。」陳哲說。

「一小平房。」

……

「結婚了五年，第一次獨立起來住的。」

……

……伊想：竟對一個獨身的男人說這些啊。伊和許忻一直不互相明說的希望有獨立門戶的一天，直到公公為了叫許忻出面代理一家美國農藥商而另外開了店鋪，公公才說：

「三十四、五了。好好的做給我看看！」

許忻依然只是笑笑。公公說：

「大學也讓你念了。想想我校學畢業的也撐了這幾家店。」

菊子也笑著。但那夜伊在丈夫的枕邊細聲地說：

⁴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54。

⁴⁴ 這樣的表現不能稱其為主義，而是一種無價值、無主張的狀態，是以稱其為現象而非價值或主義。

「許炘，就做給爸看罷。」

伊哭了起來。許炘慌了。他說：

「我要做的，我要做的。」⁴⁵

此段對話與敘事當下發生的事件毫無關聯，卻是許炘、陳哲等與魏醫生同族的證明——在「一個生命即將逝去」的語境當中，討論著與生命本身毫無相干的事情，而這件事情的本質是布爾喬亞對其產業不能做大的焦慮。這種言談中忽略人而注重資本、慾望或享受的對比，展現了與魏醫生告白中的自己一樣的狀態：

那些日子啊！裝在很精美的玻璃杯子裡的酒；似乎只有醫生一個人懂得的室內音樂；戰前社交界流行的令人迷亂的探戈舞曲……。魏醫生總是靜靜地喝著酒然後就和京子婆娑地跳著舞。許炘夫婦幾乎愛好魏醫生家的每一樣的東西；魚在水裡的快樂大約也便是這樣的罷……

「讓京子教你跳罷。」醫生說。

陳哲脹紅了酒酣的臉。他衷心地愛著醫生的那種精緻的文化人的氣味；然而他卻以全部的聰明掩藏著他對京子夫人的如熾的戀情。所以醫生又和京子跳起舞的時候，陳哲一任那種被友愛、激情和適度的嫉妒加上酒的火熱，焚燒得使他沉溺在一種心的陣疼裡。⁴⁶

此處可以藉由內部描寫看見陳哲的真相，而這種真相也是對於「擁有」的慾望，只是這樣的慾望從許炘的資本與物質，轉變為對性與異性。這樣的精神追求導致他們忽略了生命本身，與少女小淳的寡欲、關懷他人形成對比。只有當生命被剝奪的急迫迫近他們的同族時，才讓他們想起關切生命這件事：

「請好起來罷，」京子說：「我們都等著同你一塊兒重新生活呢。對罷，爸爸？」

「嗯。」魏醫生說：「雖然還不曉得怎樣過新的生活，但總是要像一個人那樣地生活著。」

「是的，像一個人那個地生活著。」許炘說。

⁴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310-311。

⁴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315-316。

「只要小淳留下來。請好起來。請好起來罷。」菊子說。

……

「拋棄那些腐敗的、無希望的、有罪的生活……只要小淳同我們留下來。」⁴⁷

這種對生命意義的再發現，以及原先就對生命很關注的少女小淳，都不能被視為社會主義者的價值，而頂多只能是指關注資本、財產與慾望者的對立面，是為關注生命者。在文本當中，設計這群鄉鎮中的布爾喬亞經歷一場對生命意義再發現的對話，然而最終這些祈禱少女小淳得以活著的願望並沒有實現，敘事最後描寫小淳死亡、太陽升起，這樣的安排使太陽作為一個對生命的比喻，實現了一種跨越階級的同等宿命⁴⁸，呈現出對於漠視生命、追求慾望的虛無之批判意識。

在〈鈴鐺花〉當中，會發現人物與另一個人物的對立是斷然難以被想像的。這是因為文本的敘事安排異於其他陳映真小說，採用了外於衝突的兩個人物之描寫。而在文本當中本身即帶有價值傾向的人物高東茂，在文本中找不到另外一個明確的人物是與之對立的，「人與環境」對立的共性在該文本當中被發揮到極大。在描寫方式較為隱晦的文本裡，傳遞意義之符號也轉向隱喻的手法：

第一天逃學，實在是為了太想看看曾益順飼養的小青蛇，才跟阿順到這廢窯來的。

那一天，曾益順拉著我的手走進了廢窯。我終於看見了養在一個肚子上裂開了一條細縫的大水缸裡的，暗綠色的小蛇。曾益順得意地從另一個養著野蛙的水缸裡，抓出一隻隻灰色或者土色的小蛙，丟到蛇缸裡。那原本不住地慌忙著試圖把頭伸出缸外，卻總是不到水缸的半腰就滑落缸底的小蛇，在我還來不及看清楚的時間裡，就把那不住跳動的泥色的青蛙，含在嘴中，只讓兩條掙扎著滑動的蛙腿露在嘴外。⁴⁹

⁴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323。

⁴⁸ 在這樣的安排下，無關乎信仰或價值的選擇，布爾喬亞之女與勞動階級的工人一樣活過，也一樣死了，形成一種生死的公平。

⁴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六）（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27。

這一是看似直觀針對童真的描寫，實際上確立了一種對城鎮的食物鏈的描述：在一個黑暗、封閉的小地方，有蛇與蛙共存著。而有一隻手會蛙餵食給蛇，而這樣的環境是阿順創造的。阿順是否完全理解發生在鶯鎮當中的事情，從文本內容來看是沒有的，而隱喻的傳達亦不需要人物全知全能。在整個文本當中，雖然敘事者是阿助，然而卻時常出現阿順對事物的理解、說出的話語超越少年阿助理解能力的現象：

……但是頭一次，我看到與我同年齡的他的雞雞，竟發育得差不多像個大人了，在他的快跑中，很是纍纍地搖動著，使我驚異得目瞪口呆。

……突然若有所思地，背過身子去穿起褲子。

「這些花生，夠我們吃個飽了。」他說。

我驚魂甫定，才喃喃地說：

「阿順，不想你已變了大人了。」⁵⁰

大人一詞從表層意義看來，指的是阿順的性徵。然而綜合語境，大人一詞的意義就發生了改變，可以是有價值的或是接近真相者。在兩個孩子的對話，與阿助作為敘事者的內部憶想當中，大人的行為總是被省略動機與個性，而直接展示出結果，然而若將行為視作符碼，則意義依然能夠被解讀：

……金先生之不同，在於他是唯一的單身來到鶯鎮的外省人。他長得高大，頭髮總是光光鮮鮮地上著髮油……即使是現在，我也不清楚當時他做的什麼行業，但覺得他似乎頗有些勢力，連鎮長、派出所裡的人，都對他恭恭敬敬。

……

……四年前剛從上海回鄉來的金先生的房東余義德，便是一項極力聲言絕不租房子給外省人的人。但這回他卻不但租了房子給了金先生，卻連一個二十歲的女兒也嫁給了他。

「那房東，在上海的時候，是替日本做事的。」我回憶著大人們的耳語說，「說是在上海，全家住在日本人的住區，講的全是日本話，不許兒女說一句中國話。」

「為什麼哩？」

⁵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六），頁53。

「不知道。」我說，「大人們，都是這樣說啊。」
……房東的余義德先生不久就當上了鎮公所的戶政課長，並且開始在官式的場合，以帶著土音的上海話，談著三民主義，談著建設中國之類的事了。⁵¹

在對話當中，這些鎮民的畢恭畢敬、婚嫁與公務員的升遷，顯然是在講述一個小市鎮內部的權力關係。雖然這樣的描述並不能整體而有系統的表現這種關係，卻可以大致看出其輪廓：一個掌權者、一個拍馬的心腹，與其他被統治者。這樣的社群關係，若視為文本最初蛇與蛙之隱喻，則能夠推測出高東茂處在什麼樣的立場，又為何在最後被槍決。然而這些事情，沒有一個「大人」敢說出口：

那一年，整個鷹鎮出奇的沉悒，連大人們也顯得沉默而畏懼。即使平時喜歡和農會總幹事許有義、謝樵醫院的「謝先生」、秋季窯廠的邱信忠這些地方「有志」，集中到被同學們的母親們齊聲咒罵的「秀鳳酒樓」去喝酒打牌的我的父親，也只待在家裡，默默地吃飯、默默地到台北上班。⁵²

沉默這一描述，發生在蛙意象上屬於反常的矛盾。蛙在自然環境下的表現，就是發出叫聲，然而此處受統治的青蛙們，在高東茂被「吃了」以後卻沒也一個敢討論。在整個文本的情節當中，只有高東茂一人發出了聲音，這種聲音並不是敘事層面上的意義，而是在價值判斷上提出了其不滿與批判。文本安排順應自然、發出聲音者的死亡，透漏隱含作者對於噤聲的蛙（安靜的共犯）與吃蛙的蛇（掌權者）之批判意識。

綜前所述，本小節在明確表層對立的前提下，對其內部的價值與安排進行考察。在理念與現實的衝突中，價值表現分為兩種，主要人物的價值與環境群體中的價值或無價值。一般而言受批判之價值在文本中呈現為他者化的描寫，這樣的描寫使得人物或群體的表現以負面的片面居多，並以此為表現原則。這些批判的對象依照人物對立的環境因素，表現為功利、布爾喬亞與集權共犯結構，這種環境因素指涉為資本主義社會之特徵，即便在各樣的生產型態中、文化差異下可能存在微小區別，整體而言卻鎖定其共性作為表現對象。這由這些

⁵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六），頁60-61。

⁵²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六），頁43。

具資本主義特徵的環境之批判表現，得以觀察出一種社會主義的世界觀。這樣的世界觀對於底層的無產、無權以及無依者抱有關懷的立場，是以對立於文本中的那些否定對象。

二、政治型文本的批判意識

人與環境的對抗發生在政治型文本當中，則會使這種環境的塑造是受政治人物（掌權者、公務員或是社會運動者）的行動影響或構成。在社會型文本裡，亦會出現主題上與政治型文本相近的例子，例如受政治迫害的人物處境，最鮮明的便是像高東茂這樣的人物。然而像高東茂這樣的人物，是難以將其稱為政治人物的一一他所對面對的環境與其說是國家，不如說就是鶯鎮的權力圈與其轄下的人民。這樣看來，他的處境更像是吳錦翔那樣，在一個範圍較小的社會環境裡，因為理想不見容於社群而被環境排斥了。

而單就分類而言，「社會型」與「政治型」的分類，本身就讓人物的身分意義優先於行動的被討論。如若從情節安排與表層結構的塑造來看，批判文本因著意圖與策略的相近，而看起來非常相似。實際上，所有敘事文本的結局，都可以在安排形成的脈絡中得到一種理解，只是在價值先行於行動⁵³的文本表現中，這種理解會變得極為容易一一例如猶大的理想從其屬性到政治意義，放入該文本的語境當中，則很容易能夠預測他將面臨的失敗：

……然而耶穌三番四次地漠視群眾的激情，實在使他不解。因此，經過竟日的奔波之後，猶大常常要在深夜臨睡的時候對自己詢問並答辯著：一一他有三種可能，要不是個瘋子，不然就是個有病的夢想家，再不然便真是他說的神之子了。

……

但是就在同時，猶大想起了那次五千人的宴會的場面；他觀察到耶穌是個喜好秩序的人；因為他將群眾分成五十至一百的小組。他命令門徒收拾狼藉的餅屑，足見在窮國中長大的耶穌是十分經濟而且實在的人。

一一那麼，就是神之子了。

猶大疲倦地嘲笑起來。睡意極濃，最後的詢問已經不屑去研究了。

⁵³ 文本當中的許多內部描寫，使人物的理念與想法之乘現，優先於他們在敘事中行動的呈現。

——還是一個夢想家罷！⁵⁴

猶大不斷的憶想耶穌為何不照著他期待的路線去走，這是他在耶穌的使徒團隊中不斷企圖引發社會運動後的動搖。在這動搖之中，他以三種可能去猜測耶穌的真相，這三種可能都指向對一個異端者會有的評價。而實際上，真正的異端其實是他自己，不論是羅馬政權、猶太教掌權者、以色列人民，甚至是耶穌，文本中從未出現與他持相同理念的人物。猶大的理念之所以容易理解，是因為敘事視角一直針對著猶大與他的內部進行描寫。而在持有理念前提下，猶大一直是以他的價值判斷作為認知其他事物的原則，這也包括了對耶穌的認知：

他就是懷著這樣火熱的心回到迦薩去，預備一些必要的行裝，做長久奔波的計畫。他的生命像一把火也似地燃燒了起來。

「我想我已經遇見了一個聰明的人，極聰明的人，」他不住地對自己說：「也許他正就是猶太人的希望；這世界的希望罷！」⁵⁵

是以，他的一切行為其實是對向自己，聚焦在自己的想法中。而當真實的情勢沒有照著他的預想前進，他的行為在文本中總是呈現「退讓」或是「退而求次」的模式。就是在這樣不斷退而求次的過程中，猶大的本質，從一個固執的理想者，轉變為算計的投機者：

但是，就在這一傾刻之際，猶大完全理解了一切耶穌關於天上樂土的教訓和他上連於天的權柄。他知道耶穌已經這樣贏得了他實現於人類歷史終期的王國，這王國包容了普世之民，他的來臨和宇宙的永世比起來就幾乎可以說已經來到人間了。他忽然明白：沒有那愛的王國，任何人所企劃的正義，都會迅速腐敗。他了解到他自己的正義的無何有之國在這更廣大更和樂的王國之前是何等的愚蠢而渺小，他的淚彷彿夏天的驟雨一般流滿了他蒼白無血的臉。⁵⁶

在文本內，能夠發現敘事藉由猶大的狀態，呈現出「失去理想、復得理想、又

⁵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36-137。

⁵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34。

⁵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一），頁143。

失去理想、再復得理想」的敘事結構。在行動當中，猶大因為理想不見容於奮銳黨人而隱居；因為見識到耶穌的言行而復出；苦於耶穌不願稱王而選擇背叛，利用其剩餘價值；最終在理解一切後發現自己違背了真正的信念，悻然自盡。而在最終使他理解一切的，是文本當中三個真相交集。真相之一，是耶穌之死在群眾中的反應，說明了以色列民並沒有真正愛戴、渴求耶穌並期望他為王。其二是將耶穌所說的教誨，從直觀的政治意義，提升到了哲學思想的層面之後，終於理解了教誨中「愛」的真諦。第三是理解了一與二之後，發現自己的所作所為不過是投機與計算而已。文本藉由大量對猶大的內部描寫，呈現出其對價值的自我辯證，最後幾乎是以其口直接對自身思想與行為做出批判，表現出隱含作者反對政治算計的批判意識。

在〈某一個日午〉當中，人物與他們所代表的意義藉由身分被明示，而不是藉由一定的篇幅行為體現意義，但這並不代表行為是不存在的。在該文本當中，人物的行為分為直接表現與間接表現，而這兩種表現又分別出自房處長與其子的愛人彩蓮。事實上，整個文本就是將一段時間、一個情節、一個事件在一個精而短的篇幅中表現出來：

兩人沉默了一段時間。房先生說：

「老喜。」

「是。」

「老喜，今天幾號了？——七號？」

「七號。七號，房書記官。」

「那麼便是今天要來的了。」

「……？」

「是恭行的信。死前寫好的，彩蓮轉寄了來的。老喜，你老實告訴我，他和彩蓮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彩蓮？——房處長！」

「彩蓮。就是走了沒多久的下女。彩蓮，可不是？」

「啊，啊啊！」老喜喫驚的說。

「信上說七號——今天要來。你馬上去給我提筆款去。」⁵⁷

事件由不在場的人物預言了。然而從這個事件之動機上的因果關係而言，無論

⁵⁷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二），頁71。

是彩蓮的懷孕或是可以寄信以換取金錢的方法，都是因恭行的行為而起。是以，以驅使或造就說明恭行在事件中的人物功能，更能解說這樣的因果設計。而彩蓮的到來，讓這樣的因果關係，轉變為代替其表現出深層價值的代理關係：

女子開始在這緘默的威脅裡，逐漸地膽怯起來。她說：

「我不多要。五千就好了……」

「……」

「五千就好了。我要拿掉這個孩子。我上班，不能要孩子……」

說著她便哭泣起來。很是樸質、很是凡俗地哭著，發著抖。

房先生終於站起來，對老喜說：「給她一萬，叫她以後不要再來。」

房先生沉重地坐在柔軟的沙發上。

「不，我想……」彩蓮說。

房先生看見她安寧地站立了起來，裡著裙裾。

「我想，錢，就不要了。」她說，「我要這孩子，拿掉他，多可憐。」他自語似地說，於是便走了。⁵⁸

房處長以一種打發的態度面對懷著身孕的彩蓮，這不僅是對曾經下人的鄙視，同時也是對生命的漠不關心，以一種冷靜的公關處理方式處理之。而對比的兒子恭行在信中所說的凡俗，彩蓮在兩句對話之間發生了改變，打消了拿掉孩子的想法。這樣的形象是相對片面的，以母性中同理心的發生，證明恭行所說的生命力，這便是恭行所嚮往的人性價值，是一種人道主義的價值觀：

初夏在四時許的日午中遊蕩著。他看到自己來台後在政黨圈中營建起來的世界；他底一向那樣堅固、那樣強大的世界，竟已這般無助地令人有想要嘔吐的感覺，而搖搖欲墜了。

文本安排恭行說明自己的死是來自對少年房先生的崇拜，而顯然這種被崇拜的內容並不見容於其成年以後參與的黨國政治。這些行為與內容闡述的意義，從外部事實到內部理念的發掘，都強烈否定現在的房先生，安排中明確呈現出對房先生的諷刺與懲罰，如此設計透露出隱含作者反對黨國高官漠視人道的批判

⁵⁸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二），頁74。

意識。

在整個〈趙南棟〉當中，出現了許多人物，在此繁多的人物當中，大部分的人物都是片面表現，或可以說是功能性相對單一。在涉及價值的傳遞上，陳映真小說文本有兩種主要形式：人物在議題中具備意識，自行講述或以行為呈現自己代表的價值；文本設計人物藉由情節關係、正反面形象以組合出一種價值存在的語境。後者而言，需要藉由更多的情境、話語與行動的疊加，方能完成意義的呈現，而〈趙南棟〉中受政治迫害者的價值，正是以這樣的方式表現：

——春美，小芭樂子的事，無論如何，就拜託你了……

……

「他們來的時候，小芭樂還懷在肚子裡。四個多月吧，才。老大平平，還傻呼呼地跟在我們後頭，想和我們一道上吉甫車哪。這兒有錢，肚子餓，買東西吃。回去吧，平平。他爸爸這樣說。把口袋裡的錢全掏給了平寶。吉甫車，就那麼著，把我們開走了嘛！」

在女監裡，宋大姊最愛講這一段，葉春美想著。可也好幾回，宋大姊一邊說，一邊笑呀，眼角上的淚，卻兀自簌簌地打她結實的臉頰上掛下來。

小芭樂有個名字，叫趙南棟，是宋大姊紀念孩子生在當時叫作「南所」的看守所押房，起的名字。⁵⁹

趙南棟之名，本身即是政治迫害者紀念信念之符碼。這種信念的傳遞或說印證方式，是母親對孩兒的愛與期許。然而與〈某一個日午〉相似的設計是，這一可能藉理念陳述，表現出明確價值的人物早已死亡——價值不能直接從他們的行動上被表現，而是藉由代理人傳達。宋大姊的代理人，以這託孤的橋段設定為葉春美，但是這也讓政治的信念在表現上轉變為親情的追求。而對立於有信念（或有情感）者的趙南棟，則是藉由其他人物的言談、回憶而側寫出他直接的無價值狀態：

「算了。可是莫莉跟趙南棟是一類的。他們按照自己的感官生活，」莫葳說，「我說不清，反正。怎麼說好呢？他們是讓身體帶著過的……」

⁵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九），頁227-228。

「……毫不以為羞恥地表現他們的欲求。他們用他們的眼睛，心意和行動，清楚明白地，一點也不會不好意思地說，我要，我要！」趙爾平想著他的弟弟阿南，這樣說，「你明白吧？」

……

……「其實呢，誰又不是？我們全是這樣。有時候，我在想：整個時代、整個社會，全失去了靈魂，人們只是任他們過分發達的官能帶著過日子，哈……」趙爾平說，「只不過是，我弟弟那樣的人，就是一點也不隱藏，一點也不覺得害羞，赤裸裸地告訴人：我要，我要！就是這樣……」⁶⁰

趙爾平作為文本表現趙南棟形象與行為的視角，足以說明趙南棟其人的特質。與他充滿意義的名字背道而馳，他的行為並不來自明確的價值、主義，反倒是由外部刺激引發的感官需求去行動。在趙爾平的回憶當中，這樣的行為表現為濫交、頻繁更換伴侶、喜好奢侈品等，透漏出消費主義對人慾望的不斷開發，與其永不滿足的性質：

她緩緩地走向前去……像是母親看見了自己的骨血……

「小芭樂，我的孩子，」她喃喃地說，「啊，宋大姊，老趙，我終於找著他了。」

她費力地扶著瘦弱、一身汗臭、神智不清的趙南棟，走向開在醫院牆邊的後門。

哦，宋大姊她愉快地想著，你不是要我照顧小芭樂嗎？畢竟，你讓我找到他了……

她在醫院的後門外，攔下一部計程車。她把趙南棟安頓在後座內側，等自己坐穩了，用力關上了車門。

「石碇仔。」她說。⁶¹

代理的母親於文本結尾終於找到他的孩子，滿足這種以情緒為訴求的情節關係。這樣的設計使得「趙南棟」符碼的意義，終於因為處境的轉換，而指向它

⁶⁰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九），頁297-298。

⁶¹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九），頁320-321。

原本的定義⁶²。然而這樣的結局設計，卻不是〈夜行貨車〉那樣滿足情緒需求的圓滿結局。這樣的結局，在整個敘事尾聲幾乎是控訴性的，從這段互動可以發現的控訴性設計有二：趙南棟的整個童年都缺乏父母的關愛與照顧，而在成年以後他的「代理母親」才終於出現，情感的缺憾始終存在；趙南棟的狀態是一個放情官能、縱慾過度而且受惡習侵蝕的樣貌。這兩者一方面控訴了政治迫害對生命剝奪而導致情感關係不能圓滿，另一方面則是呈現消費主義對人的摧殘，呈現出隱含作者針對政治體制之不自由，與消費主義毒害人身心的批判意識。

在陳映真小說當中，人物代表的價值未必然存在良善、美德的意義，甚至不一定可以稱其內涵為價值。這一點從〈夜霧〉中的李清皓之內部表現可以得到印證。李清皓的人物表現，無疑體現出一種近似真實人物的複雜與矛盾特性——他一方面表現自己曾經作為國家機器之一員的事實，然而他的利己渴望又指向一種凡人、無辜者的特性，這種特性並不是一個罪己者的單純開脫：

世上有一種天生正直的人，坐在靈堂裡的丁士魁這樣想著，天生的正直，但絕不是拿自己的正直處處去判斷別人，不肯饒人的那種正直。李清皓這人就是。丁士魁默默地凝視靈堂裡的遺像。想起了那年夏天，李清皓考過了關，來山莊報到受訓時，把鋼刷似的他的不馴的頭髮理成了平頭，站在他跟前微露門牙而笑的、對新的生涯充滿了熱情的年輕的臉龐。自己在這種機關過了大半輩子，應該早就看出李清皓不適合幹這行，他想著，竟而有一層悔恨，不覺嘆息了。⁶³

丁士魁的內部活動一方面陳述外人眼中的李清皓是何樣貌，另一方面表現了他自身的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下，他所做的工作並不是罪惡的，而是有些人不適合這個工作。他與李清皓間，有著一種人民與政府人員的意識差距：

丁士魁花了幾天的時間，讀完了那一大紙包的李清皓的日記。但丁士魁以為其實那又不能稱為日記……

……丁士魁想。李清皓這些東西，固然是扯不上多大的安全顧慮，但也

⁶² 從人物的真相而言，唯一能夠明確理解宋大姊取名意義的人物，就是曾與其一起經歷牢獄的葉春美。是以，當葉春美開始照顧趙南棟，這個名子的意義不再只是一個稱呼，而可以是宋大姊的託付、期許。

⁶³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八）（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06-307。

確實很不宜流落出去。丁士魁又赴花了幾天的時光，把這些資料細加整理，大量汰去不很相干的東西，思忖著要附上一個報告，呈到上面去。把汰除的燒了，把選出來的呈上去專卷研究存檔，這件事就結了。⁶⁴

李清皓的日記不成日記的原因，大抵是因為兩種價值衝突於他的內部，並且從兩個方向拉扯他安穩度日的利己需求：過去以維安為名的工作，以內疚的形式威脅他做為一個凡人的良知；內疚來源的真相威脅著他過平凡生活的資格。這看似是過去的政治維安經驗與今日平民身分的衝突，然而實際上卻是兩個政治勢力之衝突發生於一個人的內心之結果——與之相反的丁士魁，正是因為沒有意識到另外一個政治勢力，撼動自身權力與安危之可能。是以此處丁的麻木與冷靜，呈現情治單位掌權者的傲慢：

「打攪您睡午覺了。」電話裡說。

那是一個丁士魁最早期的學生，現在在政府中央的局級安全機關工作的許處長的電話。

……

「新政府了。」他說，「他們指定了我找幾個老同志商議商議……」

……

「丁老師，時代怎麼變，反共安全，任誰上台，都得靠我們。」

「那也是。」他壓抑著喜意，狀似平淡地說。當丁士魁掛了電話，這才發覺大雨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刷啦啦地打在落地窗外小院子裡的老樟樹上了。⁶⁵

文本藉由最終政黨輪替的事件，使李清皓恐懼的未來成真，而他對於其他情治人員的控訴，也在最後的結局中實現：「十幾、二十萬曾以『同志』稱呼過我的人，如今倒向他們的都倒向他們了，隱遁起來的全各自隱遁了。」⁶⁶這樣的事實走向，使得原先情治工作者的社會維穩價值，透露出它永遠為政治掌權者服務的本質，這種非價值性即為隱含作者之批判，是為反對執政者濫用國家機器的批判意識。

⁶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八），頁317。

⁶⁵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八），頁351-352。

⁶⁶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卷十八），頁350。

綜上所述，在針對政治型文本之批判意識的討論中，可以發現這些批判本身必然針對者政治人物或者政府，這樣的原則使意識的呈現永遠站在政治權力的對立面。然而，綜觀其中的表現而言，這些藉由文本設計、價值呈現導致的批判，從它的表現看來並不是以表現批判對象並予以懲罰的形式，而是在呈現了施迫受害者或被迫受害者在其內部的無價值與痛苦狀態，這使得表現手段實際上並沒有呈現什麼價值的對立，而是針對濫用公權力、權謀或是高度商品化的統治氛圍進行批判，這樣的性質是集權與資本主義的社會型態，是以這樣的傾向呈現出一種關懷人之處境的人道主義世界觀。這樣的世界觀，本位上是以對人的處境無差別的進行關懷，對應於文本中那些對人物不幸的描寫證明了這種世界觀關注人之幸福的特徵。



第五章 結論

陳映真作為一個小說家，從第一篇（〈麵攤〉）發表的1959年，到最後一篇（〈忠孝公園〉）的2001年，凡四十三年而僅有三十六篇，觀其數量平均一年未有一篇，並不能算是一個高產的創作者。然對於學界眾賢而言，以陳映真小說為對象，去探討社會母體、左派主體；或是針對死亡、跨國企業、白色恐怖、海峽與省籍問題等主題的討論，歷來所在多有。其原因在於，從內容上來看，陳映真小說的寫實與左傾實在是在同一時代，乃至下一個世代，與他本人的言、行、意識形態與地緣身分的整體組合，在文學與政治圈中都較為特殊。這樣的特質，使得許多研究者期望從小說內部尋得一個左派主體的陳映真之真相；又希望以其外部之講話、行為去尋得那些小說創作可能的透漏與真諦。

然而，真實的作者與他的一切講話、行為，並不會以一種「有聲附件」的形式與他曾經創作過的小說一起並存。當不以作為一個真實主體的陳映真為外部考量，只針對小說文本是否能夠發掘並分析有共性之意義？以此疑問作為一個討論的出發，本文欲探討陳映真小說文本中那少見的意義，而要以擱置陳映真斯人的前提去進行。在歷經觀察後，將尋求意義的方向依主題內容分成「階級」、「國族」與「批判」三個方面進行討論。在方法論上，除卻擱置一切外於小說文本的經驗、意識與其他因素，本文針對上面的三個方向的文本表現，以探究其中出現的對立，發現文本的結構。在這些塑成結構的對立中，理應能夠發現對立的兩方所延伸而出的更深層意義。這樣的（至少兩個）意義在小說中出現並且對立，然而從表現方式、描寫篇幅之大小都不盡相同，那麼從這樣的安排來說，這些文本更傾向於表現哪一個意義（價值或主義），就會是內部隱含主體的樣態體現。是以在得到文本中主題內容表現的對立後，本文再針對文本中的敘事安排與價值表現進行分析，藉以歸納文本所欲表現的世界觀，完成小說本身意義考察之終極追求。

一、階級主題的人物關係對立與關懷意識探討

本文在處理階級相關的陳映真小說時，採用「職場」與「性別」這兩種類型作為分析進行的兩個對象，然而這兩者在本質上都是階級。陳映真小說中階級對立的形式，是人物對立人物、團體對立團體的二元對等單位，在事件當中有所對抗與爭奪。

然而，單位上的對等不代表關係當中的對等。階級代表人物關係當中的支

配與被支配，是以發掘並分析這樣的對立關係便是此處的重點。表現職場階級的文本中，內部的階級關係顯而易見的被預設。這樣的內容，甚至是以系列的方式出現在陳映真小說當中。職場中的階級對立可以統稱為上司 vs 下屬的對立結構，在本文的舉例當中，以此為基礎表現為「評量者 / 被評量者」、「誑騙者 / 被誑騙者」以及「使役者 / 被使役者」。而從三個獨立的舉例文本，在表現階級上出現一種對立設計上的共性——以職場中的外部事件彰顯上位者權力或支配的事實。這與性別階級的表現有所不同。

在職場階級的關係裡，人物與人物間的關係是理性約束；在性別的階級中，人物的情節與關聯則複雜得多：他們可以是夫妻、公媳、祖孫或是素昧平生的男女。在這些組合裡，沒有明確的外部信息可以說明支配這件事，同時因為涉及的時常是父權價值觀中，秘而不宣的淺規則，使得這樣議題的文本當中，較不具備外部衝突的描寫。是以，對立造成的衝突在性別階級的議題中，會出現內部化的表現原則。

從涉及職場支配的對立結中，觀察其內涵的價值對立，能夠發現兩個現象：在描寫當中不存在任何下位者的勝利；不論外部衝突表現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是崇拜、妥協或抗爭後的屈服，他們之間的支配本質在職場中永不改變。在這個基礎上，文本對於上層者的描寫主要呈現去人性化、表裡不一或是貪婪——在醜惡化這些宰制者的同時，以一定的篇幅描寫下階級者的正面形象，或是其在被支配下的無助、瘋狂，在表現傾向上呈現對被宰制者之同情。以這樣的描寫體現資本主義社會中利益、資源分配不均的社會性質，以及其帶給人的異化，透露隱含作者傾向勞工、下層者，訴求資源再分配的社會主義世界觀。

在性別對立的文本當中，於表層對立的男女或二元人物之行動未必使其本身代表某種價值，這樣的性質尤以對被支配者的表現更加明顯。受支配者在文本中必然是女性，在她們身上經常表現出關於情慾的不自由。然而，這樣的不自由卻不是一種明確的主義可以說明：在表現父權式社會語境，對女性人物造成之壓迫處境的文本，卻不具備表現女性主義價值的人物；同時對於男女婚嫁與保守價值，文本不採批判的情節設計，反而呈現出對全體語境中之人物的同情。是以本文在處理這樣的現象時不以女性主義稱呼這種世界觀的表現，而是取其反對父權當中的封建性質這一事實，歸納其為對立於保守、封建性質之社會特徵的進步主義之世界觀。

二、國族衝突的人物對抗及其價值認同分析

在人物對立的設計上，國族對抗於表層的表現形式，與階級對立文本並無二致，必然涉及人物對立於另一個人物，或者團體對立於另一個團體。只是在設計上因為議題本身的性質，國族對抗文本出現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涉及同族對抗的文本，亦可以涉及異族間的對抗，這一現象證明兩件事：其一，是否為「同族」的判斷，可以藉由無爭議的、法律上的「異族」來判定；其二，原先為同族對抗的對立結構（二元），可以因為「第三元」的異族符碼之介入，而轉變為異族對抗的對立結構（舊的二元轉變為新的二元）。

在陳映真小說中，涉及同族對抗就幾乎可說涉及政治上的分斷體制。這樣的體制與其實際在社會當中的呈現，使得一種分別族類的言談，本省 / 外省分類論出現並成為一種語境。而這樣的前提，使得其小說文本的表層結構，非常整齊、一至的在這種分類規則下呈現為「本省人 vs 外省人」、「台灣人 vs 中國人」、「本省人 vs 大陸（中國）人」等。

而一些兼及同族與異族對抗的文本，在分斷帶來的同族結構上，藉由前述提及的第三元介入，使其變為「美國人 vs 中國（台灣）人」。在這種設計下，原先對立的同族人，可能在異國族的對立面集結，又或者因為行為、選擇上依附異國族而成為「失國族者」——在對立的立場上站到美國人的一邊。另一種不涉第三元介入的異族對抗文本相對簡單得多，可以純粹藉由外部的戰爭或內部的價值對立，而成現為「美國人 vs 台灣人」或「美國 vs 中國」。

價值表現層面，在同族對抗者中，價值的表現是多樣而複雜的。因為不同文本中的人物設計有其不同，有些人是本省人，有些則是分斷體制的直接影響者，也就是外省人。然而無論如何，文本必定會安排主要的對立人物以言行或內部思想呈現其認同或不認同，並且綜觀其小說表現，可以發現訴求分類本省 / 外省、台灣 / 中國以及台灣 / 大陸的人物，其表現必定是貶意形象，其在不同程度上表現為膚淺、無情、惡劣或是自卑；反之，不採取分裂認同的人物，其表現更多是有情、沉著、有雅量。在這種差異下，可以發現文本之表現傾向，有很明確的反分裂意識。而正面人物國族認同的一致性，則指向一種中國認同——從這樣的國族意識之表現共性，表現出一種含有民族主義情懷的大一統中國世界觀。

而建立在同族對抗所呈現出的世界觀上，在對抗當中因為其美國 / 中國的

立場設計，由同族對抗轉換於異族對抗的文本，必然在表現上因為中國人的團結訴求，而變為本土守護者對立分裂、掠奪者之局面；奇特的是在不涉及同族對抗的純異族對抗文本中，美國價值掠奪者的本質是完全不變的——文本藉由美國發動的戰爭，對台灣人、美國人造成的不可抹滅的傷害，這使得代表美國發動戰爭的國家價值者，是表現上永恆的侵略者，差別只在表層行動中，掠奪什麼、如何掠奪。這樣鮮明的否定，且指向性強烈對著美國的軍事與政治、經濟行為，表現出文本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觀。

三、批判文本中內部化對立元則與反對意識考察

批判文本在分類上，完全以其表層形式作為標準——在階級與國族的對立結構考察中，因結構必須兩相對立的原因，批判文本並不能夠放入這樣的討論當中，因為它們的形式設計不是兩個人物或團體的對立，而是人物與環境的對立：在這樣的文本裡，布爾喬亞的對立面不是無產階級人物，而是使其布爾喬亞性質蕭索的人物處境；知識分子的對立面不是無知識人物，而是與其理想背道而馳的社會事件發展；情治人員的對立面不是反動分子，而是以其產生畏罪心理的政治權力變遷等，諸如此類，這樣的文本依然具有對立事實，只是表現單位不再對等。本文依其表現的主要人物，分別是社群中的非掌權者「社會人物」，與體制中的掌權或奪權者「政治人物」兩種為分類基準，將批判文本分為「社會型文本」與「政治型文本」進行分析。

在人物對立於環境的前提下，社會型文本與政治型文本的對立結構特性有二：單一人物的內部描寫將衝突的表現所在，這是對立的內部化；其二是對立結構有相當高的共性——在社會型文本當中，所有的對立結構最終都表現為「理想 vs 現實」，人在社會當中的處境總是小的、無力或無能的。而政治型文本也是如此，不論是奪權者、維權者或是被迫受害者，在結構當中都會變為體制 / 反統治的意識之拉扯。是以，以這樣的對結構之發現進行價值探討是相對清楚的，因為發生在人物內部的拉扯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的對立。

在表層對立的相同的前提下，其內部化的對立模式，使得對立的立場本身就呈現價值的衝突。在文本中的兩種價值表現，一方面是人物內部的理想，另一方面是外部現實代表的意義。在此之中，批判以一種文本表現的反面傾向作為表現原則，受批判之價值多採用他者化的描寫，以表現人物或群體的負面形象、諷刺橋段為主，其多為功利、布爾喬亞與集權共犯結構，這樣的社會特徵

呈現，具有對資本主義社會環境的指涉，對其進行批判則能夠說明隱含作者具備一種關懷底層無權、無產與無依者的社會主義世界觀。

而在針對政治型文本之批判意識的考察裡，發現這些批判本身必然針對者政治人物或者政府。這是由於相同的表現原則，使得文本總是以人的受苦、掙扎與無價值狀態為主要表現對象。是以，造就那些痛苦與壓迫的對象，明顯為受批判目標——也就是對濫用公權力、權謀或是高度商品化的整體政治氛圍進行批判，也同時相這樣的批判指向了型態為集權與資本主義的社會，藉以呈現關注人之幸福與處境的人道主義世界觀。

在分別以三個方向對陳映真小說表層之結構原則，與其世界觀之導出進行爬梳之後，本文在此作一最終結論。依原先設定之架構，本文在研究當中得出在陳映真小說文本內，不同階級人物相互對立、不同國族與認同者相互對立、人物理想與社會現實對立，以及政治環境中人的狀態如何拉扯並在內部發生矛盾。藉由這些表象，可以發覺文本設計之軌跡，以及這種設計透露出之隱含的主體意識。

雖然在這樣的架構下，研究得到了與題目相應的解答，然而實際上陳映真小說的表現原則在主題上擁有更大的互動或衍伸性質。在曾經與未曾舉例的文本中，有可以藉由男女結構對立而上升至國族意涵者；針對資本主義、非人道的批判，亦可以視為對階級的意見。更遑論將人物與敘事表現視為美學或哲學追求的可能，皆是本文所不能及的，此間礙於文章結構與理論框架而未盡之事宜，尚待其他研究予以指教、補充。

參考書目

一、陳映真作品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全23卷）

陳映真等著：《人間風景·陳映真》（臺北：文訊雜誌社，2009年）。

《陳映真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二、陳映真相關研究及評論

(一)專書

封德屏總編：《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9年）。

曾萍萍：《噤啞的他者：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

趙剛：《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台灣1960年代》（臺北：人間出版社，2013年）

黎湘萍：《台灣的憂鬱》（臺北：人間出版社，2004年）

趙遐秋：《生命的思索與吶喊：陳映真的小說氣象》（臺北：人間出版社，2007年）。

(二)學位論文

羅夏美：《陳映真小說研究：以盧卡奇理論為主要探討途徑》（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管永仲：《陳映真小說主題研究》（新北：華梵工學院人文學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曾萍萍：《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士碩士論文，2000年）

陳映真，《陳映真全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頁42。

林碧霞：《陳映真小說中的意象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謝曉青：《陳映真小說中知識分子與社會關係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蔡孟莉：《陳映真小說人物角色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年）

楊欣慈：《從〈麵攤〉到〈萬商帝君〉——陳映真小說的敘事研究》（臺南：國立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年）

王向陽：《陳映真小說論》（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

武莎：《陳映真小說論》（泉州：華僑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倪金華：《孤獨的白楊》（泉州：華僑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洪豆：《人間的“後街”——陳映真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徐婷婷：《陳映真小說中的懺悔意識》（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

張紀梅：《陳映真小說的鄉土敘事》（無錫：江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姜雁：《陳映真小說中的人道主義情懷》（鄭州：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唐蓉：《陳映真小說的創傷性回憶書寫》（金華：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王雅楠：《陳映真小說的中國情結》（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牛傳琦：《後殖民視域下的陳映真小說》（安慶：安慶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三)期刊論文

Miller, Lucien：〈枷鎖上的斷痕——陳映真的短篇小說〉，《臺灣文藝》第101期（1986年07月），頁172-195。

簡偉斯：〈現代企業行為下的人——談陳映真的小說〈華盛頓大樓·第一部：雲〉〉，《文藝月刊》第206期（1986年08月），頁43-55。

宋冬陽：〈縫合這一道傷口——論陳映真小說中的分離與結合〉，《文學界》第20期（1986年11月），頁8-33。

呂正惠：〈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論陳映真的歷程及其矛盾〉，《文星》第106期（1987年04月），頁134-140。

李桂芳：〈意識的偵防與歷史的夢魘——從陳映真與陳芳明的論爭說起，並兼論晚近「臺灣文學史」的問題〉，《中外文學》第383期（2004年04月），頁13-35。

吳璧雍：〈夏鬱的臺灣社會——試論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文星》第106期（1987年04月），頁141-148。

林育慶：〈從「批評歷史」的角度看陳映真三篇「政治小說」〉，《臺灣文藝》第166/167期（1999年02月），頁74-81。

周昆：〈維納斯的回聲——試析陳映真小說中的無意識〉，《聯合文學》第128期（1995年06月），頁122-127。

邱佩文：〈陳映真小說中的「神女」形象〉，《中國語文》第618期（2008年12月），頁95-103。

林家安：〈陳映真〈將軍族〉的環境剖析(上)〉，《中國語文》第629期（2009年11月），頁80-86。

林家安：〈陳映真〈將軍族〉的環境剖析(下)〉，《中國語文》第期（2009年12月），頁86-96。

- 林瑞明：〈目的與手段之別—試論黃春明與陳映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1999年12月），頁321-337。
- 林瑞明：〈兩種臺灣文學史—臺灣 V.S. 中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7期（2008年10月），頁107-145。
- 徐志平：〈臺灣鄉土文學三大家述評〉，《人文藝術學報》第3期（2004年04月），頁27-55。
- 徐華中：〈陳映真小說的文本訊息—以「將軍族」及「山路」為例〉，《勤益學報》第13期（1996年02月），頁442-453。
- 郝譽翔、李爽學：〈感傷的凝視—陳映真最新中篇力作(忠孝公園)〉，《聯合文學》第201期（2001年07月），頁25-33。
- 崔末順：〈《悠悠「家園」》與〈忠孝「公園」〉：黃哲暎和陳映真小說的歷史認知〉，《臺灣社會研究》第78期（2010年06月），頁183-214。
- 陳芳明：〈當臺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聯合文學》第192期（2000年10月），頁166-179。
- 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臺灣社會研究》第78期（2010年06月），頁215-268。
- 陳芳明：〈有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三答陳映真的科學創見與知識發明〉，《聯合文學》第202期（2001年08月），頁150-167。
- 陳建忠：〈末日啟示錄：論陳映真小說中的記憶政治〉，《中外文學》第376期（2003年09月），頁113-143。
- 賀照田：〈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陳映真80年代的思想湧流析論之一〉，《臺灣社會研究》第78期（2010年06月），頁115-181。
- 曾靜淪：〈第三世界文學的實踐者—重讀陳映真八〇年代的文學創作與生產〉，《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11期（2010年09月），頁37-55。
- 楊馥菱：〈從陳映真的〈夜行貨車〉談其「中國意識」〉，《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 人文藝術類社會科學類科學教育類》第34期（2003年09月），頁27-40。
- 趙剛：〈頹頹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臺灣社會研究》第78期（2010年06月），頁47-114。
- 鄭鴻生：〈陳映真與臺灣的「六十年代」：重試論臺灣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臺灣社會研究》第78期（2010年06月），頁9-46。

三、其他參考文獻

(一)專書

呂西安·高德曼，段毅、牛宏寶譯：《文學社會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年）。

羅蘭·巴特，江灝譯：《神話學》（臺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19年9月）

馬克思、恩格斯，麥田編輯室譯：《共產黨宣言》（臺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14年4月）

班納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臺北：時報文化，2022年1月）

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申丹、韓加明、王麗亞著：《英美小說敘事理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伍茂國：《現代小說敘述理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

李茂增：《現代性與小說形式》（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

林鎮山：《台灣小說與敘事學》（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

佛斯特：《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1984年）。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傑哈·簡奈特著，廖素珊、楊恩祖譯：《辭格第三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詹姆斯·費倫、彼得·J.拉比諾維茨主編，申丹等譯：《當代敘事理論指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後現代經典敘事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